香港教會研究系列1

梁家麟著

福音與麵包

—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

建道神學院

梁家麟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加拿大維真學院道學碩士，

建道神學院學術副院長、教授

香港教會研究系列1

梁家麟著

福音與麵包

—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

建道神學院

香港教會研究系列 1

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

作　者：梁家麟
編　者：朱秀蓮
文稿編輯：王少勇
封面設計：楊　喻
製作助理：曾嘉穎
出版者：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長洲山頂道 22 號
Tel: (852) 2981-0345　Fax: (852) 2981-9777
E-mail: cccrc@abs.edu
Home Page: http://www.abs.edu
總代理：宣道出版社

Hong Kong Series 1

Christian work at Rennie's Mill Refugees Camp in the 50's

Author: Leung Ka-lun
Editor: Chu Sau-lin
Script Editor: Wong Siu-yong
Cover Designer: Bonnie Y. Yeung
Production Assistant: Tsang Ka-wing
Publisher: Christianity &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2 Peak Road, Cheung Chau, Hong Kong
Sole Agent: China Alliance Press

© 建道神學院 二〇〇〇年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ISBN: 962-7997-44-7

© 2000 by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First Edition, Decemb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香港教會研究系列」總序……7

劉序……11

自序……15

鳴謝……23

研究方法及內容介紹……25

第一章　導言：調景嶺營的由來……29

第一節：中國政權轉易與香港「難民」問題
第二節：特殊難民與特殊照顧
第三節：調景嶺營的奠基及其政治含意

第二章　調景嶺營以前基督教會的事工……51

第一節：志願機構的黃金時期
第二節：滯港的傳教資源
第三節：東華醫院時期
第四節：摩星嶺時期

第三章　基督教會在調景嶺的建立……81

第一節：路德會
第二節：宣道會

第三節：信義會
第四節：錫安堂
第五節：崇真會
第六節：神召會
第七節：教會聚會所
第八節：天主教

第四章　教會在調景嶺的社會救濟.....129

第一節：社會救濟
第二節：手藝工場
第三節：調景嶺學生輔助社
第四節：基督教在調景嶺救濟事業的分析

第五章　教會學校與其他教育事業.....147

第一節：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的補助
第二節：信義中學
第三節：鳴遠中學
第四節：調景嶺中學
第五節：聖約翰小學
第六節：宣道小學
第七節：教會教育事業概述

第六章　醫療及其他服務.....165

第一節：基督教醫務所
第二節：靈實醫院與香港將軍澳醫援會
第三節：天主教醫務所與其他
第四節：錫安堂接生所
第五節：戒煙所

第七章　神學院與傳道人培訓.....181

第一節：路德會協同聖經學院
第二節：宣道聖經學院
第三節：調景嶺營出身的傳道人

第八章　基督教在調景嶺的興衰.....197

第一節：調景嶺教會的特色
第二節：調景嶺教會的衰落
第三節：傳教環境與對象的轉變
第四節：衰落的內在因素
第五節：調景嶺教會的啟示

後話.....227

徵引書目.....231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文化研究中心」簡介.....243

「香港教會研究系列」總序

近年來，本土研究在亞洲地區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中，蔚然成風，儼然成為「顯學」。扼要而言，本土研究包括兩大方向，一是從社會科學（主要為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入手，主張以適切本土處境的理論模式，取代生吞西方理論的舊法。二是從歷史學的進路，藉著歷史研究，重索群體對集體歷史的記憶，從而確立植根及認同本土社會的意識。

在華人社會中，學術研究的本土化反省，以台灣最為蓬勃。相反，香港學術界在這方面則起步較遲，不論在社會科學及歷史學的領域中，均未能凝聚足夠的力量。而在神學研究方面，本地神學界的教學及研究隊伍雖然在華人教會中較具規模，但是就香港教會的不同處境，作深度的本土反省，卻仍有待更多努力。抑有進者，相對於台灣神學界在本地教會史研究方面所累積的成果，我們對香港教會史的重視程度，明顯大大遜色。

有見及此，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決定增設「香港教會研究系列」，成為我們第四個出版專輯。整個系列的關懷包括兩方面：第一、從香港的處境出發，去驗證西方理論的適切性，並進而提出一套具本土基礎的理論解說。其實，關於中國（華人）神學本色化的問題，一直是我們的主要關懷。我們不認同可以抽空建構一套本色神學，藉此解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張力，或達致重建中國文化路向的偉大構想。我們確信，更紮實的從事本土調查反省，來解說華人教會的現狀，方為本色神學的可行之路。

第二、從歷史研究的進路入手，重建香港教會歷史。屈指一算，基督教在香港地區的傳播，已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但是我們對於香港教會史的認識，卻仍有許多空白地帶，有待填補。九七回歸後，香港研究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本地史的風氣，卻仍未成氣候。跟台灣史的「顯學」地位相比，我們只在「初級階段」徘徊而已。而香港教會史研究，就更只是處於「初級階段」的萌芽狀態。有人曾說，「寫歷史」包括兩方面的涵義，就是重建過去（歷史的撰述者）與開創未來（歷史的創造者）。華人教會對後者的興趣，顯然大於前者。我們確信，如果不認識香港教會的過去，便不能理解她的現在到底代表甚麼意義，亦無從判斷她的未來。

「香港教會研究系列」的產生，期望藉著嚴謹的學術研究，為關心香港教會者提供相關的知識基礎。我們更期望可以鼓勵更多同工，投入精力，在這片園地中開創更多成果。

邢福增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日

劉序

調景嶺這個社區從誕生到消失雖然不到五十年，亦已經因為香港都會發展計劃而被夷為平地，今後它僅存留在人們的回憶中；然而她所蘊含的歷史寶藏卻亟待學者開採和挖掘。儘管調景嶺曾經是香港的一個饒富有特色的「特區」，研究者以之作為學術題材還是近幾年的事。梁家麟博士是在這塊學術園地辛勤耕耘而有所成的第一人；他這部新作是迄今以來筆者所讀到的第一本全面而系統地論述調景嶺歷史的專著。若單從書名來看，梁著論述的是五十年代基督教在調景嶺的傳教與救濟事工；不過，要為讀者指出的是：由於基督教會在調景嶺營成立後，為那裡的難民提供了生活上各方面及時的救濟和援助，以及對該區早期各方面的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因此梁博士此著不啻是一部有關調景嶺早期的通史。

調景嶺能夠從一個位於香港偏僻而建於荒山野嶺的難民營發展成一度居住了二萬多人而井然有序的社區，與基督教會在這裡曾經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方面梁著有清晰的論述，也提供了確鑿而令人信服的論據。梁博士

通過訪問當時教會的牧師、領袖和信徒，利用了史學上的口述歷史方法重構調景嶺早期的歷史。他鍥而不捨，總共與二十多位有關人士做了四十多個訪問。絕大部份受訪者是當年在調景嶺從事傳教與救濟的先驅和拓荒者。他們分別與著者分享了珍貴的回憶，這些回憶成為梁博士撰述時的寶貴材料。由於他獲得受訪者的信任和充分合作，這一段彌珍的史實才能夠保存下來。因此，他這本專著一方面起到了為香港基督教史、香港地方史奠下基石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所辛勤採訪和積累得來的寶貴口述歷史資料，為日後從事有關這方面課題研究的學者提供莫大的方便與參考價值。

梁博士在書中盡量讓歷史締造者用自己的話來重構調景嶺的過去，使得一張張先驅者的圖像展示於讀者面前，而他們所成就的慈濟事工在讀者眼下亦一覽無遺。通過梁博士流暢的筆觸，教士、牧師以及信徒為調景嶺難民犧牲一己的情狀躍然紙上，他們的奉獻精神令人讀來既感動復欽佩不已。他在敘述基督徒為調景嶺難民辛勤服務的同時，也記錄了教會內部因信仰著重點不同而引起的問題（例如西門英才教士與美國路德總會的分歧），從而在「學術研究與對教會的責任」兩者中取得了平衡。此外，家麟在把調景嶺的歷史娓娓道來時，適當地引述受訪者的話，令人讀來彷彿走進了歷史現場，感到趣味盎然。能夠有這種效果自然歸功於家麟的文字功底和史家才華。閱讀本書不但可以增長知識，又能陶冶靈性。以上數端只是筆者在閱畢後所想及的，它的特色和優點肯定不只這些；那就有待讀者自己去領受和欣賞了。

二十年前，筆者由何冠環兄介紹與家麟相識，那時候他正在撰寫有關廣東基督教史的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今天他已經是著作等身的大家，這是神重用他，也基於他的勤奮和如飛之健筆。筆者作為調景嶺研究的一名園丁，今天應家麟寫這個序，既可先讀為快，亦感到與有榮幸。

劉義章
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2000 年 9 月 11 日

自序

無論從香港社會抑或教會的角度看，調景嶺都是獨特的社區，有廣泛及深入研究的價值。

調景嶺獨特的政治與社會形態，譬如其與移守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及居民因有「救總」長期和大量經濟援助而獲得免費教育等特殊福利，較多為人傳誦；但是，它在香港教會史的獨特地位，卻不一定被人知悉。舉例說，按人口比例計算，這裡是中國基督教史上在最短時間內有最多量人皈依基督教的地區，在 1950 至 1952 年間，天主教與基督教各有新信徒二千人強，逾整個社區人口百分之二十；在常住人口兩萬人以下的社區裡（最高峰期的幾年不算），有七所以上的教會；教會且辦有各級學校、盲人學校、診所與醫院、接生所、戒毒所、手工藝廠、兒童院等各種社會服務，又從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而更有趣的是，這裡曾辦有兩間聖經學院，訓練了百位以上的學員，據說自調景嶺出身的傳道人為數達三百之多，並且成為最少兩個更正教宗派與一個天主教修會在香港開基的首批華人傳道骨幹。基督教在五十年代初期於調景嶺的發展程度與幅度，環顧中國大陸乃至其他華

人社區，都無出其右。即使將之比較二十世紀初的耶穌家庭或小群教會運動，又或者與雲南貴州基督教特別興旺的少數民族地區相提並論，視為基督教在華發展的獨特個案，也不是誇張的說法。

當然，獨特的教會形態是由獨特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所造成的，特別是調景嶺教會的興盛情況僅屬曇花一現，很快便復歸沉寂，就不能不讓人認定它的興盛是由某個獨特的時空促成的。因此，這個研究要探討的，正是基督教如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空發展，她的各種成就、失敗，及對日後教會在該地區及香港整體的正負面影響。筆者相信，研究的結果，對認識香港基督教史及中國基督教史，乃至探討向國人傳教的策略，都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說說整個研究的緣起。筆者幾乎所有研究都是由一連串偶發因素促成的，這個也不例外，它絕非原訂計劃中的產物。幾年前，筆者從事關於宣道會在香港發展的研究，開始接觸有關調景嶺的史料，由於文獻資料不多，筆者當時的認識也極其有限。三年前，隨著香港回歸中國，香港意識與中國意識同時高漲，邢福增博士與筆者商議進行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藉以尋索香港基督徒的信仰與文化身分；不過，因被「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及「二百年的華人釋經」兩個大型的研究計劃纏身，筆者除定期蒐集有關調景嶺的資料外，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動手，有心無力，真正開動的僅邢福增博士一人而已。

約在大半年前，香港中文大學劉義章博士與浸會大學黃文江博士籌備為老師吳倫霓霞博士編輯一本慶祝論文集，邀請筆者就香港基督教史的範圍撰寫論文，筆者乃想到併合手頭資料，寫一篇宣道會在調景嶺的事工研究。孰知一開動下，便發現：一方面文獻資料匱乏，若不輔以口述訪問，便無法復原歷史面貌；二方面當時期在調景嶺工作的不限於宣道會，宣道會的情況僅反映當時當地的一般性現象，故應從社會整體性而非分割性的向度來研究。是以才改成如今的題目，篇幅也由論文逐漸擴充成專論。

研究工作進行了約大半年。除在香港及台灣兩地廣泛搜集有關史料外，筆者主要依恃的是口述歷史訪問。研究的時期距今約半個世紀，雖然已有好些知情者離世，但存者為數尚是不少，他們成了筆者尋索資料的對象。我把訪問對象分作內圈與外圈兩類。內圈主要指曾在五十年代於調景嶺不同宗派事奉過的傳教士與華人牧者，他們是第一線的參與者，最知曉有關內情；因年代久遠，受訪者大多已近古稀之年，故也不一定能清楚記得每件事的細節內情，但我相信，若不及時訪問，不數年後，他們僅餘的記憶便伴隨他們長埋黃土，這是挽救史料的迫切任務。外圈指的是曾在當時期或較後期的教會、學校，充當會友或學生的人，他們沒有涉入教會的行政事務與人際網絡，對有關資料所知有限，但卻最能道出一般人對教會及各種事工的印象和反應。內圈的人迄今所剩無幾，筆者盡可能都作訪問；但外圈者卻為數甚眾，某甲介紹某乙，頗有沒完沒了的感覺，也難說誰比誰更具代表性，

筆者只能較任意地中止追蹤訪問的鏈條，相信如今已知的大概足夠。

研究最困難的地方是追蹤受訪對象，吾生也晚，除了自己所屬宗派中人，受訪對象大都並不認識，甚至連誰該接受訪問也不知悉。筆者主要依循兩個途徑：一是直接向有關宗派的負責同工查詢，希望他們提供文獻資料與合宜的受訪對象；二是請求已受訪者介紹其他知情者，輾轉追溯。由於各宗派人事遞遷，他們的檔案保存意識一般不高，特別是由差會交棒給華人的過程中，許多都遺佚了寶貴資料，故知情的負責人寥寥無幾。好些待受訪者移居海外，也構成跟他們聯絡及進行訪問的困難。在此得聲明，知情而又能訪問得上的對象既已不多，筆者只能知道一個便做一個，完全談不上事先計劃取樣，故受訪者的代表性僅能從他們提供的資料反證出來（知情愈多的，即愈具代表性），而非在訪問前便已確知。有多次訪問幾近白走，千辛百苦聯絡上，徵得對方同意賜見，卻完全無法或不願意提供資料，結果無功而還。讀者不會在本書的受訪者清單中見到他們的名字。

也許是過去學術界與新聞界的恃勢凌人（他們總以為有權暴露別人內衣褲的顏色，或專以揭瘡疤爆醜聞為己任），唬住許多教會裡的牧者與信徒，故不少人對接受訪問，特別是提供資料以供學術研究，都存有相當的戒心。有些人因此不肯受訪，或一看到有人擺上錄音機及作書錄，便立即閉口不言，或只講「合宜」與「造就人」的話。由於在神學院及堂會工作多年，特別是過去對堂會與牧者的認同與維護有

加，獲得不少同工的信任，故所吃的閉門羹不多。與筆者所認識的一些史學界朋友相較，筆者自信在此是討了一點便宜的。不過，也因此緣故，這個研究報告不會載錄筆者採訪回來的所有資料，一些與主要論述無關的是非末節，統統得給過濾掉。筆者並非說得隱惡揚善，甚或為了信仰與組織的緣故而扭曲事實、虛擬故事，卻相信每個研究背後都有其或顯或隱的主旨，且亦不可能是價值中立與毋須承擔責任的。我盡量平衡對學術研究與教會所負的責任。

對筆者而言，主要依賴口述訪問來完成的研究，這次該算是頭一遭。它耗用了我事前無法預算之多的時間，若用作文獻翻爬，足可寫出三倍以上篇幅的書稿。不計事前聯絡及交通往返的時間，我總共做了四十多個算是「成功」的訪問（白走一趟的便不用提了），即以每個訪問用大半天時間（在訪問以前，得與受訪者聊天，建立互信）來算，便花了數十個工作天，這還不包括好些遠赴海外（加拿大、台灣）完成的訪問呢。除時間外，人際關係的消耗也大得驚人，多番請託，不少且是多重請託，為許多朋友及朋友的朋友帶來麻煩。記得一次訪問一位前聚會處的弟兄，伴隨我同去的有兩位姊妹，其中一位是在當日才認識的，她是為此行穿針引線的關鍵人物。在這裡表達對他們的無限感激之餘，我更希望證明他們勞苦的成果，也就是這個粗陋的研究，日後對香港教會及基督教研究能有所貢獻。

執筆寫書序時，心中憶起了研究過程中各個苦樂片斷。這包括趁著到台北教書的機會，向學生申請告假半天，然後

利用這空檔時間從台北飛赴台中，訪問耀漢小兄弟會的曹立珊神父，當天來回。千方百計跟一位不認識的人在台灣聯絡，約定在某地訪問，談了半天，才知道他不是我要訪問的對象，僅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人，在尷尬之餘自亦難掩沮喪之情。一些長輩如楊植潤牧師、王力耘牧師夫婦、徐傳宣牧師熱情接待，並諄諄教誨晚輩，令人驚喜不已，我在他們身上獲得的不僅是歷史資料，而是寶貴的屬靈經驗與事奉態度。丘恩處博士在以色列接到從美國輾轉傳來的聯絡信函，慨允在他過境香港期間接受訪問，省卻筆者前赴紐約的時間與路費。訪問崔冠軍牧師時，距他蒙主寵召只有兩月，當日他因擔心我聽不懂他的普通話，還邀請了許振武牧師專誠請假前來作伴，無端浪費了許牧師的寶貴時間。事實上，有些受訪者所操的口音確實是難以辨認的，其中一人從頭到尾說筆者半懂不懂的客家話，讓筆者享受了半天猜謎之樂。無論如何，沒有這些受訪者的無償付出，這個研究成果難以問世。

這個研究也花了不少金錢，包括交通、膳食零用、手信等，蒙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撥款資助，在此謝謝研究中心的邢福增博士、湯紹源牧師與蔡少琪先生等的支持。記憶中，它是我第一個申請款項補貼完成的研究計劃，過去所曾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自資完成的。為了使它與日後的研究互相配合，研究中心亦開始教會的口述歷史採訪計劃，希望日後在香港教會史的資料搜集與研究上有更積極的參與和更大的貢獻。朱秀蓮小姐與江蓓薇小姐在本書個別的訪問環節中曾有參與，不過，所有訪問都是由筆者親自完

成的，包括資料記錄在內。有不少人誤會我們有許多研究助理幫助資料搜集與編纂，筆者在此鄭重聲明，與大學的情況不同，研究中心僅是小本經營，迄今不曾聘過一個專任研究員或研究助理，而我個人亦不懂得如何找研究助理協助工作，甚至無法想像如何能將翻閱篩選資料的重任委託別人代勞。所有研究計劃都是邢福增博士與我各自獨力或合力完成的（若有第三者付出過任何勞苦，都必然在研究成果中見到他們的名字）；我們僅在資料與觀點的交換上彼此守望，此外無他。

曾在各方面直接支援此研究的人，我在鳴謝頁將分別提到他們的名字。這裡僅提其他方面協助我的人。首先，得感謝在信仰與生活中深層地支援我的妻子柳萍，沒有她，也許仍有人從事這個題目的研究，但必然不存在如今這個研究者了。劉義章博士在研究開始時惠贈鴻文俾作參考，在完成前允為本書賜序，並對書中的筆者文中處處提點補正，他是我的良師益友。謝謝王少勇兄的文稿修正，他做得非常仔細，為讀者減省了閱讀本書時的許多麻煩。最後，謝謝文化中心朱秀蓮小姐與曾嘉穎小姐，她們在編輯工作上出力甚大。研究著述無疑是比較個人性的工作，但也並非真箇能獨力完成的，聖經說我們各自為肢體，彼此配搭，信然。

梁家麟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二日

鳴謝

本書之寫成，承蒙下列各方人士協助聯絡與蒐集資料，謹致謝意：建道神學院邢福增博士、黃碩然博士、黃玉明小姐、朱秀蓮小姐、江蓓薇小姐、陳穎思小姐、周欣鳳同學，錫安傳道會翁瑞徵牧師，溫哥華頌主堂潘士宏牧師，紐約神學教育中心丘放河牧師，路德會鄭漢龍校長、曾維州先生，《基督教週報》施潔儀小姐，神召會曾勝基牧師、梅璧珠姑娘，九龍塘宣道會羅淑芬姑娘、方榮康長老、劉張雪明女士，靈糧堂畢姚芬姑娘、蔡惠師牧師，崇真會曾福全先生、黃小荷牧師，信義會蕭克諧院長，港澳信義會胡子浪監督，天主教檔案處夏其龍神父與陳小姐，香港學生輔助會陳永忠院長，台中耀漢兄弟會曹立珊神父，台灣晨曦會劉民和師母，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黃慶深先生，靈實醫院的林雲萍小姐，台北宣道會松山堂蔡永光與蔡榮花姊妹，另魏慈恩小姐，郭瑞榮牧師，Rev. Eskil Albertsson 等。

另外，好些教會借出場地，使訪問能順利進行，這裡僅特別向宣道會深水埗堂與溫哥華門諾會頌主堂致謝，它們原

來跟這個研究的課題無直接關係，純粹無償義助。叨擾潘士宏牧師當日，不巧剛是太師母潘李佩華女士蒙主寵召、出殯後兩天，親友盈門，諸事紛擾，而潘牧師竟還撥出半天時間相陪，只有聖靈才可見證我在那天的歉疚與感激之情。

下列人士接受筆者一次或多次訪問，特致萬分謝意：范約翰先生、時恩證牧師、謝志和牧師、崔冠軍牧師、楊植潤牧師、丘恩處博士、曹立珊神父、劉梅軒長老、蔡惠師牧師、蕭克諧院長、王力耘牧師、戴瑞蘭教士、魏榮牧師、羅菁女士、劉民和牧師、葉維新牧師、陳國英女士、林澤先生、盧龍光博士、徐傳宣牧師、甘汝誠先生。至於一些不願具名的受訪者，便只有籠統地一併致謝。

在此特別懷念崔冠軍牧師，他在接受筆者訪問後兩個月便因病逝世，於其居所的錄音訪問竟然成了訣別的留言，令人感喟。

謝謝浸會大學中國基督教歷史檔案處與香港政府歷史檔案處准予使用它們的資料，及有關人員的協助。筆者曾致電香港及台灣「救總」辦事處查詢有關資料與人士，答稱一切資料均已散佚，昔日有關人士亦已失去聯絡；至於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的檔案資料，已移送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負責人答稱難以索閱，故亦從缺。但筆者仍對上述機構的應答表示感謝。

研究方法及內容介紹

本書採用的研究方法非常簡單，主要是在蒐集若干文獻史料，對該段歷史掌握初步的輪廓後，便對有關人物進行口述歷史訪問，補充文獻材料欠缺的細節內容。訪問方法是單對單的問答(person-to-person interview)，完全不做問卷調查，沒有可供量化分析的數據蒐集，甚至沒有一套擬妥的標準化問題。訪問者以一般性問題引導被訪者進入情況後，便任由被訪者自由憶述他所知道的故事，訪問者間中作提問或感性回應，以維持被訪者的談興與交談的動力。為幫助被訪者重拾一些已經模糊的記憶，也為了複核和查證已訪得的資料，訪問者有時也會直接說出他所知道的可能「事實」，但盡量不與被訪者對質，更不會當面懷疑或挑戰被訪者的說法，盡量使受訪者在沒有感受壓力與受操控的情況下，自由敘說仍在記憶中的歷史圖像。當然，一些關鍵性的人物事件，若出現相互矛盾的說法，還是得向知情者尋根究柢地追問，惟這樣的話題並不多。

由於歷史故事往往涉及對許多人和事的評價，也有不少所謂「醜聞」或不愉快的經歷在其中，訪問者在此總是持謹慎與負責任的態度，絕不會就有關事件作壓迫性的追問，若

是被訪者不願說下去，便得趕快轉換話題。總言之，訪問盡可能是在輕鬆友善的聊天氣氛下進行，讓參與歷史的人物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憶述他所參與過的歷史。

筆者深知道不存在所謂百分百客觀真實的歷史(authentic past)，撰史者的參與總是影響了他所重建的過去(reconstructed past)；但既然當事人才是歷史的主角，筆者自當盡量抑減自己在重建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讓他們有較廣闊的空間鋪陳那個屬於他們的過去。事實上，以口述歷史為主要依據的撰述，總逃不掉是講述歷史者主觀的過去。

如書題所示，本書論述五十年代基督教在調景嶺的傳教與救濟事工，基督教會是全書的論述主體。本書作為一本篇幅不大的專論(monograph)而非通史，筆者無意過分鋪張與論題相關的大環境大歷史，故讀者不會在讀到有關調景嶺的教育與醫療事工時，同時認識香港社會在該個階段的教育與醫療情況，並作相互比較；而有關調景嶺的各種政治與社會課題的討論，本書也從略。香港教會歷史研究尚在起步階段，許多課題未被清理，目下亦談不上將調景嶺的情況，放在香港教會歷史整體的脈絡裡，作宏觀分析。復原一個基本的圖像，以為將來復原香港教會歷史整體圖像的預備，才是筆者最大的抱負。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簡述調景嶺營的產生緣由，特別解釋為何在香港這個原本由中國難民構成的社會，竟然出現所謂中國難民營的怪現象。第二章敘述基督教傳教士在東華

醫院時期及摩星嶺時期的福音事工。第三章是全書的核心部分，按照不同宗派，縷述它們在五十年代調景嶺的傳教與救濟工作的開基和發展，藉蒐集得來的人事資料，盡量復原出當時的教會面貌。第四章論述教會在調景嶺的救濟工作，第五章敘述教育事業，第六章敘述醫療事工與其他社會服務。在這三章裡，由於個別的教育和醫療機構如今仍在運作，其規模已遠超過過去在調景嶺開基時的模樣，它們的史料保存亦遠較本書其他部分詳盡；為免產生不平衡的情況，筆者盡量維持簡單基本的記述，讓那些機構更詳盡的史著由其他研究計劃承擔（已有好些計劃在進行中，劉義章博士是從事有關研究的表表者）。第七章是有關神學教育與調景嶺出身的傳道人的分析，筆者相信這章的論述內容最能整合到香港教會的大歷史去。最後一章討論基督教在調景嶺的興衰，分析教會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但不多久又迅速衰落的各種原因，這是全書唯一以詮釋而非記敘為主的一章。

為免重複前面各章已作的分析，亦為免就有限的資料作過度詮釋，幾經考慮，筆者刪去已寫成的結論，僅保留簡單的後話。

第一章
導言：調景嶺營的由來

第一節　中國政權轉易與香港「難民」問題

（一）移民與難民

香港的歷史發展，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社會情況緊密連繫。香港的原居民與固定人口(rooted population)甚少，絕大多數居民都從國內遷來，而他們在不同時期投奔香港，都反映了各個時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社會情勢。從某個角度說，香港居民大都是政治或經濟難民的後代，直到今天仍不例外。

1949 年，中國政權易手。出於對新政權的恐懼，大量難民湧來香港。據香港政府統計，在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時，港九居民才六十多萬，但到 1950 年卻激增至二百一十萬，五年間人口增加接近三倍，平均每年都有二十至五十萬人遷港，數量與比例不可謂不驚人。五十年代以後，繼續有大量人口遷來，1961 年，全港人口增至三百一十多萬。[1]

---

[1] 統計數字參 Oliver Eugene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香港與中國唇齒相依，一向奉行邊境開放政策，兩地人民可以自由遷徙，毋須申請任何證明文件。這個政策僅在 1940 年抗戰時期改變過，但隨著香港淪陷，限制入境的規定亦不復有意義。1949 年後，面對大量難民潮，香港政府再度實施入境管制條例(Immigration Control Ordinance)，限制每日入境人數，加強邊境巡邏，並規定所有居民都得申請身分證。不過，政策並未收到太大效果，在 1959 至 1962 年間，每年還是有超過二十萬人從陸路或水路非法進入香港。根據固有政策，所有華裔人士在進入香港以後，便自動取得居港資格，並在規定的居留期後堂而皇之地成為香港居民（「抵壘政策」在七十年代後才取消），故「難民」一詞僅對人口的來源說，絕不構成對某個群體的長期標籤；我們可以說香港人大都是難民出身，卻沒有某個固定的難民群體。

這些新遷港人士，除少數為挾資金與技術而來的資本家外，絕大多數都是身無長物的貧民。他們秉承中國人克苦耐勞、自力救濟的傳統，努力尋找工作，以菲薄薪資養活自己及家人，並不指望政府或任何慈惠組織施以援手。在居住方面，他們大多在港九新界山邊蓋搭木屋棲身，據統計，單在 1950 年，港九市區便增建了二十五萬間木屋，新界鄉村地區另有八萬間，這是所謂木屋區或寮屋區。[2]香港向為粵語地區，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Ph.D. dissertation,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64; Reprinted by Ann Arbor: UMI, 1975), 15。

[2]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來港人士亦以華南地區的農民為主，雖然各自夾雜不同鄉音，但大體上沒有嚴重的語言障礙，相互溝通不成問題；加上或有同鄉親友支援，使他們較易適應新環境。新移民鮮有自視為難民的，而他們亦未為香港政府帶來直接的難民救濟問題；教育、醫療、就業等需求大增，自然為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但這僅是一般性的社會問題。

無論如何，除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外，香港並沒有固定的難民群體；當政者與先來的居民既不會把新移民長期標籤為難民，新移民一般亦不會將自己長期標籤為難民。香港政府沒有對居港人士設定一個難民的分類類別，[3]也沒有任何難民政策，不會為新移民提供難民福利。與新移民相關的施政問題，幾乎都是指基於人口增加而造成的各種社會矛盾與壓力。

惟有了解這樣的歷史大環境，我們才看到調景嶺作為所謂「難民社區」的特殊性，看到那些居港數年乃至數十年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10.

[3]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02~103.

1960 年一項研究亦承認：「我們很難在（香港政府）官方文獻中，找出凡居住在調景嶺營中之難民，而方可特別稱為『難民』。按本港之難民問題，從廣義的說，似乎該泛指，大陸政權變遷後，使本港出現大量避難之中國人之總稱。因此調景嶺營內居住之難胞，與散居本港各地者本質上不易有所區分。」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頁 23。

而仍然自稱為「難胞」的群體的詭譎性。下節我們對此會有更詳盡的析論。

（二）難民問題與社會問題

香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便是英國殖民地，但中港兩地人口流動頻繁，對南方祖籍的低下階層而言，邊界並不具備實質意義。要待中國大陸解放，兩地實施邊境管制以後，香港居民的政治身分才告明朗化。[4]政府過去沿用貿易站的社會政策(trading post social policy)，[5]並未計劃為短暫居港人士提供教育、醫療與社會服務設施，也沒有制訂長遠的教育與社會政策；自 1949 年大量人口湧入並抉擇在香港長期定居，激烈地改變香港社會的面貌，政府才面臨嚴重困難，必須因應轉變。五十年代以後的香港歷史發展，與過去一個世紀截然不同，當然所有轉變都有醞釀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

直到 1949 年為止，香港仍未發展成製造業中心，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加上在五十年代初年，歐美政府對中國

---

[4] 劉兆佳認為：「直至 60 年代，當來自中國的移民放棄了返回社會主義祖國的念頭，而他們的後代又難以在香港以外找到家國以後，香港才開始建立一個穩定的華人社會。顯然，香港華人社會的身分認同啟端於 60 年代，並逐步地凝結起來。」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 1985~1995〉，收劉青峰等編：《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 5。

[5] Catherine Jones, ***Promoting Prosperity: The Hong Kong Way of Social Poli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1990), chap. 5.

實施禁運政策，對香港主要收入來源的轉口貿易造成打擊。大量人口湧入，遂成為影響民生與治安的嚴峻挑戰。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加強在東亞地區的參與，香港的政治與經濟處境反得以穩定下來。部分難民帶來資金和技術，其餘難民則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力，這為輕工業生產提供了優良的條件。[6]但是，要到五十年代末期以後，才能較清晰地看到難民湧入所帶來正面作用的兆頭。

第二節　特殊難民與特殊照顧

（一）政治難民

1949 年以後遷港的人士，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國內的資本家與政界人士，第二是國民政府的中下級官兵，第三是華南地區的農民。第一類移民雖然有政治地位，但與國民政府關係特別密切者多已直接遷居台灣，願意留在香港發展的大多較為低調，政治意向不強，許多從商的更有意淡化過去的政治身分與關係。第三類則是純粹的經濟難民，為追求較穩定的生活而來，並無任何政治抱負，甚至可說是政治冷感者，他們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成了遷港人口的主體。至於第二類，他們的政治意向最為鮮明，其中不少是有意遷台而被迫滯居本地者；由於他們的政治色彩濃厚，我們可視之為政治難民。

---

[6]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chap. 3.

早在 1949 年初，便已陸續有國民政府的軍政人員遷入香港，許多把他們的家眷亦一併帶來。最初國民政府仍維持對他們的接濟，故暫未構成對香港社會的嚴重困難。1949 年 10 月 14 日，廣州易手，國府全面撤退，滯港的軍政人員與眷屬頓失供給，他們遷出派館，露宿街頭，請求東華醫院供膳，成為首批難民。其後，各地陸續有軍政人員前赴香港，其中包括經過廣西十萬大山而來，在抗戰中受傷殘廢的「榮軍」；他們原居於榮軍教養院，教養院曾因避戰災而遷廣西，後復撤走，他們遂輾轉逃來香港。[7]「榮軍」連同家眷約有六百人，等候國府遣送到海南島及台灣，但在抵港以後，卻發現國府並未在生活上為他們作任何安排，致令無處棲身，流落街頭，情況堪憐。

（二）東華醫院的救濟工作

東華醫院為當時最大的華人慈善組織，除醫療外，亦承擔多項社會工作，包括將流浪外地的難民遣回原籍，派賑災民等。[8]院方與香港政府商討後，決定暫時承擔救濟這群軍事難民的任務，為他們提供一天兩頓的膳食，救助人數從一百

---

[7] 范約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二〉，《基督教週報》第 310 至 312 期（1970 年 8 月 2 日、9 日及 16 日）。

[8] 有關東華醫院的成立緣起與早期歷史，及其與香港華人社會及香港政府的微妙關係，參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多人起，到年底增至五千餘。直到 1950 年 2 月間，先後共為二十九批難民登記，持飯票人數為六千九百餘人；當人數達到七千後，東華醫院認為已屆承擔能力的上限，乃終止為新來者登記。

登記的原旨純粹是為了有效控制待救助的人數，但在日後卻產生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事實上，這是香港政府在非常情況下所同意進行（不是由政府直接做）的一次罕有的難民登記。從某個角度看，它為此批居民提供了長期自我標籤為難民的憑藉。擁有飯票的，自然是不折不扣的難民，亦可要求難民的福利或權利。

由於人數眾多，其他新移民又聞風而至，東華醫院在經濟上既無法承擔，而地方安置尤其困難，難民大量聚集於醫院附近，露宿街頭，造成嚴重滋擾，院方乃要求香港政府接回棒子。1950 年 2 月，政府終允直接協助這批難民；3 月 20 日，乃開闢香港島西環(West Point) 摩星嶺(Mount Davis) 山邊一帶，讓他們暫時棲居，仍由東華醫院負責供應膳食。

（三）暫移摩星嶺

政府最初無意將摩星嶺闢為長期的難民營，而僅視為暫時安置他們的地方，藉以頭痛醫頭地解決東華醫院一帶的露宿問題；政府期望這僅是過渡性的安排，難民早晚會遷走解散，自行解決吃住問題。故難民遷移到那裡後，並無任何設施添置，亦未建立行政管理組織。

摩星嶺是靠近海邊的荒蕪小山頭，除在抗日戰爭期間遺下的幾個防空洞外，再無片瓦遮頭。部分難民只好張羅木材油紙，蓋搭帳棚棲身；也有仍在街頭到處遊蕩露宿，僅在派飯時才折回。

摩星嶺離民居不遠，除無家可歸外，難民與其他人的生活大致無異，不少人積極在市區尋找工作，或如其他大部分新移民般在港九各處山邊闢地蓋屋，建立較像樣的家園。繼續留在摩星嶺露宿與接受救濟的，大多是不擬在港定居，卻期望在短期內遷居台灣的人。當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一個說法：惟有到摩星嶺「報到」，取得並維持難民身分的人，才有機會為台灣當局核實，接納遷台。故不少新移民無論是較後來港，或較早來港而棲居別處的，也紛紛轉到摩星嶺，加入難民的行列，這與政府原來期望他們自行散去的想法，可謂南轅北轍。

如此，難民乃是自我認同的標籤，而非被強加的身分；其最主要的意義並非新來港定居者，卻是暫棲此地而不願在港定居者。

6 月 18 日端午節，摩星嶺營地發生「秧歌舞事件」。事緣當日有一批左派工會的職工，前往難民營表演秧歌舞，難民指責此舉乃在嘲弄他們戰敗被迫淪落天涯，雙方繼而發生衝突，有數十人受傷。

（四）再遷調景嶺

為防範難民問題演變成國共鬥爭的政治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6 月 26 日，政府決定開闢九龍魔鬼山半島東麓的調景嶺[9]，將摩星嶺的難民集體以渡輪遷往。調景嶺是較摩星嶺更荒蕪的山嶺，瀕臨將軍澳，人跡稀少。只在難民營建立後，才陸續建立對外的交通管道。海路方面，主要依靠港島筲箕灣往來鯉魚門之間的汽輪；陸路方面，得翻越山嶺，步行個把小時，方抵九龍半島。1953 年以後，才有居民義務修築山路前往市區；至於汽車道路更要在 1956 年才修築通行。因此，說這裡為半禁閉式的難民營並不為過，雖然政府從來無意限制居民的行動自由，他們可以隨時離開營地，融入社會。然而隔絕的地理環境、困難的對外交通，形成一道清晰的界線，使調景嶺被確立為難民營，讓當地居民締建出一個難民社區，這與摩星嶺營地的流動情況大不一樣。

原則上，只有已在早前登記領有飯票的人才在搬遷的行列，並獲得分配食宿等基本生活需用。政府在調景嶺興建超過一千個 A 字屋棚，長闊高均約為八呎，每個 A 字棚住四個人。這次搬遷人數共有 6,921 人，包括 5,592 名男性，1,329

---

[9] 據劉義章的研究確定，香港政府行政局早於 1950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上，決定將難民由摩星嶺遷到大嶼山的梅窩。只是後來由於梅窩居民反對，才改遷他們至將軍澳。因此，遷徙的決定乃早於「秧歌舞事件」。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史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編）第 3 卷（1998 年 12 月），頁 358~9，註 1 及 2。

名女性。[10]居民來自不同省份，當中泰半是退伍軍人，但也有不少是政界與學界人士，甚至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中學校長等。據說他們一般不會輕易表露過去在大陸的身分。其後，陸續有更多人從外頭搬到這裡，僅半年不到，估計沒有飯票而居住在調景嶺的人口已達五、六千以上。[11]換言之，1950 年 12 月，調景嶺的人口已逾一萬。

（五）社會局的接管

此時政府從東華醫院接管整個難民救濟工作，由社會局（Social Welfare Office，1958 年始改組為社會福利署）負責，成立社會局調景嶺辦公處(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Relief Committee Service Centre) ，為居民登記編號，發給領飯憑證，每天供應兩頓膳食，定額為每月三十斤米。

政府的救濟範圍有限，除闢地安置外，便是供應膳食。東華醫院則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其他服務便由教會與其他社團組織籌募捐款，它們為居民解決棚寮、寒衣、醫藥用具、剃髮、茶水等基本生活需用。

---

[10] 據 1950 年的調查，這六千餘人中，大多數為成年男性，年齡介乎二十至四十歲之間。十六歲以上的婦女只有 577 人，十五歲以下兒童則有 610 人；傷殘人士 1,763 人，他們的家屬有 477 人。***Social Survey—Squatters (Rennie's Mill Village)***，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22〉。

[11] 正源：〈從摩星嶺到調景嶺〉，《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2。

雖然有台灣背景的研究記述，咸稱香港政府漠視難民的需要，在各方面的安排與供應有欠周善；而來自難民群體的責難便更多，諸如調景嶺地理位置偏僻、難民營設備不佳、衛生條件惡劣、膳食供應欠善等，甚至有說把這些難民充軍到偏遠的調景嶺乃出於政治上的陰謀，彷彿他們是被武力遷徙，沒有選擇餘地。[12]這些記述背後假設香港政府本來便有難民救濟的政策與資源，而這群難民乃特別遭到歧視待遇者。但真相是：當時期遷港的國內人士每年都超過二十萬，而調景嶺難民營最高紀錄時亦僅兩萬一千人，[13]所佔比例有限。絕大多數新來港人士，都不曾獲得香港政府分文接濟，沒有免費膳食供應，遑論闢地供其蓋房。以香港政府當時的財力，不可能承擔照顧源源不絕的新遷港者；而其一貫政策，亦沒有將由國內遷港人士視作難民，新來港者總是自行尋找生計，融入社會。與七十年代香港建設禁閉式難民營以收容越南船民的情況截然不同，沒有人被強迫遷徙到調景嶺，[14]

---

[12] 〈郝次航先生訪談錄〉，收胡春惠主訪、李谷城等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頁 176，188；調景嶺全體居民反迫遷保權益委員會：〈調景嶺居民四十餘年血淚滄桑史〉，《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245。

[13]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香港：該會，1959），頁 4。此書兼有中英文譯本，英文名字為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Relief Committee***，內容略有差異；本文以徵引中文本為主，遇有英文本不同而又資料更詳盡者，才特別註明使用英文版。

[14] 「當時並不是強迫性的，他們只說：『你們可以不去，可以

即使遷入調景嶺以後，居民的行動仍然自由，他們可以出外尋找工作，賃屋而居；當然其時找工作與房子並不容易，但困難程度亦不過與其他上百萬新遷港者相若。[15]香港政府並無強迫遷徙這群難民到調景嶺，只是把難民救濟中心遷往調景嶺而已，難民的去留是完全自主及自如的。

筆者相信，香港政府種種救濟措施，乃是基於這群難民的特殊政治背景而作出的特殊安排，要非他們有特殊背景，或會引發敏感的政治問題，則便連有限的接濟亦不會有。[16]與其他遷港人士相較，他們其實是獲得特殊優待而非備受歧視的一群。

香港政府在調景嶺設立難民收容中心，原僅為權宜計，一方面無意將這群政治難民聚攏一起，另方面不願長期承擔照顧難民的經濟支出（每年超過港幣一百萬元）。[17]事實上，

任意到其他地方，但到調景嶺，我們會給兩餐飯吃，還有地方住。』大家就這樣到了調景嶺。」〈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111。

[15] 有關五十年代木屋區居民的苦況，參葉錫恩(Elsie Tu)：《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頁 112。

[16] 王國儀指出：「而在這些難民中，香港政府最注意的是一批軍人，他們年輕，又打過仗，剛巧摩星嶺這批人中，外省來的軍人居多，同時又已發生過政治衝突（摩星嶺事件），港英政府才會在八天後就把他們搬到這麼孤僻的地方。」〈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頁 131。翻閱當時期的政府文件，確實是將調景嶺營稱為國民黨軍隊難民營(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的，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156, D.&S. no: 1/2876〉，〈HKRS no: 156, D.&S. no: 1/2877〉。

[17] 1950 年 6 月 14 日，香港政府制訂難民營頭三個月的預算，

政府亦不斷遭受來自中國大陸及香港親共團體的壓力，被指窩藏「國特」，別有用心。故在 1950 年 8 月，政府即以廣東籍難民在港鄉親較多，沒有語言障礙為理由，欲收回他們的飯票，從而使他們離開，以減少聚居人數，卻為居民激烈反抗，且以絕食相威脅，結果無法實施。政府曾多次計劃停止供膳，亦為居民及台灣方面相阻。

1953 年 2 月後，香港政府終於停止全面為居民提供免費膳食，只繼續援助 982 名傷殘難民[18]（是項補助隨此批傷殘難民於 1955 年 9 月多數遷台後終止）。社會局駐調景嶺辦事處仍然存在，但大多數職員都已調離，難民營僅餘少量工作人員。

第三節　調景嶺營的奠基及其政治含義

（一）救總的參與

調景嶺營最初是由香港政府建立的，但它能長期維持下去，卻端在於台灣政府的參與和投資。

便已達三十五萬港元，其中食物一項便超過三十萬。"Colonial Secretariat to Social Welfare Officer," (Ref.: 1/4801/50)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156, D.&S. no: 1/2876〉。

[18]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Relief Committee***,4.

台灣政府於 1950 年 4 月 4 日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援助滯港難民。救總匯款支援調景嶺的居民，又多次派員入營視察。1952 年冬，「救總」匯撥港幣六十萬元，舉辦冬令救濟，凡貧苦難民，均獲發救助金，其中百分之六十，即約三十餘萬元，乃專撥給調景嶺居民。

在香港政府停止為調景嶺居民提供膳食後，「救總」立即接管，按飯票名冊發放米代金，大口每人每月十六元，小口十元，月用金額二萬五千元。「救總」每年撥出款項，修建道路、水庫水壩水井，改善調景嶺營的公共設施，幫助居民安居斯地。又與香港各社團聯絡，組成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簡稱「救委會」），最初設在中華總商會內（主席為高卓雄），1955 年移交轉設在九龍總商會內（會長為謝伯昌），作為管理調景嶺營的董事會。為使調景嶺營能長期維持與運作下去，「救總」又在營內成立調景嶺難民自治辦公室，統籌大小事務，所聘職員由「救委會」負責支薪。

難民自治辦公室設有糾察隊，維持區內治安，功能一如警察隊。由於營內並未駐有消防與警察隊伍，故保甲與自治糾察擔當了重要的治安與防災角色；糾察隊也具有政治功能，審定遷入居民的政治身分、實施宵禁，甚至對涉嫌左派人士施以私刑，儼如王國衛隊。[19]

---

[19] 調景嶺營的保甲制度，絕非如日後所說的純粹為社會治安的緣故，事實上，至少在最早期的文字資料裡，我們看到所謂居民自衛隊裡，竟然有直屬的「政工」人員。方適存：〈第一次區甲保長會議施政報告〉，《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2。

有人為這個奇特的情況辯解說：[20]

由於難民群中，不少原為國民政府過去在大陸之軍政人員，他們對行政工作，多有經驗，觀察當時之情勢，難免有敵對份子從中破壞，故商得營負責當局之同意，乃設立自治單位，除成立自治辦公室為總機構外，並按當時嶺內之難胞居住形勢之地區單位，做照自由中國之保甲制度，設置五個區公所，下再分設保甲、及戶，加以自治。主要的目的只是在要公共秩序之維持，並協助當局防止不法份子之從中破壞，當時並設立自治糾察隊，且多由舊日之軍警人員擔任。經常維持公共秩序，有時對來歷不明者，也加以查詢。

至 1959 年，為免香港政府尷尬（也可能是在香港政府的要求下），乃將難民自治辦公室易名為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駐營服務處，難民自治糾察隊則易名工作隊。

（二）反共基地的營建

按照香港政府原來構想，這群滯港的政治難民很快便會轉遷台灣，或者陸續離開調景嶺遷入市區，融入主流社會，不致聚集成群，造成政治危機，故沒有建設社區和提供公共設施的計劃，一切都因陋就簡。而如前所說，早期許多難民

而香港政府社會局的韋玉輝代局長在巡視調景嶺時，亦勸諭難民「謹守香港法令，澈底與辦公號合作，如發現政治活動份子在營內搗亂時，應投辦公室辦理，不可以暴力從事。」嶺梅：〈港九各界首長視察調景嶺紀實〉，同前刊，頁 4。

[20]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21~22。

亦無久居香港的打算，他們都盼望很快獲得台灣方面接收，在海峽對岸開始新生活。[21]調景嶺營只是那些不擬長期居港、融入社會者的暫時中轉站。

但是，台灣政府根本無意全盤接收難民，[22]寧願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透過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長期在經濟上支持難民生計，動機大抵不外兩個：其一是省卻對安置遷台難民的支出，[23]包括榮民補助費與慰問金；[24]其二則是

---

[21] 范約翰：〈調景嶺史話——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一〉，《基督教週報》第 306 期（1970 年 7 月 5 日），頁 3。

[22] 香港政府社會局長黎敦義在與台灣方面商討有關港方停止供應膳食問題時，曾於 1952 年 10 月 8 日修函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在信中率直指出：「難胞意欲前往台灣，惟貴會在處置此等難胞之入境方面，自亦頗多困難，對於此點，本局十分同情；不過關於貴會所稱香港政府之停伙決定，使貴會工作招致困難一點，本局似難同意。而調景嶺內幾乎三分之一全為盲瞎殘廢之輩，此等殘廢者，何以迄今未蒙有關當局安置入台？本局對此，尤屬難解！此種殘廢者流，按理宜於救濟上獲得優先之考慮；惟迄未有一人獲准入台。香港政府及其他慈善機關，於此等殘廢之輩入台手續方面，不僅願為其作各種需要之措置，且願代付其入台之船費，關於調景嶺內凡持有飯票之難民，在停伙之後或停伙之前，如願入台，可獲免費乘船之權利。……」信函收〈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調景嶺營〉，《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229~230。

[23]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ham)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我們也不認為戰敗的國民黨軍隊會大量擁入香港……，雖然後來的確有幾千名國民黨士兵進入了香港，他們是不受歡迎的，而且也帶來了不少損失，在我們和中國政府之間造成尷尬，尤其是他們之中有些是從事反北京的活動。因此而被捕的人會遞解去台灣。把他們全部送到台灣去，我們猜想他們會受到歡迎的，因為他們曾經為蔣介石作戰。可是那裡的政府不願意接收他們，藉詞其中可能潛有間諜；想到台灣已經有了許多這類的

為了在香港經營一個反共基地。[25]在五十年代初期，台灣政府財政並不充裕，而大量移入人口亦構成各方面的社會問題，因此省錢的動機理應毋庸懷疑；但隨著經濟情況逐漸好轉，台灣要吸納多一萬人口，根本不成為困難；而維持調景嶺營所需的常年經費，亦遠超於一次過將居民遷徙入台的特殊支出。據台灣方面自己統計，「救總」救助調景嶺難民的經費，平均每年約在新台幣三百五十萬；而自 1950 至 1994 年，透過「救總」救助難民的金額，達十一億三千七百多萬之鉅。[26]所以，在香港經營反共基地才是維持調景嶺營的唯一動機。

人時，我覺得這個藉口是站不住腳的。不接受他們的真正理由是：倘若把這些人留在香港的話，國民黨的政府便可省了負擔他們生活的費用了。有一次我在紐約遇到了剛在那裡的聯合國開會的國民黨外交部長葉公超時，他對我這個看法直認不諱。」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Via Port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頁 182。

不過，經濟理由頂多是次要的考慮。在 1951 年以前，即中央政府遷台的頭幾年，台灣確實面臨財政支絀、物資短缺的嚴重困擾，但這些問題在大量美援輸入後迅速得到改善。參裴斐(Nathaniel Peffer)、韋慕庭(Martin Wilbur)訪問、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133 及後。

[24] 林照真：〈難民，老兵，歷史債——國共內戰下理不清的傷痕〉，《中國時報》1994 年 3 月 7 日，頁 8。

[25] 有關調景嶺的政治功能，參台灣方面的自述：〈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調景嶺營〉，頁 225~228；另林照真：〈香港最後一面國旗——調景嶺青天難再〉一文，亦指出調景嶺為香港的「反共堡壘」「反共大本營」，《中國時報》1994 年 3 月 7 日，頁 8。

[26] 成器：〈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結束——兼談救總與調景嶺的情感〉，《海外學人》第 274 期（1995 年 7 月），頁 32。

香港政府於六十年代初期收緊對中國的難民政策，限制入境人數，台灣政府對此曾在各個公開場合表示抗議，並宣稱其願意接收所有希望到台灣定居的難民；香港政府旋即明確回應，指出自 1949 至 1962 年，從大陸抵港的有一百五十萬人，台灣只接收了其中的一萬五千，僅百分之一，可見其對接收滯港難民的誠意。[27]

在輿論壓力與外國經濟援助下，1955 年 4 月間，台灣將居住在調景嶺難民營的傷殘人士連同家眷共 795 人運送到台灣。至 1960 年，留在營中的傷殘人士僅餘 77 人，其中部分是不願遷往台灣而選擇留港的。[28]

台灣又積極將香港的難民問題國際化，一方面爭取海外資源，以為救濟難民之用，另方面亦希望藉以製造壓力，制肘香港政府將調景嶺營取消的意向和行動。「救總」又向美國及聯合國申請撥款援助滯港的中國難民，1954 年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援助美金四萬三千元。由於事件提升至國際層次，

---

[27]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88~89.

1961 年 6 月就香港政府將調景嶺由難民營改為徙置區的事件，台灣當局與港府發生爭論時，已有官員私下表示不宜發表令港府困擾的強烈言論，他們曾提出疑問謂：「假如香港政府當局建議將此等人送來台灣，又將如何？」從這番話，可見他們在接收調景嶺居民所持的態度。《工商日報》1961 年 6 月 5 日。

[28]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31~32。

在廣泛宣傳下，來自西方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的援助，遂絡繹不絕。[29]

香港難民問題國際化的極致，是在 1958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第十三屆常會中議決將 1959 年定為世界難民年，呼籲各國政府與各志願團體提供較多財政援助，以解決各地的難民問題。會議將四種難民定為世界難民年救助的對象，其中一種便是居留於香港的中國難民。為此，聯合國祕書長韓瑪紹(Dag Hammarskjold, 1905~1961)指派其特別助理前來香港及台灣視察，商討關於中國難民的救濟問題。台灣亦成立世界難民年中國委員會，以救總的人員和機構為基礎，推動對滯居香港的中國難民的援助，主要項目為補助調景嶺的教育與社會設施，及居民救濟等。台灣政府比香港政府更積極要解決香港的難民問題，目的是要強調香港確實有難民問題。毫無疑問，台灣政府眼中的中國難民，主要便是這個帶有強烈政治含義的調景嶺社區的居民。[30]

香港政府當然歡迎海外的金錢和物資援助，作為濟貧福利之用。但其一貫政策，並不視調景嶺居民為「難民」，亦不情願為他們提供任何特殊的難民供應。1961 年 6 月，徙置事務處長莫理臣在答覆居民有關將調景嶺改作平房區的疑慮時，便明確指出：「關於區內貧苦居民之救助問題，本處長

---

[29] 〈籲請聯合國救濟香港難民經過摘要〉，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附錄〉，頁 9~10。

[30]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10。

現奉督憲諭，特向台端著重聲明，凡屬貧苦之調景嶺居民均能以香港居民之資格，申請救助，與居住於香港、九龍及新界各地之其他人士無異。」[31]換言之，所謂「難民」不過是一般的居民，「難民救濟」亦僅屬一般性的貧民救濟。但是，台灣方面卻強烈期望維持調景嶺的「難民營」與居民的「難民」身分，寧可每年花鉅資亦要在香港營建這個反共基地。甚至在多數居民已離開大陸、在香港生活十年後，救總的負責人谷正綱仍堅持稱他們為政治難民，要求香港政府給予特殊區別與處理。[32]

（三）調景嶺營的長期維持

調景嶺的居民中，確實有部分迫切等候遷居台灣，在彼岸才開始新生活，而視在調景嶺的日子為短暫的過渡時期，除被動的接受救濟外，再無其他打算，這些人確實有難民心態。但是必須指出，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卻有更多人把調景嶺視為長久家園，積極改善生活條件，在此安居樂業。譬如建營後不到一年，便陸續有人拆掉原有的 A 字棚，以木材與其他物料建造較為堅固的房子，[33]或另外開闢山地以建造

---

[31] 徙置事務處長莫理臣：〈香港政府覆調景嶺居民書〉（譯本），1961 年 6 月 15 日。原件影印本由調景嶺居民自編的歷史資料集，缺編者名、書名、出版資料，蒙陳國英女士借閱。

[32] 《香港時報》1961 年 6 月 4 日。

[33] 崔冠軍牧師說他在住入調景嶺營的第二年，便利用 A 字棚的木料建成一間 250 呎的房屋；其他人紛紛學　，不多久，A 字棚便被拆卸淨盡。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房屋；他們努力尋找謀生的機會，結婚生子，組織家庭，為營內兒童開闢教育資源。其中有部分人根本不打算甚或明確拒絕到台灣。當然，對這群再無政治含義的難民心態的調景嶺居民而言，他們還是強烈期望保留其「難民」身分；手持難胞證，即使不住在調景嶺，每月還是可從救總獲得來自台灣的生活補貼，享有子女赴台升學的各種優待。他們是具經濟含義的難民。

第一批遷入調景嶺的人，不少在三數年後，因轉遷台灣或到城市尋覓工作而離開此地。由於得到各方面的供應，難民生活有所改善，卻有不少外來人士遷入，[34]他們或從遷走的原居民手中頂讓房屋、居民證與飯票，或自行在山上挖泥闢地建屋，社區遂得以維持。1954 年，人口與 1950 年初開營時相若，但泰半是新遷入居民。[35]據估計，自 1950 至 1960 年，約共有十萬人以下的難民先後在調景嶺短期或長期居住，五十年代初期最高峰時達二萬餘人，其後穩定下降至約一萬人，至 1960 年 7 月，經統計為 6,829 人。[36]這些後來者較多抱長期定居的心態，努力營建社區。

---

[34] 譬如陳寶善便是在 1957 年生意失敗後才搬進調景嶺，在那裡經營學生宿舍。〈陳寶善先生訪談錄〉，《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156~158。

[35]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15.

[36]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29。

他們成立各種社團組織，諸如同鄉會與同學會，社團組織甚至擴展到調景嶺營以外。[37]

六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為避免調景嶺變成獨立王國，不受控制，乃改變一向以來的消極政策，主動參與社區建設。1961 年，將調景嶺改建為平房徙置區，調景嶺營亦因之易名為調景嶺村。政府為居民登記，禁止私下增建房屋，又鋪設水電，建立警察、消防、郵政及醫療等公共設備及機關。1959 年 7 月，警務處政治部勸諭營內各社團停止活動，否則將被視為非法組織。1964 年後，調景嶺難民營服務處的糾察隊解散。

香港政府參與管理調景嶺，引來居民激烈的反抗，甚至有跳海自殺以作抗議，台灣方面亦將有關問題提升至複雜的國際性政治與社會議題。最後政府讓步，港督公開承諾讓調景嶺居民無限期居留，以安撫民心。有關爭論種種，已超越本文的時限範圍，茲從略。[38]

---

[37] 據 1960 年的估計，「大約有近十五萬之難胞，曾在難民營中各同鄉會中自動登記，且取得會員證，在會員證的封面上，往往是印上其原籍之本省地圖，和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雖說多數人申請加入社團的目的，是為了便利申請前赴台灣，及獲得救濟福利，但這仍形構一個政治上的實力。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41。

[38] 詳情參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156, D.&S. no: 1/2876〉。

第二章

調景嶺營以前基督教會的事工

從本章起，我們會跳過一般性的政治經濟討論，專注敘述基督教的組織與個人在調景嶺社區裡的各種參與。本章首先介紹調景嶺開營前的兩個預備階段：東華醫院時期與摩星嶺時期。

在論及基督教於這群特殊的政治難民中間的事工前，必須先說明基督教所能提供的資源。在物資方面，主要由一些大型的基督教國際救援組織供給；而在人力方面，則是由一群從中國出來的傳教士組成了向難民傳教的生力軍。

第一節　志願機構的黃金時期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政府仍是小政府的格局，必須維持平衡的財政預算，對社會民生的參與和承擔能力有限，社

會福利僅佔整體開支的百分之一，[1]無法從事大規模的難民救濟工作；填補這方面空缺的，主要是雲集此地的國際志願機構，而這也是政府有計劃的政策。[2]冼玉儀說：[3]

> 五十年代，在香港社會辦理福利活躍的是一些國際志願團體。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來，引起了國際間的關注，令香港獲得很多的支援。有些西方國家還藉著救濟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人，變相的攢取抗共的政治本錢。當時，一些在戰前已經在香港活動的團體，如紅十字會、救世軍等，從總部分配到更多的物資；一些原來在內地工作的團體在解放後，被迫撤退到香港，改為為香港服務。另一方面亦有新的團體在這時候成立，如「美國天主教社會福利會」(1949)、「普世教會難民移民處」(1951)等。一時香港的社會福利界十分熱鬧。有人稱五十年代為香港接受國際援助的「黃金時期」，一點兒沒誇張。

稱此時期為志願機構發展的黃金時期的是華元康(Paul R. Webb)。他指出，五十年代初期，有好些國際性的機構加入香港的社會救濟與福利工作，它們絕大多數都是基督教機

---

[1] 這是整個五十年代的大致比例。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56~157。

[2]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34.

[3]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收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上冊，頁 199。

構，或是宗派性的附屬組織，或是跨宗派的聯合機構，或是超宗派的獨立機構，包括美國天主教救濟服務處(Catholic Relief Services，1949)[4]、國際癩瘋救濟會(The Leprosy Mission，1950)[5]、普世教會協會難民服務處(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Refugee Service，1951)[6]、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1952)[7]、基督教世界服務處(Church World Service，1952)[8]、衛理海外救濟會(Methodist Committee for

---

[4] 原稱中國天主教福音委員會，1949 年遷港，成立辦事處。後易名為天主教福利會。

[5] 國際癩瘋救濟會香港協會辦理喜靈洲癩瘋病院，1954 年時收容男女老幼病人 360 餘人。《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一九五四年)》(香港：香港政府社會局[？]，1954[？])，頁 50~51。

[6] 香港辦事處後易名為普世教會協會難民及移民服務組(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Migration Unit)。香港辦事處在 1978 年加入成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一部分。

[7] 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的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1952 年，普世教會協會與世界信義宗聯會在香港成立一個聯合機構，協助欲離開中國而無法成行的外國難民，特別是白俄羅斯人與猶太人。兩年後，有 3,267 人成功藉這機構的幫助而取得外國簽證。1954 年，當外國難民工作告一段落後，世界信義宗聯會轉而從事香港難民救濟工作，世界信義宗社會服務處(Lutheran World Service)在香港成立辦事處，推動各項社會服務工作，包括育幼、醫療、職業訓練、物資補助及兒童營養、助學、復康、戒毒、社區服務及發展等。1975 年 12 月 31 日，世界信義宗香港社會服務處與香港基督教服務委員會合併，成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服務社會的機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有關世界信義宗香港社會服務處在香港的工作，參 Jens Holger Schjørring, et. al., eds., ***From Federation to Communion: The History of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7), 102, 114。

[8] 基督教世界服務處成立於 1946 至 1947 年。這是美國教會

Overseas Relief，1953)[9]、聯合長老會個案中心(Presbyterian Mandarin Casework Centre，1955)[10]、兒童助養計劃(Foster Parents' Plan)[11]及明愛中心(Caritas)等。[12]

為援助二次大戰後歐洲的重建而成立的機構。五十年代以後，工作伸展至亞洲。該會於 1952 年開始在香港工作，成立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香港分會。1967 年，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與香港基督教福利及救濟協會合併成為香港基督教服務委員會，繼後成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附屬機構。參 Church World Service, http.//www.churchworldservice.org/indexy.html, 2000 年 2 月 14 日。

[9] 衛理海外救濟會乃於 1940 年在 Bishop Herbert Welch 主持的美國衛理宗大會中成立。1950 年起，委員會開始關注與中國有關的事工，包括香港、新加坡、台灣等地的中國難民。1968 年，在 Evangelical United Brethren Church 加入下，委員會易名為 United Methodist Committee for Overseas Relief（簡稱 UMCOR）。參 Norma Kehrberg, ***Love in Action, UMCOR: 50 Years of Servic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9), 55, 62, 70。

[10] 聯合長老會個案中心的成立目的，是為一些不懂廣州話的北方難民提供援助，藉著家訪與財政補助，協助難民自力更新。機構的經濟來源為美國聯合長老會(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後易名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The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 Centre)。

[11] 兒童助養計劃成立於 1937 年，旨在為有經濟需要的兒童（特別是難民兒童）尋找國際的贊助人。國際總部設在 Rhode Island 的 Warwick。1948 年該會開始在中國提供服務，1959 年在香港設辦事處，至 1973 年結束，工作了十四年。有關香港歷史部分，參 Henry D. Molumphy, ***For Common Decency: The History of Foster Parents Plan 1937~1983*** (Warwick, RI: Foster Parents Plan International, c1984), 171~183。

[12] Paul R. Webb,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編：《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香港：該院，1977），頁 137。華元康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前助理總幹事。

單以 1953 至 1954 年一年為例，天主教福利會在香港分派的舊衣計有一百萬磅、奶粉五十萬磅；此外，毛氈數千張、醫藥無數及每包值三十港元的乾糧一千四百包，代付赴台難民數百名船費。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香港分會在同年分派麵粉一千五百多包給貧民，另分派奶粉一百八十噸（供每日二萬三千人八個月之飲量），另分派香皂、維他命及過千包的衣服和被褥。[13]可見救援物資數量的驚人。

周永新說：[14]

> 這些機構開始時都是以救濟為主，把大量物資和糧食由歐美各國捐募來港，派發給香港的難民。在五十年代初期，捐募來港的物資非常龐大，數量遠超過政府本身的救濟服務。就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這些機構所派發的食物仍然十分驚人，每年差不多有二萬噸之多。

周永新所舉數字大抵來自 Matthew Wei，他在 1960 年記述說：[15]

> 不同國家的許多團體與個人為香港難民提供慷慨的援助。根據美國農業貿易發展及援助法案，單在 1958 年，美國政府便為香港難民供應了 15,500 噸糧食，此包括小麥、麵粉、米、粟類食品、奶粉與豆。英國、挪威、

---

[13] 《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一九五四年）》，頁 66~67。

[14]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出版印務，1980），頁 17。

[15] Matthew Wei, "Refugee Problems in Hong Kong,"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iv~v。

澳洲及其他國家，亦為香港難民的許多緊急需要給予援助。據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的報告，在 1960 年，香港獲得有關難民需要的援助有：

國際難民年捐款	美金$654,174.00
其他捐款	美金 $76,315.00
合共	美金$730,489.00

1953 年，在香港從事福利救濟事工的教會與機構，共同組成香港基督教福利與救濟協會 (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 Relief Council) ，至 1962 年共有廿六個成員，包括前述的基督教世界服務處、信義宗世界服務處等。[16]

以上所提有基督教背景的國際救援機構大都是以全港的新移民為服務對象，並不專事調景嶺的居民，但它們是調景嶺的教會救濟工作的主要物資供應者，沒有它們的施贈，調景嶺的教會救濟事工便無法開展。

在此時期專注於調景嶺難民工作的基督教團體，多是規模較小的差會與教會，它們包括了冼玉儀所提的三個類別，即在戰前便已成立的團體、從國內遷移到香港的團體，及在五十年代新成立的團體。先是第一類別的團體發現難民的需

---

[16] ***Of Such is the Kingdom: 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 Relief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62*** (n.p, n.d.)

要，然後由第二類別的團體承擔有關的工作，最後再有第三類別的新團體成立。從參與的人數與長期性而言，均以第二類最為突出，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二節　滯港的傳教資源

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香港的傳教事業並不發達。筆者曾在別處指出：[17]

> 自開埠以來，香港長期成為外國差會在華南宣教的後勤基地。不過，由於流動人口過多，香港本土的福音工作發展並不蓬勃；宣教士志不在香港，專注開拓人口更為密集的珠江三角洲鄉鎮，也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抗日戰爭以前，香港只有三十多間教會。二十年代宣教事業最高峰的時期，來華宣教團體有一百五十多個，其中約只有十分之一在香港兼辦事工。

與此同時，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卻一直是基督教全球最大的傳教工場，西方國家在此投入了最多的人力與財力資源；即使因著八年抗戰，傳教士人數大幅削減，但在 1949 年政權轉易時，在華的更正教傳教士亦超過三千五百人。他們在 1949 至 1952 年間，被迫撤離中國。其中部分退休返國，部分被所屬差會調遣到其他國家繼續工作，特別是華人聚居的台灣與東南亞；另有部分則滯留香港，等待重返中國的機會。因此，香港基督教的傳教資源於五十年代初期激增。

---

[17]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 164。

隨著人口與傳教資源同時增加，五十年代是香港教會有史以來增長最高速的時期。在堂會數目方面，1955 年為 162 間，1962 年增至 344 間；至於信徒人數，1955 年有 53,017 人，1962 年為 112,200 人。[18]六十年代以後，增長速度便放緩下來。

參與調景嶺工作的教會人士多為外籍傳教士。他們原在中國大陸傳教，因政權轉易而被迫來港，可說是跟難民一起遷來。他們的差會在香港不一定已有事工，即或有固定工場，亦不一定能容下突然激增的人手；[19]而無法操廣州話，也構成他們向本地人傳教的「障礙」。因此，他們大多不會加入原來已開展的事工，卻願意在同操外省語言的難民中間工作。筆者曾這樣寫道：[20]

> 1949 年後，中國大陸解放，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隨他們南遷的尚有許多被迫離開中國原來工場的宣教士。在中國解放後頭幾年時間，歐美差會大多對香港的政治前

---

[18] Earl Herbert Cressy,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Hong Kong: Private Printing, 1960), 2; Earl Herbert Cressy,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Hong Kong: Private Printing, 1964), 2.

[19] 當時無論是天主教抑或基督教，都有大量「下崗」的傳教士匯集香港，等候他們的差會另作安排。天主教方面可參 Bill Surface &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Maryknoll in Hong Kong***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63), 31。此書記述天主教瑪利諾修會在五十年代以後在香港木屋區的救濟與傳教工作，雖然地點不在調景嶺，但許多背景還是值得參考的。

[20]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 164。

> 途持悲觀的態度，相信香港很快便會陷入共產黨之手，而基督教事業亦不可避免會遭逢如國內般的浩劫，故他們不大熱衷在此地建立新的事工，多主張把宣教士遣調到東南亞等工場。不過，部分宣教士卻對他們艱苦經營多年的宣教工場心存戀棧，特別是那些已投注大半生在中國的中年宣教士，他們對重新適應新工場學習新的語言文化心存抗拒，寧願留在香港這個大陸邊緣的最後西方據點，佇候福音之門重開的機會，並服事眼前可見大量滯留在小島上的難民。因此在五十年代，陸續有差會在香港建立宣教據點，開設福音堂，興辦各種教育與救濟事工。這個新工場的開闢大多不是經過周詳的部署，而是出於某些宣教士的要求才促成的。

如筆者在前段引文中所指，原來在港並無事工的差會，鮮會在 1949 年前後一下子便計劃將工作重點轉移到香港。方是時，在大部分政治分析家眼中，香港落入共產黨之手只是朝夕的事，差會從大陸撤出時剛喪失了所有在華的投資，很難想像他們敢於冒險地挪用新資源以投放在這個華南的邊緣危城。所以，這些差會之在香港開基，純粹出於偶然的人為因素，就是一些對中國人有強烈負擔、對華人事工眷戀難棄的傳教士，把握滯留在香港的短時間，自行尋覓傳教機會，證明這裡尚是有可為之處，然後向差會總部爭取認可他們留下工作。一切都是在工場的傳教士所主導，而非差會原定的計劃。

且以信義會挪威豫鄂陝差會（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後稱挪威信義差會）為例：[21]

> NLM 自一九四八年起開始撤出在中國的宣教士，其中部分隨著各國宣教士的撤離，來到英國租借地香港。到了一九四九年中，NLM 在豫鄂陝地區的宣教士皆已撤離，那年十月十日召聚了所有 NLM 在香港的宣教士商討宣教事工的路向，在這宣教會議中議決：自中國撤出的宣教士，應分別轉往日本或衣索匹亞，以配合 NLM 宣教異象的擴大。然而仍有少部分宣教士認為，應留在香港繼續華人宣教的事工，並等候未來中國政局的發展，把握宣教的契機。因此，有五位宣教士留在香港，再加上原豫鄂陝信義會監督劉道生牧師夫婦的投入，一同在大批聚居的難民中展開宣教工作。

滯留香港的傳教士，可以再分為兩類，其一是受具歷史與規模的差會所差遣來華的人，其二是受小型的信心差會或以信心傳教士的形式來華的人。前者大都不會是獨自一人撤退來港，他們若能爭取到差會同意在香港開設新傳教區，一般都能獲得充裕的資源，可以很快發展各樣事工；但後者由於各方面的資源都匱乏，隻身居港，要從零開始建立新工作，便非常不容易。以在調景嶺有工作的傳教士為例，信義會與路德會的傳教士乃屬於前者，宣道會與神召會由於差會資源不多，可說介乎兩者之間，而建立錫安堂的戴瑞蘭教士 (Gertrud Tragradh)，則是典型的後類傳教士。

---

[21] 杜聖恩：《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教會史略》（台北：中國基督教信義會，1994），頁 45。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南遷滯港的差會與傳教士，積極參與難民救濟，尋找傳教機會；原來在香港發展經年的差會和教會，卻沒有很大興趣參與是項工作。[22]他們或會派員間中入營探訪，參與傳教與慈惠服務，長期投身卻甚罕見，在難民營建立教會的更絕無僅有。他們難以抽撥人手和資源全力發展這裡的事工，只是一個不成原因的原因；難民的籍貫、語言、生活習慣、經濟狀況等，均與本地人存在差異，彼此難以相混，才是造成本地教會對難民事工卻步的主因。[23]下面提到崇真會在極短暫時間內於調景嶺開設及結束佈道所，是其中的鮮明例子。

至於天主教方面，情況大致與更正教相若。根據梵諦岡教廷的原來決定，所有傳教修會與人員都得盡可能留在中國，不應離開崗位，但是隨著政治形勢惡化，特別是某些地區的反教情況嚴重，還是有二、三百中外神職人員撤

---

[22] 如陳勃等編的調查便指出：「在該營成立的禮拜堂，計有錫安堂、信義會、路德會、宣道會、天主堂、神召會、崇真會、安息日會、基督末世教會等。但在香港極著名之聖公會、循道會、浸信會等，在營中倒沒有會址。」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45~46。

[23] 也許這個例子的代表性有限：吳明節牧師（香港信義會前監督）在五十年代初年於神學院畢業後，被派到信義會聯合國語禮拜堂工作；他在那裡帶領了數百名新遷港人士信教，但竟為教會領導層指責，要求他把這些難民送到「難民教會」去，以免破壞教會原來和諧一致的生活。吳明節：《恩海浮沉錄》（香港：靈文書房，1991），頁 106~107。另參范約翰：〈入營以前（遷往摩星嶺）——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三〉，《基督教週報》第 317 期（1970 年 9 月 20 日）。

退到香港。鑑於教廷所作留在原地的決定，香港教區甚難接收並重新安置他們，而事實上霎時間不可能產生這麼多的工作崗位，只能被動地任由他們留下來。這些傳教士所屬的修會若向來便有事工在香港，便由修會直接為他們安排工作；若是沒有，則他們便得聽從修會遣調，轉到其他國家開展新工作。[24]至於隻身來港的國籍神父，要是沒有現存的修會願意收容，香港教區主教便只能勸諭他們或回中國、或到台灣，自尋出路。

教區並不允許撤退來港的修會在此地紮根，建立長久根據地，五十年代在調景嶺工作的耀漢小兄弟會亦只得遷往台灣，在那裡尋找發展的空間。

第三節　東華醫院時期

（一）趙君影師母與九龍塘宣道會婦女會

基督教的調景嶺難民救濟工作是這樣開始的：早在難民聚集東華醫院附近時，便已有基督徒發起對難民關懷和傳教。根據范約翰[25]的記述：[26]

---

[24] 部分分析來自對夏其龍神父的訪問。

[25] 范約翰生於 1933 年，原籍江蘇嘉興，因妻子逝世而投軍，在軍中從事文職；曾兩度被共軍俘虜。1949 年 12 月 30 日來港。1950 年春在靈糧堂受浸。1952 年，范約翰在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工作，一年半後轉到調景嶺中學任教。1957 年，在艾喜德教士的資助下，到英國攻讀神學。1960 年回港後，曾於聖徒聚會所牧會，後轉任職於出版機構，包括真理出版社、信義宗教育事工委員會、福音

那時只有九龍塘有一個婦女禱告會，某位醫生夫人和□□□師母等看到就說，既然有難胞來到香港，我們為甚麼不去看一看他們，向他們傳福音呢？於是他們約了住在大埔巴色會的幾位西國教士，並打電話給幾間神學院院長，請他們也派人到東華醫院附近，向難胞傳福音。剛好許多西國教士都是原先在內地傳道的，他們在香港正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現在有了這個使用國語的機會，就不禁髀肉復生了。於是他們攜帶些福音單張，掛圖，小冊，和聖經等類書本，向難胞派送，開始撒種的工作，向難胞個人佈道……。難胞們在香港既人地生疏，言語不通，加以窮愁潦倒，徬徨無定，現在有北方鄉音之中西傳道人不嫌鄙陋，翩然蒞止，儘管所談的不盡明白，但是對他們的這番盛意，卻不能不表示感激。

以上打了空格的人名是趙君影[27]師母，她對難民聚集於東華醫院流離失所的情況非常關注，積極鼓吹基督教會參與

證主協會等。譯作甚多，著有《瓦器藏珍》（香港：道聲出版社，1977），書中提到不少在調景嶺的事蹟。

[26] 范約翰：〈入營以前（收容於東華醫院）——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三〉，《基督教週報》第 314 期（1970 年 8 月 30 日）。

[27] 趙君影於 1906 年生於湖北漢川縣。幼年讀教會學校，認識信仰，受洗加入教會。在杭州之江大學和南京金陵大學就讀。畢業後曾任職教師。1934 年，蒙召作傳道。抗日戰爭期間，組織中國佈道十字軍（Chinese National Evangelical Crusade，後易名中華傳道會），在後方進行奮興佈道事工，後積極從事學生佈道，組織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1947 年，成立國際福音學生團契，被選為遠東區幹事。1948 年到香港，創辦基督徒短期培靈學院，出版《培靈》課程。1951 年，到新加坡擔任華僑基督教聯會的靈工主任，協助創辦新加坡神學院。1956 年移居美國。

救濟與傳教，其後不少事工都是在她大力推動下才出現的。趙師母首先在九龍塘宣道會婦女禱告會中分享異象，又偕同簡又文太太、楊景衢太太（關柔嫣，即前述的「某位醫生夫人」）等有心人士，探訪東華醫院門外的難民。

趙君影師母接著聯絡從國內不同工場撤退到香港的傳教士，他們有部分人棲居於九龍大埔道 58 號巴色會傳教士中心，包括信義會挪威豫鄂陝差會的馬天生(H. H. Martinson)[28]與顧永榮(Fredrik Knudsen) ，路德會的西門英才(Gertrude A. Simon) 、何傳捷(Wilbert Holt) [29]、包美達(Martha Boss)[30]和白樂雲(Lorraine Behling)[31] 等。趙師母電話聯絡後，他們都很樂意參與難民探訪與傳教工作，帶同福音單張、聖經、奶粉與毛氈分發給難民。

（二）滯港的傳教士

美國福音道路德會(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在抗日戰爭以前在湖北、河北傳教，戰時轉至四川，在香港並無事工，僅於長洲設有辦事處，以方便匯款及運送物資到內

---

[28] 後任信義神學院院長，信義會副監督。

[29] 何傳捷原在湖北恩施工作。1950 年夏天因肺病被迫舉家回國療養，一年後治癒重來香港，先後在救主堂及聖經學校工作。於 1959 年出任剛成立的路德會協同神學院首任院長。1962 年，與新來的路德會傳教士不和，被迫離港返美。

[30] 1913 年生，1973 年在美逝世。

[31] 1959 年返國結婚，不再來港。

陸。1948 年起，在華傳教士陸續撤離工場，除部分返國外，他們大多轉赴日本、菲律賓、韓國等地傳教。[32]1949 年 9 至 12 月，何傳捷、西門英才、包美達和白樂雲等四名傳教士先後由大陸飛來香港，他們原擬在此等候交通工具回美，後發現香港有許多難民等待援助，決定留下發展，要求美國路德會宣教部准許他們留在香港工作。[33]

西門英才在 1900 年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在接受護士訓練後，1926 年為路德會差派來華，在湖北省從事訓練護士的工作，同時兼理照顧孤兒和護理病人。1940 年，被按立為女執事（稱「教士」，deaconess）。抗日戰爭結束後，西門英才在湖北宜昌傳教。1949 年來港。[34]在留港的四名傳教士中，她的年資最深，故承擔統籌開拓傳教工場的責任。

丘恩處這樣形容西門英才：她是真誠的基督徒、熱心的傳教士、成功的個人佈道者；她有愛心接待所有人，甚至屢

---

[32] 〈路德會在華佈道五十週年(1913~1963)〉，（一）至（六），《路德月報》第 89~103 期（1963 年 1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

[33] 據楊植潤牧師憶述，先是在某主日，馬天生的女兒馬克瑞邀請何傳捷客串主持信義會加連威老道 33 號信義公所(Lutheran Centre)的查經聚會，事後路德會傳教士發現香港有這樣多說國語的人，工場需要甚大，便不願回國；他們打電報向美國請示，獲准留下。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

[34] 1962 年，西門英才與其他傳教士有不同看法，與追隨者另組中華路德會，1963 年 6 月與美國總會及港澳總會斷絕關係。西門英才於 1966 年病重回美，8 月 25 日逝世。香港路德會為紀念她，乃在 1977 年議決以她命名在元朗的一間新建學校。有關她的資料部分由該校提供。

次被人欺騙，仍甘之如飴，恆切為對方祈禱。她自奉甚儉，用一毫錢買麵包皮塗花生醬充飢，省下的薪水全用來辦聖經學校。[35]

路德會在香港的工作，並非專注於東華醫院門前的難民，同時亦假借九龍培知中學開設學道班，1950 年 3 月 26 日借香江書院舉行首次主日崇拜，接著租用青山道與東京街的仙樂戲院聚會，最後於 10 月 15 日租賃大埔道 232 號，建立救主堂，這是路德會在香港第一間教會。[36]

西門英才首先雇用一位華人張保羅[37]為翻譯。張保羅於崇真會樂育神科學院畢業，原受聘於香港華人基督會。及後，為盡快開展本地的事工，西門英才用了幾位非路德會的華人傳道，除張保羅外，尚有陳江川[38]；越兩年，復聘得信義神學院三位 1952 年的畢業生姜紹望、李復生與湛育清。雇用非路德會背景的同工，是路德會非常罕有的做法，也可以說是教會在香港草創期的權宜措施；這些華人傳道後來都得接

---

[35]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

[36] 陳煜新等編：《香港路德會金禧慶典紀念特刊(1949~1999)》（香港：該會，1999），頁 155~156。另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

[37] 張保羅，廣東興寧人，原屬崇真會。在路德會救主堂封立牧師，1953 年被聘到美國路德會靈光堂為牧師，移居美國。

[38] 陳江川，上海人，香港伯特利聖經學校畢業生，後赴美協同神學院(Concordia)深造。

受路德會的訓練，才被封立為首批華人牧師。張保羅是該會第一位華人傳道，同時兼理摩星嶺與香江書院的事工。

除信義會與路德會外，另有個別滯留香港的傳教士，到東華醫院門外探訪難民，尋找傳教機會。曾在山東傳教、隸屬瑞典自由差會（Swedish Free Mission，又名瑞典五旬節會 Swedish Pentecostal Mission）[39]的戴瑞蘭教士是其中之一。她生於 1918 年，在行道會 (Mission Covenant of Sweden) 受洗和接受栽培，後加入五旬節教會。她在斯德哥爾摩接受護士和助產士的訓練，然後在 1947 年奉派到中國的北平工作，當時她尚未接受任何神學訓練。由於未諳中文，在華的最初年間，戴瑞蘭只能到醫院探望病人，及後參與一些兒童工作。此時中國內戰爆發，華北即將陷共，不少傳教士都計劃遷到南方，與她同差會的人便遷往成都，但戴瑞蘭卻立意不走，繼續留在北平，直到 1949 年年底被通知必須離開。她在天津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前赴香港。

1949 年 12 月戴瑞蘭抵港，因寄住在大埔道的傳教士中心，認識了西門英才與包美達等人。初抵香港時，她對未來完全沒有想法，只能等候上帝的引導。一些年長的傳教士建議她回瑞典，但她卻希望留在香港，一方面尋找福音機會，

---

[39] 該會乃在二十世紀初因靈恩問題，從瑞典浸信會(Swedish Baptist Free Church)分裂出來。瑞典浸信會於 1891 年首派傳教士到山東。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Literature, 1929; reprinted by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1975), 401。

另方面等候中國的大門重開。不多久，當她知悉在東華醫院門外聚集了超過三千名難民後，便隨西門英才與包美達到他們中間派單張傳教。

戴瑞蘭記述當時的傳教工作如下：她們來到東華醫院，在院子裡與難民一起席地而坐，便向他們佈道。西門英才的傳教方式非常直接，劈頭便問人聽過了耶穌沒有。她亦按照路德會的傳統，從十誡開始講論基督教。戴瑞蘭自己則較婉轉，由於她的中文仍未流暢，只能結結巴巴的講福音，邀請難民到就近的教會聚會。[40]

（三）聖經學校學生的參與

趙君影師母亦聯絡剛從中國大陸遷港的信義神學院與神召聖經學校，兩校都有派遣學生前赴難民中間作個人佈道，主持聚會。

信義神學院由挪威差會（湘中信義會，Norwegian Missionary Society）、芬蘭差會（湘西信義會，Finnish Missionary Society）、美瑙路德會（American Lutheran Mission，含美國鴻恩會[Hauge Synod Mission]）聯合主辦，1913 年 3 月設於湖北省漢口市北濂口鎮。此校為中華信義會的全國神學總機關。因戰爭關係，五度遷徙，又在各地開設

[40] 戴瑞蘭教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

分院。抗日戰爭爆發，1939 年瀋口院停課。1944 年於重慶復院，至 1946 年遷回瀋口。1948 年，因政局動亂，神學院遷來香港，借沙田道風山上課。[41]1956 年自設院舍於沙田白田村。

神召聖經學校在 1926 年創辦於廣州河南怡樂村，原名明德聖經學院。1949 年遷來香港，在長洲大新街賃屋上課，學生則住宿長洲旅館。1953 年，購得並遷入沙田新址。[42]

兩個神學院相較，以信義神學院對難民工作最有承擔。事緣該院剛從國內南遷不多時，師生幾乎都是外省籍，與難民溝通並無困難；加上地理位置上，又略較位於長州的神召聖經學院為方便，故他們積極回應趙師母的呼籲。1950 年 1 月，信義神學院的學生組成佈道隊，到港九新界進行佈道事工，其中一隊乃前往東華醫院，及後轉往摩星嶺。當年仍在院就讀、負責統籌學生佈道工作的蕭克諧記述說：

> 在 1950 年左右，香港人口已由 1945 年戰後之 60 萬驟增至 200 萬左右，其中絕大多數為大陸逃來的難胞。信義神學院的同學，在大批從大陸撤退來港的合信義宗宣教士的指導、合作和支持下，立即開始向這些難胞展開福音工作。在 1949 至 1954 年之開荒佈道時期中，這些

---

[41] 參吳明節：《恩海浮沉錄》，頁 40；蕭克諧：〈從瀋口到香港：中文神學教育轉捩點之一〉，《神學與生活》第 22 期（1999 年），頁 83~89；另參蕭克諧：《認識信義宗教會》（香港：道聲出版社，1997），頁 53~57。

[42] 參〈神召聖經神學院專刊〉諸文，《基督教週報》第 95 期（1966 年 6 月 19 日），頁 4~5。

信義宗宣教士及神學生竟設立了 15 個堂會和佈道所，有信徒 2,203 人。[43]

至於神召聖經學校，則在較後的摩星嶺時期才派學生前往難民中間佈道。

在當時期，難民終日無所事事，少數對宗教產生興趣者，主動到市區尋找聽道機會。適時有不少具名氣的華人奮興佈道家從國內逃來香港，包括前述的趙君影，與趙世光[44]、計志文等；他們在香港原無任何基礎，乃自行組織聚會，其中一個做法是租賃戲院或其他公眾場所，每天舉行培靈與佈道聚會，在報章刊登廣告，邀請信徒與非信徒參加。[45]這些奮興家以外省語言傳道，與同由外省來的難民並無溝通上的隔閡，甚能吸引他們參加。范約翰曾參加趙世光主持的靈糧堂在中環太子行的聚會，也出席趙世光每星期日早上假皇后大道中娛樂戲院舉行的講道會，不久決志信主。4 月 8 日，在戴瑞蘭的安排下，范約翰等九個難民信徒接受洗禮，地點為

---

[43] 蕭克諧：《認識信義宗教會》，頁 109。

[44] 趙世光原名趙元昌，浙江餘姚人，1908 年生。1924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改名世光。1926 年高中畢業後，於上海宣道會守真堂開始兼職傳道工作，四年後正式成為牧師。1936 年起，曾到南洋傳道。1941 年返回上海，未幾與谷賢民合編《靈糧》月刊，創設靈糧堂聚會所，後於南京、上海、杭州、蘇州等地設立分堂。1949 年，在香港成立靈糧堂。參趙世光：《蒙召三十年》（台北：龍文出版社，1994）。

[45] 如趙君影便租用新世界戲院佈道，趙世光租用娛樂戲院，計志文則租用快樂戲院。

永安公司郭經理在赤柱海濱的私家泳場，同時受洗的有百人。[46]這些自行在外頭尋道的難民信徒，亦成為調景嶺營日後重要的福音種子。

第四節　摩星嶺時期

難民於 1950 年 3 月遷往摩星嶺的指定地點棲息。由於已具難民營的雛型，較長期的福音工作亦得以進行。

（一）路德會

路德會四位滯港傳教士對難民工作非常積極，除定期前往派發單張、個人談道外，更於 1950 年 3 月在摩星嶺靠近西環處蓋搭臨時油紙棚屋為福音閱覽室，以為固定傳教站，由西門英才與張保羅負責。閱覽室擺放一些宗教書刊，供難民前來閱讀，據說每天都有超過二百五十人使用，甚受百無聊賴的難民所歡迎。西門英才與張保羅每星期前來數天，以查經班形式主持一個學道小組；西門英才攜來一批聖經，分發給願意參與學道班的難民，吸引三十餘人出席聚會，主要查考馬太福音與馬丁路德的《小問答》。

---

[46] 范約翰：〈入營以前（遷往摩星嶺）—— 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三〉，《基督教週報》第 317 期（1970 年 9 月 20 日）。

此時路德會已在九龍香江書院[47]開始主日崇拜，主日下午，何傳捷再在摩星嶺主持崇拜。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至6月，已有四十名難民準備接受水禮。

是年6月21至30日，路德會第廿六屆區會在美國威斯康辛 (Milwaukee, Wisconsin) 舉行，在四位傳教士的強烈要求下，正式批准香港的事工，香港成為由差會指揮的合法工場，並派遣新傳教士來港；第一位赴港的是辛熹白 (Herbert Hinz)，他原在巴拿馬 (Panama) 工作，於1950年10月抵埗。[48]

（二）宣道會

九龍塘宣道會婦女部相約到難民營探訪，派發單張傳教；宣道會負責照顧內地傳教士的子女在香港讀書與生活的貝光道(John Bechtel)，也以其兼任九龍塘宣道會顧問牧師的身分參加。不久趙君影師母等用 150 元在那裡蓋搭帆布棚，以便舉行固定聚會，這是摩星嶺第二個有固定時間和地點的聚會。九龍塘宣道會婦女部又出資聘請高玉銘牧師[49]偕同包忠

---

[47] 香江書院由陳樹渠開辦，為私立大專院校，在台灣教育部立案，學位證書由台灣頒發。早年與路德會有密切關係。事緣該院欲與美國路德會合作，以期獲得經濟上的援助。丘恩處於 1955 年畢業，便被聘為講師，兼財務主任。後來條件談不攏，合作不成。

[48] 有關路德會在華及在港的歷史，參 John Thomas Lindner, "The Lutheran Church in Hong Kong 1949~1980" (M.Div. thesis,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ayne, Indiana, 1981)。這裡參頁 30~31。

[49] 高玉銘為東北人，父親為長老會牧師，而他畢業於山東的華北神學院，另在上海修讀宗教教育。他曾在武昌宣道聖經學院

傑(Paul Bartel)[50]牧師前來摩星嶺個人佈道，每星期一次。由於沒有聖經供難民使用，他們多數以講道形式，宣傳簡單福音。有范約翰、時恩證[51]、王力耘[52]、劉摩西、張興仁等參加。

任教，故與宣道會的傳教士相善。他先自行來香港，太太連同子女其後隨來。有兩女一男，高元、高霖及高華，都在信義中學唸小、中學。1965 年 11 月 14 日逝世。

[50] 包忠傑於 1904 年在中國華北出生，父母為在華傳教士。他在中國接受中小學教育，1925 年赴美升學，1930 年畢業於奈亞宣教士學院。隨即加入宣道會，返回中國，在華中教區工作。他致力從事開荒工作，開闢川黔地區的工場。抗日戰爭後，擔任華中區與川黔區兩區的監督職。1949 年撤退來香港，主持剛成立的全中國委員會(The All China Committee)，協助差會在撤離中國後的各種善後工作，並盡力與國內華人同工聯繫。包忠傑除在建道聖經學院教學外，也協助調景嶺的佈道事工，並在宣道聖經學院任教。1953 年回加拿大，任教於加拿大聖經學院(Canadian Bible College)，期間協助建立雷城華人宣道會(Regina Chinese Alliance Church)，這是加拿大第一間華人宣道會。他非常注重文字佈道，1955 年返港後，與劉翼凌於 1956 年創辦《燈塔》月刊，藉此傳教；他也是台灣《宇宙光》雜誌的發起人之一，多年來擔任香港基督教文字工作促進會要職。包忠傑又協助宣道會忠主堂的建立。1961 到 1964 年，在加拿大聖經學院任教，擔任教務主任，期間參與推動聯合的華人青年冬令會。1965 年，重臨香港，主理宣道書局業務，並繼續在建道神學院任教，至 1969 年 7 月退休返美為止。

[51] 時恩證牧師為山東青島人，1926 年生。中學時代，為逃避戰火而偕同學流徙到廣州，隻身離家。中學畢業後，考入政治大學，修讀一年後從軍。1949 年來港。1950 年在調景嶺信教，為宣道會第一屆受洗會友，後參加培訓班，並成為第一屆宣道聖經學院學生。1954 年畢業後，偕都乾初等在青山道九咪半開荒，後建立宣道會荃灣堂。1960 年主理李鄭屋天台小學，建立日後的宣道會深水埗堂。退休後協助調景嶺堂及繼後的嶺恩堂。有四子女。

[52] 王力耘牧師，山東濟南府人，1922 年生。在湖南長沙大學讀書，因抗日戰爭關係，隨學校遷往四川，後轉讀軍事學校，參軍，官至中校。1949 年在廣西被中共所俘，釋放回原籍，行至湖

（三）信義會

信義會挪威豫鄂陝差會傳教士顧永榮，原在湖北老河口靠近河南一帶傳教，1949 年轉來香港。[53]他向摩星嶺的難民展開露天傳教，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兵房，組織信義會。不久，因見難民中間有一些失學兒童，且在難民高尚武[54]的建議下，於 4 月 4 日開設一所學校，由高尚武負責任教，借用英軍一個棄置軍營為校舍，有時也在海邊露天上課，以水果木箱為桌椅，定名為香港難童義務學校。這不僅是基督教會為難民開辦的第一所學校，也是第一所在難民營中開設的學校。有關學校最初的情況，有如下記述：[55]

> 學校是在香港摩星嶺開辦，沒有校舍，暫借英軍的一所破舊兵營。那所黑黝黝的營房，既沒有窗，也沒有門；沒桌櫈，沒黑板，更沒有其他教具。開學那天（四月四日），只有三十二名難童，企立著舉行「開學禮」。以後

南衡陽，決定轉到香港，時維 1950 年 3 月。在摩星嶺得聞福音，同年受洗於宣道會。1953 年入讀宣道聖經學院，1955 年轉到建道聖經學院，翌年畢業。曾在調景嶺宣道會工作一年餘，後轉任於九龍塘宣道會，主要從事醫院佈道，在南朗醫院及九龍醫院工作，協助成立九龍醫院基督徒團契。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53] 有關該差會在華的歷史，參杜聖恩：《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教會史略》。

[54] 高尚武肄業於南開大學與政治大學，在難童學校任教數年後，到信義神學院就讀，1956 年畢業，成為傳道人。參陳培德編：《信義宗神學院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3~1993)》（香港：該院，1993），頁 111。

[55] 〈慕德中學簡史〉，《香港慕德中學大學預科第一屆畢業紀念刊》（香港：該校，1968 年 7 月），頁 2。

由牧師、教師向附近商店捐些罐頭箱，親手釘製七英吋高的小櫈子；還沒有課桌，就用塊木板放在膝頭來代替。其他文具、粉筆、書籍等，也都是由各書局捐募而來。難童們失去了大陸上的家，跟隨父母來香港又重建了「馬路之家」。他們「竊取」商店的燈光作家課，他們「揩油」馬路旁的路燈上自習。那就是這所學校的草創期。

信義神學院的學生佈道隊定期前來主持兒童工作，招聚兒童，帶領他們唱詩，為他們講故事。蕭克諧憶述，他是在摩星嶺為難童講道時，初逢日後擔任路德會協同神學院院長的丘恩處，當時他夾雜在兒童中聽道。[56]

（四）神召會

神召聖經學院負責安排學生實習的老師是鍾耐成牧師，他在1950年初亦開始派遣學生到摩星嶺開展難民佈道工作，當時被選召的主要是 1949 年入學的徐傳宣。[57]徐傳宣原籍安

---

[56] 蕭克諧院長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1 日。

[57] 徐傳宣牧師，安徽宿松（隸屬於安慶行政區）人，1924 年生。抗戰時期，曾加入軍隊的藝術團工作，戰後到廣州讀書。1948 年在廣州金巴崙長老會廣大堂信道，從甘建磐牧師接受水禮，又參與趙君影與于力工主持的大專福音工作。1949 年，原擬經香港前赴台灣，在香港探望當時受雇於長洲神召聖經學院的甘建磐師母（陳道志女士），結果被召入讀神學院，沒有去成台灣。在調景嶺工作七年後，1958 年，接任宋鼎文牧師開辦的九龍五旬節教會（後稱港九五旬節傳道會）；後因教會產權問題，與一群信徒離開原教堂，開辦巴富街中學的禮拜堂，在那裡工作三十年（從 1958 年到 1988 年），至 65 歲退休，移民加拿大。1989 年，在愛民頓(Edmonton)華人福音堂工作；1995 年轉到亞寶斯福基督教錫安堂(Abbortsford Chines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協助會務。師母的

徽，為神召聖經學院中較少有的外省人，並且他曾在廣州讀書期間參與趙君影牧師和于力工牧師的大專學生福音活動，認識趙牧師，故對趙牧師夫婦倡導的難民事工具負擔。他每逢周末前赴摩星嶺，探訪露宿街頭的難民，跟他們作個人佈道。除了他以外，有時還有另一位同學偕往。[58]

（五）戴瑞蘭

瑞典五旬節會的戴瑞蘭亦繼續專注在難民中間傳教，隨他們由東華醫院遷至摩星嶺。她每星期去摩星嶺三趟，當時從九龍大埔道到摩星嶺，單程便得花兩個小時。與路德會等差會不同的是，戴瑞蘭並沒有為差會在香港開展大規模佈道事工的計劃，甚至沒有開植教會的要求。她寫信回自己的教會向牧師探問前路，所得的回覆是她可以自由決定去留及所做的工作，教會則在財政上繼續支持她，每月支付她月薪港幣三百元（後增至四百元），已包括她的生活費和事工費在內。

戴瑞蘭最初與西門英才等聯袂到摩星嶺，但路德會有幾名傳教士一起工作，在人力資源上自給自足，毋須拉攏其他人；而宗派的排他性強，不易跟別宗派的同工合作，故戴瑞

父親嚴漁溪牧師，與甘建磐牧師同期，曾任華南神召會會長。有關神召會與金巴崙長老會的資料，除訪問自徐傳宣牧師外，不少來自建道神學院的甘汝誠先生，他是甘建磐牧師與陳道志女士的兒子。甘先生曾多次接受筆者的訪問，並協助查核有關資料，在此僅致萬分謝意。

[58] 徐傳宣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7 月 4 日。

蘭不久便得獨自傳教。信義會的高尚武曾邀請她協助難童學校的教學，亦為顧永榮所反對，因為她屬五旬節教派，恐在合作上發生困難。靈恩問題是二十世紀教派分歧的重要元素之一。

戴瑞蘭曾受醫護訓練，當時難民對醫藥的需要甚大，故她很快便全情投身這方面的服務；每次她都攜帶一大袋藥品到摩星嶺，為病人贈醫施藥，而有病的難民總是已排了長長行列，等候醫治。這些藥品都是戴瑞蘭用自己的月薪購買的；她在批發商那裡可以用較廉宜的價錢獲得藥物，後來還有人贈送她一些藥品樣本，使藥物支出的負擔得以減輕。

戴瑞蘭自奉甚儉，身無長物，把絕大部分月薪都拿來用在事工之上，竭力滿足所服侍的信徒與難民的需要。曾有見證說看見她用水煮四個馬鈴薯便作晚餐，[59]亦有人這樣讚譽她：[60]

> ……當她流亡來港以後，一個外籍人士，本亦可謀取較安定之生活，而她卻願與中國難民為伍，最難得的是她與許多困苦之難民，過著低過人們最低水準之生活，吃最粗劣的食物，住最簡陋的房子，穿很隨便的衣服，與難胞之生活，打成一片。

---

[59] 錫安堂韋志安執事的見證，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五十周年感恩崇拜，2000 年 4 月 16 日下午三時至五時，翠林籯社區會堂。

[60]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46。

在從事醫護工作之餘，她跟一群大專或高中背景的年輕難民查經，查考約翰福音，勸導他們信教，又為他們祈禱。[61] 戴瑞蘭在香港並不屬於任何教會，通常參加趙世光在娛樂戲院主持的聚會，她也邀請已信教的難民出席聚會，又邀請趙世光為他們施行洗禮。趙世光曾向戴瑞蘭透露他有在香港開辦神學院的計劃，並請她擔任講師，後來計劃沒有成功。在娛樂戲院聚會期間，戴瑞蘭重遇一位馬姓小姐，她原在北平燕京大學唸書，因病入院，戴瑞蘭曾到醫院探望過她；馬小姐的未婚夫是孫約伯，而其父親則是靈糧堂的孫伯噍長老。由於有這番因緣，戴瑞蘭與孫伯峩一家認識，成為多年親密朋友，他們對戴瑞蘭的工作給予極多支持，而這亦撮合靈糧堂日後有限度參與調景嶺事工。[62]

5 月間，趙世光在跑馬地郇光學校的操場主持為期四十天的查經佈道大會；[63]為邀請摩星嶺的難民出席聚會，戴瑞蘭為願意赴會的人負擔車資，每位二毫。在這樣的金錢援助下，有不少人出席聚會，並在那裡決志信主。[64]

---

[61] 〈戴教士的話〉，《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香港：該會，1990），頁 2。

[62] 戴瑞蘭教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

[63]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香港：衛道出版社，1966），頁 134。

[64] 范約翰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6 日。他提到有人是以步行的方式前往，藉以省下獲分發的車資。

（五）有限的傳教效果

此時一切傳教與救濟工作都屬臨時散件性質，並無長期與系統性的計劃，參與的傳教士既未知是否有長遠可為之處，亦不確定他們的差會總部是否批准他們留下，故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傳教士沒有強調他們隸屬的宗派，他們都是以個人身分自願參與難民事工，並未被授權建立宗派堂會。工作形式方面，傳教士僅是盡量把握機會作個人談道，沒有展開有系統的救濟和社會服務，傳教效果並不突出，亦未發展成教會的形態。

部分軍旅出身的難民軍人習氣未除，剛愎強悍；他們剛來香港，經濟未完全枯竭，由於所居之地接近市區，有些還用帶來的金錢上館子、喝酒、打牌、看電影，尋找消遣，對宗教的興趣不大。他們相信台灣政府很快便會接收他們，心理上預備隨時離去，無意追求宗教信仰。在數月間，僅發掘出七、八位原來在內地已信教的信徒，另有數十人恆常參加聚會。傳教的黃金時期尚未肇始。

第三章

基督教會在調景嶺的建立

前面提到，在遷入調景嶺以前，已有信義會、路德會、宣道會及個別獨立傳教士（如戴瑞蘭）在難民中間傳教，這些傳教士亦隨難民到調景嶺，繼續未竟工作。

與在東華醫院及摩星嶺不同的是，調景嶺雖然地處偏僻荒蕪，卻總是自成社區，有自己的地域；並且難民得以棲身在固定的棚屋裡，不再露宿街頭、居無定所。如此，傳教士可以在此闢地建立教堂，開設較長期的事工，毋須將工作局限於向不穩定的受眾進行街頭佈道。

宣道會首先在調景嶺興建教堂，信義會很快將原設於街頭的流動難童學校發展成較具規模的學校，路德會亦旋即開設聖經學校。這些工作在開營兩三個月內便都奠基了，速度不可謂不快。

1950 年 12 月，營內已有各式教堂六所，包括路德會、宣道會、信義會、錫安堂、天主堂、安息日會，近千居民接

受了基督信仰，尚未計算為數更多的慕道友。[1]其後，崇真會、神召會、聚會所等亦加入傳教行列。安息日會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下文將分別縷述各宗派的發展情況。

第一節　路德會

（一）西門英才領導時期

難民在 6 月 30 日遷入調景嶺後，路德會的佈道所亦隨之遷建。7 月 1 日，路德會救主堂開始在大坪新葵棚內聚會，屋頂由棕櫚葉鋪成，四面牆則由竹蓆編造。這座葵棚在晚上亦供難民住宿。為了便於工作，西門英才不久遷入調景嶺，在教堂旁邊搭屋而居。但最初隨她工作的張保羅很快被調往九龍的救主堂，不再負責調景嶺的工作。

路德會規定婦女不能負責主日崇拜講道，除何傳捷外，其餘三位女教士都不能主持主日聚會。但何傳捷很快便因發現有肺病而返美治療，教會僅有張保羅講道，難以兼顧九龍與調景嶺兩個地方的需要；特別在 10 月救主堂正式設立後，張保羅便專責那裡的工作。為了應付困難，乃延請信主才不久的丘恩處負責調景嶺的主日講道。

---

[1] 履平：〈營中雜寫〉，《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3。

丘恩處[2]在 1950 年 1 月 26 日來香港，在摩星嶺初聞福音，旋參與在九龍香江書院的聚會，決志信主，於 6 月聖靈降臨節接受洗禮。7 月 1 日，被聘為書記，幫助西門英才有關文牘工作，同月已在調景嶺教會講道。10 月後，負責調景嶺的講壇。

教會設有各項聚會，招聚居民參加，人數非常踴躍。每當有人表示願意追求信仰，便為他們開設學道班，預備接受水禮。

為了長遠解決人手短缺的問題，在事工開始不久，1950 年 8 月 18 日，路德會開設協同聖經學校，由西門英才擔任院長。首屆學生有十人，丘恩處是其中一人，由於他過去曾在中國大陸協助開辦中學，參與教學及行政工作，故在上課之餘，並協助編訂課程。他也負責學道班的教學。1952 年 1

---

[2] 丘恩處為廣東豐順人，1929 年生。4 歲到梅縣，後就讀梅縣縣立第一中學，高三那年參加青年軍，按從軍條例給予高中畢業證書。不久入讀國防部新聞工作人員訓練班，曾當記者及南京民本通訊社通訊員。後被派為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後改稱青年救國團）小組長，在宿遷協助開辦青年中學，在南京只逗留很短時間。共產黨軍隊入城前夕，撤走宜興，幫助主編《品報》副刊。旋到上海，充上海北站區軍事聯絡員。1949 年 7 月共產黨開入上海前，轉到廣州，原被派往重慶，不就，任 63 軍 52 師 474 團機槍連政治指導員，曾晉代理連長。後開赴海南島，在廣西陸川被擄，幸逃脫，經廣州出走香港。

丘恩處為調景嶺協同聖經學校首屆畢業生，曾被派赴澳門工作一年半。回港後在聖經學校任教，兼教務主任，同時在香江書院修讀，1955 年社會教育系畢業，被聘為兼任講師，兼財務主任。1956 年協同中學開辦，任宗教幹事，兼協同堂牧師，後為協同中學訓導主任。1961 年在協同神學院畢業，接任路德會聖經學院院長。1962 年受牧師職。1965 年 1 月到美國進修神學。

月，丘恩處尚未完成聖經學校的課程，便委派赴澳門開展新堂，在那裡居留了十七個月，建立聖保羅堂（位於澳門）與聖彼得堂（位於氹仔），每月回香港補課，直到修畢為止。1953年，因聖經學校與救主堂人力需求甚大，丘恩處遂被調回香港，擔任聖經學校的教務主任，並於1955年頭入住調景嶺。

聖經學校每晚均舉行聚會，歡迎居民參加。學生在課餘亦到各區從事挨家佈道工作。

1951年9月，路德會創辦調景嶺協同小學，最初為識字班性質，負責的華人同工為李光堯[3]，有學生四十人，半數在下午上課，半數上夜校。1955年7月，改辦完全小學，易名為聖約翰小學。李光堯亦在星期日開設主日學，有卅四人參加。

10月1日，西門英才開辦手工部，以工代賑資助教友，並聘用教友何瑞林[4]為協助。有記載說：[5]

> 許多難民曾是專業人士，他們都恥於接受救濟。他們要求西門英才與包美達為他們提供工作的機會，兩位婦人於是把她們僅有的小積蓄都掏出來，買點材料讓這些人從事手工藝，然後她們聯絡自己在美國的親友，協助將制成品售賣。

---

[3] 就讀於協同聖經學院第四期，1954年畢業，又於1961年為協同神學院第一屆畢業生。一直在路德會救恩堂工作，直到退休。

[4] 何瑞林的丈夫為賴愛民，同為廣東興寧人，與張保羅為同鄉。1952年起在協同聖經學校教國文，後為協同中學（1953年開辦）教務主任、校長。何瑞林後來負責婦女學道班的教學。

[5] Lindner, "The Lutheran Church in Hong Kong 1949~1980", 32.

1954 年，路德會手工部由包美達接辦，逐漸發展為註冊法團，並擴展工作至港九澳門各地。[6]

調景嶺的教堂於 1951 年改建成木房子，美金 300 元的費用由美國協同大學的學生捐出，協同小學亦改在這裡舉辦。1954 年，經政府撥地，於七區平整土地，建立能容納百餘人的木構教堂，易名為聖約翰堂，以茲與位處大埔道的同名教會識別。教會亦為協同聖經學校的校址。

西門英才與包美達原為護士，故一直參與營內的醫護工作；由於肺病肆虐，他們聯合司務道（後詳）等他會的傳教士，推動肺病療養事工。西門英才於 1954 年返美國後，更積極為此籌款，1955 年共捐美金 18,200 元。

（二）新人事與新轉變

五十年代，陸續有新傳教士由美國派來，西門英才不久即與新來傳教士發生衝突。除了性格與做事作風等個人因素外，衝突的原因有二：第一，西門英才的門戶觀念遠較新來傳教士淡薄，這與她在調景嶺開始事工，得與別宗派的傳道

---

[6] 路德會有一位協同聖經學校的學生，因貪污罪被判處半年徒刑，期滿被香港政府驅逐到澳門。在西門英才的支持下，他在仔難民營建立教會，推動手工藝，辛熹白定期前往協助。Lindner, "The Lutheran Church in Hong Kong 1949~1980", 35。他是繼丘恩處以後到澳門工作的人。

同工合作有一定關係；她曾參與別的教會的聖餐，而路德會一向主張關閉聖餐(close communion)，[7]故這做法被視為離經叛道。

第二，西門英才在「上帝」抑或「神」的用法上，與其他傳教士有不同觀點。早自 1923 年起，美國路德會便在「上帝」抑或「神」的用法上，發生嚴重爭議，多次在年會上討論，後交美國協同神學院研究，且曾派員到香港購書參考。當時他們有人追隨理雅各(James Legge)譯作的用法，從「上帝」說，但反對者則堅持 *Elohim* 是類詞(generic term)，只有「神」才是合宜翻譯。最後在 1932 年，美國路德會研究小組決定採用「神」說，要求在中國漢口的協同出版社跟隨決議。但在華傳教士很多不理會美國總會的決定，故他們之間在用語上並不統一，西門英才本人亦同時兼用「上帝」及「神」。五十年代以後，來華傳教士大都主張使用「上帝」，遂又引起嚴重爭論，延續三十年前的神學論戰。[8]

西門英才於 1962 年另組中華路德會，翌年與美國總會及港澳總會斷絕關係。1966 年病重回美，旋即逝世。

杜愛萊繼西門英才負責聖經學院的工作，故同時協助聖約翰堂事務，直到 1956 年學院遷離調景嶺為止。嗣後，由

---

[7] 所謂關閉聖餐，便是只有同會信徒方可共領聖餐。路德會的信徒不到別處教會領聖餐，亦不歡迎別的教會信徒到他們那裡領聖餐。

[8]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

於市區事工發展迅速，需人孔急，除包美達外，甚少有路德會的傳教士長住調景嶺，大多只間中入營協助工作，包括何傳捷與辛熹白在內。教會工作主要由華人承擔，五十年代負責聖約翰堂的先後有陳江川、李偉韜、張約翰、張乘風。張乘風一直在該堂工作至 1995 年退休，今由其子張惟一負責。

1961 年，教會改建成三合土的禮拜堂。

第二節　宣道會

（一）宣道會的開基

宣道會是最早積極發展難民傳教的教派。此時西差會在香港尚未建立組織，除有幾位傳教士滯留外，只有一間已成華人獨立堂會的九龍塘宣道會，調景嶺事工亦由九龍塘宣道會婦女部主導，聘請高玉銘專責主理。難民遷到調景嶺後，高玉銘隨往工作，在二區建立佈道所，對外聯絡則由母會顧問牧師貝光道負責。

范約翰記載宣道會在調景嶺奠基的故事如下：[9]

> 難胞到調景嶺住定以後，宣道會首先在二區（現改為第四區）山上，牧師住宅旁近，開出一萬多呎平地，支搭帳棚佈道，以後就在那裡建造木板油紙，石棉瓦屋頂，有玻璃窗之教堂，和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共用。那是全營最宏大，最壯偉的建築。在開山平地時，當然要動用許

[9] 范約翰：〈數說神的恩典——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七〉，《基督教週報》第 359 期（1971 年 7 月 11 日）。

> 多人工；教會為幫助難胞起見，與其花六元一天從外面請，倒不如三塊錢一天，在營裡就請得到人，這對教會方面也省儉得多。好在這不用機器，只是洋鍬和十字鎬鑿開泥土，一筐一筐的倒在外邊，挖出來的碎石放在下面做根基，一切都靠人工。

據時恩證的說法，貝光道在香港淪陷期間曾被關入日軍的集中營，與好些香港政府的英籍官員同甘共苦，建立深厚友誼；這些官員在戰後官復原職，貝光道向他們申請撥地從事難民救濟，自然獲得很大方便。宣道會的地點在難民營中算是較大較好的，日後政府亦繼續批出社會服務事工讓宣道會承辦，這是其中一個歷史淵源。[10]

宣道會在山邊開出土地後，首先支搭瀝青紙棚，放上二十幾張長木凳，用小型發電機發電，每晚舉行佈道聚會。[11]

> 由於帳棚四邊捲起透風，山上比較涼快，難胞閒來無事，無處可去，亦無其他康樂活動，加上初初搬到嶺上心情苦悶，所以一方面去到那裡坐歇，再方面也聽一聽道理，所以每晚滿座。

除高玉銘外，包忠傑、歐粹珍(Margaret Oppelt)等來自華中地區說國語的離崗傳教士以個人身分積極協助，九龍塘宣道會的教牧貝光道與三位華人傳道丘育靈、朱建磯、彭惠華[12]

---

[10] 時恩證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8 日。

[11] 范約翰：〈義務診所——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八〉，《基督教週報》第 382 期（1971 年 12 月 19 日）。

[12] 1949 年入職，1957 年與黃卓英（後按牧）結婚後離職。

亦有參與。婦女部部分成員繼續熱心參與佈道所的事工。據崔冠軍憶述，在調景嶺事工開始頭一年裡，楊景衢夫人（關柔嫣）幾乎每週都來營一次，對難民給予各方面的支援。[13]教會也在各個重要節日，組隊前往探望與聯誼。[14]

高玉銘有一位得力助手柴惠堂，山東人，當時已四十多歲，後遷台灣。有位鄒彼得定期在宣道會的聚會中講道，他在計志文於青山道祥華街所辦的工藝神學院[15]就讀。

佈道所有高速的發展。1951 年舉行第一次洗禮，有三百至四百人參加，包括時恩證與都乾初等在內。水禮在調景嶺附近的海邊舉行，由貝光道、包忠傑與高玉銘等負責，婦女部向每位受洗難民致贈一件襯衣。[16]在舉行兩、三屆水禮後，鑑於難民事工規模龐大，非九龍塘宣道會所能獨力承擔，乃情商滯港傳教士白德三(Robert Patterson)[17]、包忠傑等，用西

---

[13] 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14] 參如《九龍塘宣道會主日崇拜秩序表》（1950 年 11 月 5 日）；《九龍塘宣道會聖誕禮拜秩序表》（1950 年 12 月 25 日）。

[15] 工藝神學院由計志文創辦，在教授神學課程的同時，亦教導神學生做醬油、手工藝等技術，幫助他們將來以織帳棚維生。

[16] 王力耘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7 日。

[17] 白德三於 1930 年來中國，在宣道會華南區（廣西）工作多年。由於他是加拿大人，而加拿大屬英聯邦國家，與港英政府打交道較易，故委任他為差會首位主席。

差會名義建立教會，命名宣道會新界福音堂，即日後的調景嶺堂。[18]高玉銘仍為堂主任。

時恩證憶述，教會的組織與事工至為簡單，高玉銘一味專事佈道，固定性的栽培、牧養與訓練幾乎不做；事實上，剎那間來了那麼大堆人，而他們的流動性又大，亦談不上任何個人關顧。教會較有組織的活動為詩班與婦女會，由歐粹珍主持婦女工作，直到她轉赴台灣為止。[19]

> 成立初期，教會以醫務所的紙棚聚會，並無正式堂址，及後出資僱用難民信徒平整土地，興建一間能容納二百餘人的大木屋，共費港幣七千多元。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在日間亦使用這間木屋工作。

教友人數增長迅速，短短三年間，已有二千多人受洗，[20]成為調景嶺最大的教會。為了培訓義工，教會在 1951 年開辦短期聖經課程，為期三個月；是時教會仍由九龍塘宣道會

---

[18] 根據劉平齋夫人（張雪明女士）的記述，當時西差會幾位傳教士與九龍塘宣道會婦女部一起參與調景嶺事工；後來西差會的角色逐漸增加，而婦女部則逐漸淡出，故在交接上並無困難。事實上，婦女部在當時還有好些其他佈道工作，故並非專注於調景嶺一地。有關劉平齋夫人的訪問（2000 年 4 月 8 日），乃由羅淑芬小姐與招鳳玲小姐代為進行，謹致謝意。

[19] 范約翰：〈義務診所——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八〉，《基督教週報》第 382 期（1971 年 12 月 19 日）。

[20]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頁 59~60。

辦理，課程由丘育靈等傳道同工負責，這是日後宣道聖經學院的前身。

教會闢有圖書室，擺放報章與基督教書刊供人閱覽，由時恩證負責。這是當時期基督教普遍的社會服務形式之一。[21]

宣道會與兒童福利會合辦有手藝工場，為難民提供工作機會。為照顧難民營裡一批為數八十餘人的失明人士的其中三十名，貝光道在 1951 年於宣道會教堂旁邊開辦啟明瞽目學校，教導他們掌握一技之長，包括點字、編織及籐工等，聘請王澤生牧師[22]主理，經費由美國海外盲人協會資助。這批盲人不多久亦成為教會成員。不過，四年後他們多數遷往台灣，學校結束，僅有數位盲人留下來。[23]

---

[21] 駱友梅在記述路德會救恩堂於五十年代在黃大仙建立時這樣說：「她起先是週日聚會的佈道所，座落在一間木蓋的店舖裡，平日出售教會刊物，附設有開放給坊眾看書報的閱覽室，供應茶水；那就是救恩堂最早期的一種社區服務。試想當年黃大仙、鑽石山一帶住了多少難民？其中不少靠糊火柴盒、串膠花維生，也有上街叫賣的商販，薪金微薄的私校教師和高不成、低不就的失業漢，總之是苦哈哈的一群，要他們每天花上一毛幾分去買報章來看，那實在是非同小可的負擔，所以閱覽室的設立，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當時卻是切合需要的服務，而任何服務又有甚麼比切合需要更有價值？」駱友梅：〈過時的瑣憶〉，《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83），頁 21。這段話雖非描述調景嶺的情況，卻是五十年代的寫照。

[22] 王澤生為山東青島人，任職中華基督教會。有關他的背景，他的女兒王光霞著、中天譯：《熔爐》（香港：樂歌學生天地，1980）有簡略記述。他是在 1951 年從中國逃來香港的。見前書，頁 22。

[23] 《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一九五四年）》，頁 46~47。

1954 年，高玉銘轉到中華基督教會國語堂任職，王澤生從盲人學校調出，接任教會堂主任。後來西差會派巴安義牧師(Anthony Bollback)協助。巴安義師母同時負責婦女手工的工作。

1957 年，調景嶺堂增聘剛從建道神學院畢業的王力耘為傳道。他是宣道聖經學院第二屆學生，就讀年餘後，與另外六個同學經考試合格而轉入建道神學院；畢業後，原擬與王克章等赴台灣工作，後未成行，劉福群乃將他安排到調景嶺堂。王力耘憶述，在他就任時，宣道會尚有差不多一百人聚會。一年半後，王力耘轉到九龍塘宣道會向外服務部工作。

筆者曾追查過這批盲人信徒的下落，經宣道會台北松山堂蔡永光與蔡榮花姊妹的介紹（她們的父母皆是盲人，正是那批從調景嶺遷台的盲人的其中二人），得以與葉維新牧師聯絡，並在電話裡跟他做了訪問。葉維新牧師為台灣福音會迪化街教會牧師，1959 年在台灣聖經學院讀書期間，在上述教會參與服事；當時那群盲人為政府安排住在台北市盲啞學校（現稱啟聰學校），地點就在教會附近，他們中間的信徒都來參加聚會（他們來教會的時間早於 1959 年）。他們大約有三十人左右，絕大多數是單身的，僅有少數已婚者。葉維新牧師從那時起開始服事他們，四十年來沒有間斷。1967 或 1968 年間，政府將盲人安置到台北縣土城鄉中央路輔導中心，這是由退職軍人輔導委員會所主辦的。自此他們不能再來參與崇拜，但葉牧師仍每月一次到他們那裡，借用蔡氏姊妹家（他們有自己家庭，不住單身宿舍）舉行聚會。宣道會和忠愛堂由於距離較近，同工間中也有照顧他們。不過，隨著時間過去，盲人信徒大多過世，如今剩下約十人左右，最年輕的都有 73 歲，其餘多在 80 歲上下。葉維新牧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18 日。

（二）基督教兒童福利會

這裡略為介紹與宣道會同棲於一個屋簷下的基督教兒童福利會(The Christian Children's Fund)。該會於 1937 年在香港成立，創辦人為嘉樂博士(Dr. Clark)，後由微勞士牧師(Rev. Mills)接替。[24]早期工作主要是開設孤兒院，在新界大埔設有惠光兒童院、大埔兒童院，粉嶺有信愛兒童院，元朗設有元朗兒童院，另在大埔設有農藝所，收養近千名兒童。[25]九龍塘宣道會的關柔嫣（楊景衢太太）為該會司庫，積極參與調景嶺事工。1950 年，趙君影師母邀請趙思義出任該會主任。兒童福利會與宣道會合資七千元（各出一半）建造大木屋禮拜堂，平日以此為會址，開展事工。兒童福利會根據社會局已登記十六歲以下的難童，發給奶票，每日派發奶粉沖和的牛奶，和糖果餅乾等食物；又安排無父無母的兒童，讓西國人士認養。1952 年，范約翰受聘於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擔任文職與事務工作。[26]

趙思義的丈夫為丁昭民牧師，原為神召聖經學校教師，學院遷香港後在長洲任教。他不幸在 1950 年於長洲遇溺死

---

[24] 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在烏溪沙創辦兒童新村，因事工未如理想，遂將之轉贈基督教青年會。

[25] 《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一九五四年）》，頁 12，23~24。

[26] 范約翰：〈數說神的恩典——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七〉，《基督教週報》第 361 期（1971 年 7 月 25 日）。

亡，遺下妻子及一名女兒丁愛真。趙君影師母遂邀請趙思義負責兒童福利會的工作。[27]後來趙思義去了台灣，日期不詳。

調景嶺堂與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緊密合作，在該會尚未結束在調景嶺的工作以前，教會的兒童工作完全由該會負責，包括兒童主日學在內。1961 年，兒童福利會停辦兒童主日學，教會才自行承擔是項事工，在 1963 年約有兒童五、六十人。

五十年代末期，調景嶺社區有激烈變化，最早期遷入的居民大都轉赴台灣或外遷市區，會友大量流失，教會迅速衰落，人數銳減至一百人以下。[28]1963 年有這樣的記述：[29]

> 在過去一年中，除每日早晨靈修，每晚之各項不同性質之聚會，如傳福音、公禱、婦女聚會、成人查經、少年團契、見證會，則始終不停，逐日事奉在主面前外，其經常主日崇拜人數，約在四五十至七八十人不等，實在需要主之復興。

第三節　信義會

（一）顧永榮主政時期

顧永榮隨難民一同遷往調景嶺，在四區以葵葉蓋搭教堂

---

[27] 范約翰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6 日。

[28] 有幾位受訪者提到，宣道會的衰落，與教會負責同工親眷的德行榜樣有密切關係，詳情從略。

[29] 《基督教香港區聯會同工退修會手冊》（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20 日），頁 37。

和校舍，教堂規模龐大，可容千人聚會。1950 年 10 月 1 日，教會正式成立，信義神學院曾派詩班前往獻唱。

信義會在摩星嶺主率的香港難童義務學校亦遷往調景嶺，成為調景嶺第一所學校。教員方面，除顧永榮外，最早期有高尚武與楊致遠等。高尚武因受教會薪水，為其他難民嫉妒，誣指他為左派，給人毆打，被迫離職轉讀神學。楊致遠肄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與政治大學，他亦在不久離職；由肄業於中國大學與政治大學的張世傑接任。其時學校增辦中學，張世傑為首任中學校長。

信義神學院的學生佈道隊在早年定期來營佈道，每星期一次。蕭克諧憶述，當年從沙田的院址前往調景嶺，交通非常不便，他們得先從沙田坐火車到尖沙嘴，乘船過海，轉坐電車到筲箕灣，坐船過海，再翻過一個山頭才到，單程便用上接近四小時；故到調景嶺佈道，得用足一天的時間。他們通常買一個麵包，帶一瓶水，在社區從事家庭探訪與個人佈道，毋須與當地教會聯繫或配合。[30]

楊憶茂於 1952 年在信義神學院以特別生身分畢業後，便在調景嶺信義會工作。他原為軍人，與難民背景相同，溝通方便，由於滿臉麻子，被喚作「楊麻子」。六十年代以後，楊憶茂曾離開調景嶺到九龍別處事奉，期間有張濟堂、胡坤等（二人皆已離世）華人參與牧養，後來楊氏重返，工作至退休赴台為止。

---

[30] 蕭克諧院長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1 日。

信義會聘有曹淑慧女傳道。她與丈夫帶同兒子來港，於1950年先到摩星嶺，再遷入調景嶺。信義會的路教士與她接觸，見她子女眾多，生活困難，乃邀請她協助傭工，因而聽道信主。起初她夫婦倆在教會裡參與繡花工作，曹淑慧亦陪同路教士等到處探訪；其後，兩人一同供讀信義聖經學校的校外課程，丈夫在教會擔任總務，也畫山水畫，賣給挪威教會的信徒，而曹則正式受雇於教會為女傳道，帶領婦女事工，並在小學兼課。[31]曹淑慧在調景嶺教會一直工作至九十年代清拆前夕，除在信義小學教聖經科外，也熱心探訪坊眾，向他們傳教，從不介意給人拒絕，[32]又常前赴肺病療養院探望病人；1998 年逝世。她的兒子為劉民和牧師，1951 年於調景嶺出生，現為台灣晨曦會總幹事。[33]

---

[31] 曹淑慧曾於國內師範學校畢業，原該有條件任職教師，但因只會講湖南話，國語說不好，故在教學上有困難。其後才在小學教授一、二年級的聖經課。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32] 這是曾受教於她的羅菁女士的印象。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

[33] 有關資料主要由劉民和牧師提供。劉民和牧師，湖南衡陽人，1951 年在香港出生，於信義小學及調景嶺中學讀書，赴台灣升學，畢業於逢甲學院國際貿易專科。十五歲在調景嶺加入黑社會，並染上毒癮，後在香港晨曦會戒除毒癮，並投身傳道。創立台灣晨曦會，並在泰國與緬甸建立戒毒事工。他提到個人深受其母親的傳道精神所影響。劉民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10 日。

陳國英[34]為信義會的資深信徒。她在 1950 年 12 月遷到調景嶺，當時有兩個分別為兩歲及四歲的孩子。她自少加入聖公會，對聖經嫻熟，故很快便獲邀請在難童學校任教，月薪五元，據她說，她是當時難童學校第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教師。她說當時學校談不上有甚麼制度，適齡兒童凡喜歡來的都予接受，有年幼至一歲半的，幾乎就等於託兒服務。當時幼稚級有三百多學生，分三班上課，每班都有百多人，學生坐在矮長條木凳上，每張坐十來人；也沒有甚麼課程，就教他們唱詩，說聖經故事。其後學校逐漸走上軌道，在挪威差會的資助下陸續添購院舍設備；陳國英在幼稚園任教三十四年，至 1984 年方退休，她的學生包括日後成為牧師的盧龍光與熊雅各。

教會設有手工廠，製造首飾盒、洋娃娃、圍裙等手工藝品，救助了不少居民。產品運銷挪威與美國等地，也有透過路德會設在尖沙嘴的工藝社寄賣。雖然年輕人在六十年代以後大都外出覓職，但年齡較大的一群仍藉教會從事手工藝工作，工廠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才正式結束。

顧永榮是非常刻苦儉樸的傳教士，與難民居住在一起，以水沖調麥片和麵包為膳。當時由調景嶺外出，得翻過山頭

---

[34] 陳國英為湖北黃梅人，1928 年生。她在信義會的幼稚園任教期間，曾在信義聖經學校就讀晚間四個月一期的神學課程，直到畢業為止；又與曹淑慧一起到九龍上海街的東南書院就讀，同在 1961 年畢業於社會教育系。1984 年幼稚園退休後，到聖公會聖十架堂當幹事四年，後轉馬鞍山聖提多堂當幹事五年。她的女兒（王柱男）及女婿（馬漢欽牧師）都是傳道人。

到茶果嶺才能乘車，據說他為免皮鞋過分磨損，乃脫下鞋子走路。他的精神對難民有很大的感召作用。[35]

（二）鄭錫安主政時期

馬成德(Brede Mella)在最早期曾協助調景嶺工作，擔任信義中學校監，後來轉赴台灣。另外，尚有李姓（漢譯）傳教士、鄭錫安(Agnar Espegren)及董曉(Magne Ostertun)等。顧永榮於 1956 年 4 月退休回國，調景嶺事工由鄭錫安接任，鄭錫安於 1955 年來港。此外，有幾位女性教士對調景嶺事工出過大力，包括吳思道教士(Malena Opstad)、路恩德教士(Kristine Nødland)與那教士(Dagny Nøding Taylor)等。[36]信義會的傳教士乃六年為一任期，休假期間，差會另派傳教士接替，也有在休假後重回昔日工場者。

信義宗世界服務處於 1952 年成立，由原負責外國難民救濟工作的施同福(Ludwig Stumpf，1913~1987)出任主任，展開對百多萬從大陸來港難民的救濟服務。信義宗各堂會參與，並成立顧問委員會，由信義神學院美籍教授艾樂道(Luthard N. Eld)出任主席。該會最初提供食物、衣物及金錢等援助，及後

---

[35] 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陳國英也有相同的見證，可見這是家傳戶曉的故事。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36] 陳國英曾提到尚有何教士、韓教士、石教士等。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才開展其他事工。調景嶺的居民是其中的受惠者，在鄭錫安的聯絡下，信義會積極參與派發救濟品的工作。[37]

郝次航這樣形容鄭錫安：[38]

> 我不信任何宗教，到現在還是無神論者，我情願不要任何救濟品，也不要信教。不過我去聽過鄭牧師講道，我們私交不錯；但我不受洗。他……的確是個好人。他自己是外國人（挪威人），而他所教育的、幫助的，沒一個是外國人，都是中國人。他說一口道地的河南話，對中國的四書、五經，讀得比我們許多人都要好。

魏榮在 1950 年來港，起初住在李鄭屋，在那裡接觸福音，受洗加入信義會石硤尾活石堂（1951 年設立）。[39]後在 1953 年以一百元的價錢買得調景嶺一間小屋，遂遷入調景嶺。一次顧永榮到李鄭屋教會講道，知道他居住調景嶺，乃邀請他轉會到所屬社區的教會。他在調景嶺聚會，至 1959 年 9 月獻身傳道，先讀為期三個月的信義聖經學院短期班，

---

[37] 參楊憶茂所撰簡史，影印本由胡子浪監督提供。劉民和牧師也提到他們從教會處獲得牛仔褲、奶粉、牛油、乳酪等多種衣物食品。劉民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10 日。

[38] 〈郝次航先生訪談錄〉，《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181。

[39] 最初信義會各堂均僅以地區命名，即如信義會調景嶺堂，堂名乃後來添加的。調景嶺堂日後稱為復興堂。

翌年轉正科，1962 年畢業。在學期間，一直協助鄭錫安在調景嶺工作。1963 年起，調任黃大仙信義會信恩堂，但仍居住在調景嶺，至七十年代為止。[40]

據他憶述，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為止，信義會都維持有百多人聚會，其中包括數十名小學學生。小學設有宿舍，學生住校，於週末及星期日參加詩班等教會活動。中學與教會的關係略有問題，故學生的參與較遜。教會的外展工作不多，但查經班與祈禱會都有許多人參加。調景嶺社區不大，遇有特別聚會臨時安排，要通知所有信徒亦不困難。

信義會的調景嶺事工由豫鄂陝信義會負責，1960 年易名為挪威信義差會。1968 年，因同工按立問題而與香港信義會意見不合，遂於翌年退出，自行發展。1978 年，該會的華人教會自立自養，成立港澳信義會，由鄭錫安擔任首任監督。

第四節　錫安堂

（一）戴瑞蘭的傳教工作

戴瑞蘭跟隨難民遷入調景嶺。據她憶述，在 1950 年 6 月，當香港政府公佈要將難民救濟工作遷到調景嶺時，不少難民起初都不願意搬遷，並且產生各種謠言。有人問戴瑞蘭去留

---

[40] 魏榮牧師為廣東梅州五華人，1930 年生。1950 年來香港後，先從事建築工作，至奉獻傳道為止。1962 年在信義聖經學院畢業，1972 年復於信義神學院完成課程。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

的意見，她回答說不用擔心，反正她也沒有住處，故亦願意隨往。不過，當她與難民一起乘坐政府安排的渡輪前赴調景嶺時，亦因前路茫茫，一時感懷，而在船艙地板坐著時哭起來。到了目的地以後，難民獲分配入住 A 字棚，一位負責的英籍政府官員，也為戴瑞蘭提供一間，戴非常高興，這是她第一間自己擁有的居所，[41]全屋唯一的家具是一張帆布床。

不多久，因見難民在醫藥方面的需要，她向社會局駐營職員申請為難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經批准後，7 月間，社會局在二區撥給她大葵棚一座，煤油汽燈一盞，竹椅數十張，她也遷住到葵棚去；原來的 A 字棚，她則轉送給一家九口擠住一個棚的信徒家庭。不少在難民營的信徒義務協助醫務所的工作。[42]

戴瑞蘭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從事醫療服務，順道向人傳福音。一些在醫務所裡幫忙的信徒，眼見宣道會每晚聚會都人頭湧湧，乃思利用醫務所的葵棚，在晚上舉辦聚會，邀請居民參加。[43]

> ……在醫務所工作的三兩位弟兄看到這種情形，大家商量，認為一個佈道帳棚既然不夠。而自己又有這現成的

---

[41] 〈戴教士的話〉，《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頁 2~3。

[42] 范約翰：〈集體入營——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五〉，《基督教週報》第 333 期（1971 年 1 月 10 日）。

[43] 范約翰：〈義務診所——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八〉，《基督教週報》第 382 期（1971 年 12 月 19 日）。

> 地方，有竹橈，有汽燈，葵棚也高大涼爽，何不將之利用，也舉行佈道呢？於是由另一位來營的神學生擔任講道，難胞弟兄們邀請朋友赴會，擔任招待，其他一切既已現成，只預備幾張白紙，毛筆和墨汁寫聖詩，用兩根粗木條夾起來就可以掛上，好在來聚會的難胞中，有許多是住在大坪的盲殘，就著近便，不用上到山坡上去到宣道會，也可以聽道，他們不用聖經，在起初佈道的時候，儘管一切皆因陋就簡，每晚也還有幾十人參加。

她記述某天當她從市區購物回來，看到葵棚外貼上「基督教會」四個大字，高興得大笑起來。但接著而來的問題是如何開辦教會，由於沒有經費，她只能寫信回國，告訴自己教會的牧師，教會立即寄來港幣九百元，於是便利用這筆款項，購買黑色油紙與木樁，然後由營中信徒合力興建一間油紙房。紙屋連窗戶也沒有，只開了幾個透氣的洞。戴瑞蘭便入住這間油紙房，開始教會聚會，命名為錫安堂，並陸續添購木板座椅。

教會主要由戴瑞蘭負責，也邀請其他人襄助。戴瑞蘭用聖經公會的材料每天早晚都舉行查經班，有許多信徒參加，另外又有禱告會，教會非常興旺。戴瑞蘭亦開辦英文班，分初、中、高三班，學生非常多，他們不少在後來成為信徒。戴瑞蘭說，教會每星期共有廿二個聚會。

（二）靈糧堂的協助

方是時，靈糧堂有若干會友居住在調景嶺，該會幾位同工信徒如許彼得、何海濤、邵寶夫等，約八至十人，每週定

期前往探望他們，並與他們一起聚會。孫伯噍對錫安堂的幫助尤大。李德恩（後按立牧師）自澳門志道堂轉來靈糧堂工作後，有一段時間每週來營講道。[44]

> ……現在既有了這個地方，香港靈糧堂每禮拜有長老執事數人前來一次，作屬靈的團契交通，大家就請附近朋友參加，儘管在暑熱天氣，葵扇都沒有一把，所坐的長櫈是用來放床板的，又窄，又沒有靠背，坐在上面極不舒服，但是每次聚會都擠滿了人，甚至有人站著一個鐘頭聽道，後來又買了一支汽燈，三毫錢煤油可以點兩晚，晚上也有了聚會，由已經受洗的弟兄輪流擔任講道，或者作見證，這樣也開始了錫安堂的工作。嶺上共有了四間教會。

據蔡惠師牧師與劉梅軒長老憶述，靈糧堂設有培工會，由黃彼得牧師等帶領，有三、四十人參加。培工會下設佈道團，信徒自發性地在港九各處進行街頭佈道，有些成功地建立了教會，有些則因工作未見長遠果效而停頓。但在他們的記憶裡，調景嶺並非靈糧堂有計劃要拓展事工的地區。[45]

---

[44] 范約翰：〈災禍頻仍——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九〉，《基督教週報》第 399 期（1972 年 4 月 16 日）。李德恩為上海人，有兒子李延英牧師，在美國紐約循道會任職。

1950 年 12 月難民營所出的刊物，曾提到靈糧堂是營內六間教會之一。履平：〈營中雜寫〉，《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3。

[45] 劉梅軒長老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8 日；蔡惠師牧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9 日。蔡惠師牧師曾借閱早期靈糧堂在香港的各事工史料，其中連一條有關調景嶺工作的記述亦不存，

1951 年春，有卅四人信主，趙世光為他們施洗。秋間，原來的油紙房已不敷應用，瑞典教會再奉獻港幣八百元，改建成木構的房子，可容一百五十人聚會。由於地方較為寬裕，在孫伯噍長老（他有一家出入口公司）的協助下，戴瑞蘭與信徒陳和欽從市區取得一些繡花手工回來，分給信徒參與，幫補家計，教會在平日遂變為工場。信徒熱心參與教會事工，其中骨幹份子有范約翰與張祖鷺[46]等；王力耘原在宣道會聚會，因參加英文班，也來錫安堂協助，並參加特別聚會，他是在張四姑主講的培靈會中獻身傳道的。

因著初期靈糧堂每週派人入營協助，不少人曾誤以為錫安堂就是靈糧堂。[47]1952 年後，靈糧堂不再派員定期協助教會牧養。

（三）錫安堂的發展

1952 年，由於戴瑞蘭一身兼負醫療與教會工作，積勞成疾，患肺炎幾乎致死；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顯見這個事工既非為教會事先計劃推動的，亦未被教會事後承認。

[46] 張祖鷺於 1950 年 3 月從大陸逃港，在東華醫院接觸福音，是年 11 月在調景嶺錫安堂受洗。1952 年，在信義中學教書，沒拿教會薪資。1954 年到伯特利聖經學院讀書，畢業後在伯特利中學任教，亦協助調景嶺錫安堂。1963 年至 1971 年，任錫安堂傳道職。後轉到中華傳道會工作，1978 年在該會按立為牧師。蕭麗霞、盧慧桃：〈張祖鷺牧師專訪〉，《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頁 14~15。

[47] 有關靈糧堂參與的部分，資料蒙鄧文娟姑娘、畢姚芬姑娘協助聯絡和提供。

答允派遣傳教士前來襄助，有兩男兩女加入。男的包括姚如雲與繆學理兩位牧師，前者為英籍的聖公會牧師，後者則為加拿大人；女的則有艾美德與夏天惠，前者為英國聖公會傳道人，後者為瑞士改革宗教士。兩位女教士入住戴瑞蘭的居所，而男性則另建了牧師宿舍居住（此即日後的正堂）。後來另有費書楷、羅柏士與艾文師等牧師先後前來協助牧養。不過，所有男同工都在一年多後離任。艾美德與夏天惠主要協助婦女識字班與兒童聚會，許多婦女非常熱心，她們因不識字而背誦很多經文。至是年底，教友增至百餘人，並組織第一屆執事會。

1953 年，曾在華傳教的瑞典宣道會(Swedish Alliance Church)約翰生教士(Ruth Johansson)[48]寫信給戴瑞蘭，要求前來加入工作，於同年 11 月抵埗。戴瑞蘭乃得在同年 12 月回國休養。她憶述說，當時許多信徒都不相信她在回國後還會重來，故不願意讓她離去，結果她得請母會破格為她購備回程機票，才令信徒安心。

約翰生看到信徒生活困苦，乃致力推展繡花手工，她在鍾尚志與梁慶兩位信徒的協助下，成立繡花公司。梁慶赴台後，由林蔚然接替。1958 年，在信義宗世界服務處的資助下，他們買進一個房子以為繡花工場，讓信徒與居民白天在這裡

---

[48] 約翰生在綏遠省包頭傳道多年，1951 年回瑞典。她在調景嶺工作期間，亦在調景嶺中學任教。她在調景嶺錫安堂工作至 1970 年退休為止。〈大事年表〉，《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頁 34~35。

從事繡花工作。後再擴充為工藝社，1960 年，參加工作人數約計八十人。所出產品乃屬手工藝性質，包括刺繡品與玩具等，多具東方色彩，以行銷瑞典為主，也有運到英國與加拿大。

1954 年，兩位內地會的女傳教士艾美德與夏天惠都因另有負擔而離去，前者去台灣，後者則往印尼；約翰生乃寫信到瑞典，請艾喜德教士(Asta Nilsson)前來襄助。艾喜德有很強的講道恩賜，對青年事工尤有貢獻，她工作至 1957 年，便轉到九龍與華人張復生聯袂開辦聖徒聚會所，但仍間中回調景嶺教會帶領查經，後來她亦在海外神學院任教。

1955 年 5 月，戴瑞蘭回港重投工作，她得到一筆款項，將原有的木構宿舍改建成一幢兩層石牆瓦頂的房子。

在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協會的主動建議並資助下，錫安堂開始澳門的事工，管淵若被派到澳門開設分堂，他是第一個受薪的華人傳道。管淵若，河南人，錫安堂初期信徒，畢業自宣道聖經學院，在澳門開設分堂之餘，亦建立孤兒院，並設有手工部，教導難民畫國畫與繡花。1957 年，戴若蘭將他按立為牧師，請劉福群牧師主禮；按牧後，兼理香港與澳門兩地教會。六十年代初年，因發生桃色事件，被教會革退，戴瑞蘭資助他一家移民巴西，繼續傳道工作，直至在當地逝世。[49]

---

[49] 據楊植潤牧師說，管淵若原為畫家，曾於杭州藝術學校肄業。1963 年 1 月前往巴西，在那裡建立教會。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范約翰先生補充說，巴西政府在當時廣泛招徠移民，任何人只要以一元一呎的價位買地五千呎，便獲得居留權，管為教會革退後，便轉到那裡定居。范約翰先生訪問記錄，

教會在 1957 年成立青年團契與少年團契，另設婦女部，舉辦婦女聚會。

1957 年，教會建立新留產所。在艾喜德離去後，是年有白純(Ingegerd Persson)、李慕德(Ingegerd Lidenmark)[50]兩位教士從瑞典前來填補空缺，二人皆有護理知識，對教會的醫務工作幫助甚大。兩年後，留產所擴建。

錫安堂的信徒熱心傳教，曾組織佈道團到四鄰鄉村傳教：[51]

> 錫安堂鑒於附近村莊需要福音，由難胞弟兄姊妹組織佈道團，在沒有電船以前，就先乘坐舢舨，每禮拜往坑口一次，順便往斜坡上面的村落佈道，舊曆新年時更大舉出動，往馬騮塘、茶果嶺等地。去到外面幾個鐘點，多數作露天佈道，既缺乏樂器，又沒有掛圖和其他的設備，單單是幾個無佳形美容的弟兄姊妹們，用國粵兩種言語，效果非常微小。後來帶些藥品去給他們免費醫治，也還是沒有甚麼人來聽，有時有一些孩子圍著看熱鬧。新年時，有的鄉下人迷信風俗很深，遇到佈道團就燒炮竹，或故意大聲敲鑼以擾亂……。

2000 年 3 月 10 日。

[50] 李慕德在 1960 年轉往澳門的孤兒院工作。白純在教會工作至 1973 年，她是最後一位離去的傳教士，回國後結婚，隨夫姓為 Ingegerd Meltun。〈大事年表〉，《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頁 35。

[51] 范約翰：〈福音工作的演變——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十五〉，《基督教週報》第 472 期（1973 年 9 月 9 日）。

在約翰生的開拓下，1959 年開闢大欖涌佈道所，在那裡及在荃灣開設識字班，同年在澳門籌辦孤兒院。

1959 年，將內地會牧師所建宿舍改建成禮拜堂，新堂落成，可容納二百餘人，裝設了風琴及電風扇，另有可容百人的副堂，及小型圖書館。

1963 年，戴瑞蘭眼見教會一切已上軌道，便將錫安堂工作交由約翰生與白純負責，自行到台灣開展新工場，她在當地建立台北錫安堂教會（在師範大學附近），又與別的差會團體協辦神學院，工作了三十年。[52]

錫安堂自成立以來，直到 1960 年為止，曾受洗之教友計有四百五十餘人，留在調景嶺的有一百五十人，其餘或遷台灣，或轉到港九地區工作。[53]在錫安堂出身的傳道有陳和欽、楊逢年、賀文俊等。

第五節　崇真會

1950 年，崇真會各堂捐款接濟調景嶺的客籍難民，開始關懷當地的事工需要。[54]1951 年 12 月，崇真會傳道部議決

---

[52] 有關錫安堂的大部分資料，都來自戴瑞蘭教士的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

[53]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46~51。

[54]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百年事略〉，《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立會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867~1967)》（香港：該會，日期不詳），頁 58。

開展調景嶺的福音工作，先由區牧何道修牧師來營，建立宣道所，借用信義會堂址為禮拜堂，委周美珍姑娘為主任。

第一次洗禮在 1952 年 5 月舉行，共有四十人接受水禮。由於信主人數眾多，由深水埗堂洪德仁牧師與何道修牧師負責帶領查經班。一年後，周美珍調職窩美堂，何道修兼任調景嶺宣道所主任。[55]何道修原兼窩美堂主任職，故是與周美珍對調工作。

窩美堂與調景嶺宣道所似乎頗有關連。盧龍光的父母從中國大陸來香港後，先在西貢窩美居住，全家並在崇真會窩美堂受洗；他們在 1952 年才遷入調景嶺，但母親在深水埗崇真小學任教，繼續參與崇真會的聚會。[56]

1952 年年底，區董會鑑於調景嶺營的客籍居民不多，決定結束事工。1953 年，何道修病逝，宣道所正式結束，事工併入路德會，佈道所僅辦兩年餘，結束時有信徒 166 人。[57]

---

[55]江順昌：〈窩美崇真堂簡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編：《香港崇真會立會一百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847~1987)》（香港：該會，1987），頁 246。

[56] 盧龍光博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8 日。

[57] 有關資料乃由崇真會總會執行幹事曾福全先生提供，2000 年 3 月 27 日。另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香港崇真會出版部，1974），頁 45；張維豐：〈香港崇真會史略——香港崇真會編年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立會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867~1967)》，頁 76。

第六節　神召會

有關神召會在調景嶺開基的經過，我們找不到任何文獻資料，僅能從該堂兩位最重要的開創與繼承者徐傳宣牧師和謝志和牧師[58]口中，知道其中情況。

（一）神召聖經學院學生實習的成果

前面提到，神召會在調景嶺難民中間的事工，是由時在長洲神召聖經學院就讀的徐傳宣開始的。1950 年初，徐傳宣被派前往摩星嶺向難民佈道，以為週末實習的作業；難民遷入調景嶺以後，他亦繼續前往佈道，經費（包括車馬費與伙食費）由聖經學院支付。1951 年暑假，他與另一位以難民身分來港、時在神召聖經學院以旁聽生身分就讀的張大衛醫生，共同在調景嶺開拓教會工作，全時間住在難民營。當時他們暫借大坪營辦事處對面工作人員的帳棚居住，後正式向方適存主任申請用地以建佈道所，獲撥批第三區路邊一塊原為 A 字棚的空地。該地因火災燒了一大片，一直留著沒有建

---

[58] 謝志和牧師，江西廣昌人，1911 年生。1950 年來港，1952 年於長洲浸信會受洗。同年入讀時設於長洲的神召聖經學院。1955 年畢業。先在中國佈道會工作，頭兩年協助編輯《生命雜誌》，其後參與九龍迦南堂的牧養。1959 年，因協助神召聖經學院院長巴爾德(B. T. Bard)重印其在國內已出版的書籍，重回神召會。是年到調景嶺堂工作。1961 年封立牧師，同年轉到佐敦谷，開辦華聯小學，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為此校提供五百個免費學額，由外國人領養學童，每人每月十餘元。1965 年，於九龍灣臨屋區開設小學及佈道所，後改設幼稚園，至 1991 年校址因該區拆建而被政府收回。1990 年，在將軍澳欣明苑開設欣明幼稚園。

屋，用以警惕難民注重防火意識，故稱為「火燒坪」。有這麼一塊現成的空地，便不用做開闢土地的工作。

徐傳宣在得到批准建佈道所後，便與聖經學院負責學生實習工作的鍾耐成牧師商討。鍾牧師除在聖經學院任教外，亦在亞皆老街神召會（原在彌敦道邵氏大廈聚會）定期講道；該教會有位教友奉獻一個軍用帳棚，可以容納百人聚會，調景嶺佈道所便這樣建立起來。徐傳宣等日間在帳棚聚會，晚上有信徒住宿在帳棚裡，他們的行李亦堆放在帳棚中央。

暑假後，徐傳宣回校復課，聖經學院乃差派是年畢業生何溢生接任調景嶺工作，但為時不長。1951 年 10 月 31 日，調景嶺發生大火，佈道所的帳棚被焚燬，後改建為木屋（最後才建成泥磚房屋），並由神召總會從聖經學院手中接辦，正式命名為神召會靈恩堂。

（二）徐傳宣與靈恩堂的奠立

1952 年年中，徐傳宣畢業。由於何溢生的離去，神召聖經學院派遣包括他在內的六位畢業生組團隊前往調景嶺工作，其中包括張大衛醫生在內。不過他們相繼離去轉任他職，只剩下徐傳宣一人，他一共做了六年。教會平日由他一人獨力料理，逢聖餐禮拜則有一位傳教士前來派餐；1955 年徐傳宣按立為牧師後，便再無傳教士前來了。

徐傳宣憶述，教會在 1952 年舉行第一次水禮，有一百多人參加。其後的水禮則人數較少。1952 到 1953 年是教會

發展最興盛的時期，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晚都舉行聚會，有時查經，主要是講道聚會，沒有特別的佈道聚會，平常講道便帶佈道信息，星期日則有主日崇拜。每次教會打鐘後，便瞬即坐滿了人，少則數十，多則上百。因居民無處可去，生活苦悶，故樂於參與聚會。張大衛醫生原來在安徽皖北蚌埠開設醫院，頗具名聲，故吸引不少安徽人前來聚會。不過，張大衛很快便轉赴台灣。由於信徒自行前來聚會，教會沒有從事逐家佈道，只在會友有需要時，才出去探望他們。

神召總會最初支付徐傳宣每月七十元的薪資，再無另發事工費用。徐傳宣利用這筆款項購買米糧，與其餘五個一直在教會義務協助事工、且住在教堂的弟兄共用，他們一起在教堂吃住。除他們六人外，還有數十人每晚都在教堂住宿，他們把聚會坐的長板凳兩三張拼合起來，便可睡覺。白天則有不少難民前來借用教堂地方，從事繡花工作。

在徐傳宣工作的時期，神召會教會並無展開難民救濟工作，他記得教會只曾派發過一次由美國神召會贈送的舊衣物。居民前來聽道，吸引他們的是上帝的話。信徒有到別的教會領取救濟品，後來轉入別的教會，如李光堯最初便在神召會聚會，後轉到路德會，西門英才教士大力栽培他；但也有別的教會信徒前來聽道。

後來難民一批批獲准遷居台灣，原本第一批會友大多離去，難民營遷入不少外來居民，教會裡說廣東話的人也增加了。1954 到 1955 年，聚會人數或有減少，但並不顯著。徐

傳宣指出，直到 1957 年他離去為止，教會還是坐滿人的。會友一般年齡較大，男多女少。

教會有人前往沙田神召聖經學院或其他神學院唸神學，但畢業後投身全時間工作的不多，徐傳宣記憶中有廖旭燊、王定九等人。

1957 年，曾短期接馬理信牧師為神召聖經學院院長、後轉赴台灣發展神召會的貝光臨牧師（James Baker，他在雲南出生，父母為赴雲南工作的傳教士）邀請徐傳宣離開調景嶺，轉到台灣任教聖經學院。為此，神召總會轉派時剛於聖經學院畢業的李紹光前往接手調景嶺的會務。[59]

（三）謝志和與靈恩堂的延續

一年後，李紹光離開調景嶺，轉到柴灣工作，由謝克武[60]接任，他於 1958 年畢業於神召聖經學院，在調景嶺工作一年。1959 年，神召會調謝克武到澳門工作，改聘謝志和到靈恩堂事奉。

為了便於工作，謝志和遷入調景嶺。自開基以來，靈恩堂有三百多人受洗入教，但許多已遷到台灣或市區，在他工

---

[59] 徐傳宣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7 月 4 日。

[60] 謝克武同為江西廣昌人，其妻為謝志和的胞妹。1956 年入讀於神召聖經學院。他在澳門工作三、四年後，返回香港，在神召聖經學院工作，曾代理院長職。

作的三年間，靈恩堂只有二、三十人聚會。據謝志和說，他在三年內帶領五十多人信主。

在謝志和主理會務期間，教會主力協助救濟機構派發救濟品，約有六十至七十人在神召會登記，每月領取麵粉、舊衣物等。

謝志和於 1961 年離開調景嶺，但教會僅餘四、五十位會友，無力另聘牧者。他繼續每星期前往靈恩堂協助主日崇拜，直到教會在 1994 年被遷拆為止。

據徐傳宣指出，香港的神召會主要是 1949 年以前的華南神召會的延伸，傳教士除貝光臨外，皆只說廣東話（這是貝光臨轉赴台灣的其中一個原因），故神召會沒有國語事工。神召總會並不特別熱心支持調景嶺的工作，事實上，這個事工亦僅是神召聖經學院學生實習所結出的果子，總會視此為特殊事工，並非有計劃的安排。當神學院不再直接參與是項事工後，神召總會亦樂於將靈恩堂的工作轉給謝志和個人料理。

靈恩堂在拆建後，政府賠償教會一百餘萬，謝志和將款項在旺角購置一個單位，重辦靈恩堂。至於調景嶺的餘下八位會友，則轉到神召會港澳區議會的九龍灣堂（會址附設於將軍澳欣明苑欣明幼稚園內）。神召會港澳區議會轄下只有這兩個堂會。[61]

---

[61] 謝志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第七節　教會聚會所

據徐傳宣、謝志和及好些人士憶述綜合，五十年代初期，教會聚會所在調景嶺有聚會，最初並無會址，只是在信徒家中有小組；後來在山頂的碉堡附近購置房子，參加人數約有數十。[62]這些信徒大多在國內已參與聚會所，他們來港後首先參加外頭的聚會所活動，後來才在調景嶺設立家庭式聚會。

據一位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參加聚會的人指出，除主日擘餅、信息聚會外，教會有祈禱會（星期二晚上舉行）與青年小組，年輕信徒不太多，主要是中年人。[63]或許教會較為內向，拓展並不積極，故新信徒不多。

另有知情者透露，1951 年，教會聚會所一位負責人倪光熹初見調景嶺居民生活困苦，自發地帶領信徒做救濟工作，包括派發米糧、奶粉和餅乾等，但這與教會沒有直接關係，教會的原則是不參與社會服務的。

王力耘曾憶及一位盲人信徒賀逸，與宣道會的王澤生牧師相善，原在宣道會聚會，後來與王澤生鬧翻，轉入聚會所，

---

[62] 謝志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63] 這位不願透露名字的信徒是在 1953 年於天文台道教會聚會所信主的。1957 年，在海富生醫生（後詳）的介紹下到迦南療養院工作；1960 年，迦南療養院結束，轉到靈實醫院服務，至退休為止。後來由於他轉到李常受的系統去，故與天文台道的系統不再有聯繫，他也不願多談有關事情。不願透露名字的信徒訪問，2000 年 5 月 27 日。

這應是他 1958 年 8 月離開調景嶺之後的事。[64]王澤生的兒子王明理便是參加天文台道聚會所的。

徐傳宣另提到一位自由傳道張復生，他原本有耶穌家庭的背景，敬奠瀛的妹妹是他的未婚妻。他來港後到調景嶺作自由傳道，住在神召會的教會裡，靈恩堂間中也有請他講道。後來徐傳宣離開靈恩堂，張復生便轉到聚會處聚會。

張復生與另一位傳道范銘恩亦有特別的淵源。范銘恩是河南人，原為信義會會友，曾在沙田信義神學院就讀；但他在鄉間時與耶穌家庭有聯繫，故與「公會」不合，尚未畢業便離開神學院，轉到聚會處聚會。因他與李常受等不合，不久便去了調景嶺，張復生把他介紹給徐傳宣，范銘恩乃在靈恩堂聚會。後來徐傳宣把范銘恩介紹到九龍何文田迦密堂事奉。范銘恩在迦密堂工作期間，曾邀艾喜德教士前往講道，彼此相善，他們便聯袂開設聖徒聚會所。[65]

六十年代初期，調景嶺聚會所結束，原來房子改作退修營地，假期有信徒前來聚會。[66]

---

[64] 王力耘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7 日。

[65] 徐傳宣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7 月 4 日。

[66] 由於教會聚會所甚少就他們的歷史留下文字資料，加上教會曾遭分裂、人事遷遞，尋訪史料極其困難。筆者經多方拜託，才得訪問其中幾位曾參與其間的信徒，惜他們的立場是盡可能不說負面評論，亦不涉及任何個人，故所得不太多。這部分惟願日後有知情者予以補充。

第八節　天主教

（一）曹立珊與耀漢會

天主教在調景嶺開始工作的是曹立珊神父，他是河北人，隸屬耀漢小兄弟會（又作若翰小兄弟會，取名自施洗約翰），曹於十七歲（1930 年）加入修會，受業於原比利時籍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1927 年改入中國籍）[67]門下，抗戰時期追隨雷鳴遠並參加救傷隊，活躍於大別山區。在雷鳴遠逝世後，於 1941 年接任耀漢小兄弟會會長。[68]

耀漢小兄弟會乃雷鳴遠神父在國籍主教孫德楨的託付下，於 1928 年在河北安國創立，這是中國第一個國籍修會。抗日戰爭期間，修會全力支持國民政府抗戰，1940 年曾受共產黨慘烈迫害，十多人被殺，雷鳴遠亦身陷共產黨人的囹圄，旋即逝世。曹立珊接任會長後，不久為日軍俘虜，獲釋後在北平清河鎮淪陷區建立農場，面積達十公頃，成立修士訓練基地。戰後，因功勛卓著，備受社會推崇，許多人要求加入修會。修會與國府關係密切，曹立珊曾在 1947 年組織救傷

---

[67] 有關雷鳴遠的生平，及耀漢小兄弟會的建立，參趙雅博編著：《雷鳴遠神父傳》（台北：文景出版社，1977）。

[68] 曹立珊曾在 1941 年中原大會戰期間為日軍俘虜，被囚三個月，釋放後到北平，在淪陷區掌理耀漢會會務。1944 年晉鐸。1947 年，應第十二戰區總司令傅作義的邀請，重組天主教救護隊，在華北平津察綏之役，搶救傷患官兵與民眾。曹立珊於 1980 年卸耀漢會會長職。周維屏：〈曹公立珊神父八秩壽序〉，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頁 1~7。

隊，協助傅作義抗共，被新政權列為戰犯。1949 年 1 月，北平被圍，傅作義與共產黨議和，曹立珊乘坐軍機離開北平，經青島赴上海，再乘民航轉來香港。不久有耀漢會的其他修士陸續逃跑出來，他們有些先到西北甘肅等地，才輾轉到香港，合共有十三人。[69]

（二）在調景嶺開基

大量難民逃來香港，其中部分為天主教教友，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Mgr. Henricus Valtorta)[70]在 1950 年夏天，派遣三位神父往摩星嶺進行調查。他們在難民中間尋得七十二個天主教徒，恩理覺決定在摩星嶺設置公教進行站，為難民教友舉行彌撒，並為傳教與救濟的起點，6 月 24 日，在徵得曹立珊的同意下，委任他負責難民的教務。曹立珊接手主持難民工作，剛好是難民遷入調景嶺的時候，他自己未去過摩星嶺。

恩主教給予曹立珊從教友募捐得來的五千五百港元作開辦費，由於缺乏日常運作的資金，曹立珊在 1950 年 7 月 16 日及 7 月 30 日一連兩次在《公教報》發出呼籲，要求各方捐助：

---

[69] 據曹立珊神父指出，沒有逃出來的約有九十多位，他們在五十年代以後都遭到政治迫害。耀漢會如今在大陸尚存的老修士有四至五位，另有數位新加入的修士，但他們只能散居於不同的地下教區工作，不能過團體生活。曹立珊神父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1 日。

[70] 恩理覺自 1926 年開始任代牧。1946 年 4 月 11 日香港由代牧區升為主教區，恩乃成為香港教區第一任主教。

香港各堂區、各修會、各公教團體，並轉全體教胞公鑑：昔日有一大群人圍著耶穌，都沒有吃飯，耶穌說：「我可憐這群人們，因為他們跟隨我已經一連三天都沒有吃飯。」耶穌基督在香港的代表，我們的恩主教看到調景嶺難民中我們的弟兄，他們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也和耶穌一樣憐恤他們，灑下了同情的眼淚。

這班流浪異鄉的難民，他們急需我們的救助，我們的愛情，他們倘無救濟，有餓斃異鄉的危險。

我們的主教以教會家長的身分為要確實明瞭這一切實況，難民們現在是如何艱難，如何可引他們渡過這難關，所以派遣了三位司鐸組成一個調查團，經過視察以後，認為在調景嶺應設立一個公教進行站，作為傳教和救濟工作的起點。

計劃有了，現在沒有基金，服務站信託天主聖意的安排，現在已開始工作了，需要搭起一個葵棚工料約需二三千元。這個葵棚為在星期日獻彌撒（難民中有七十二位是教友，包括有十六個省分），平常的日子為難童上課，做些教育補習的工作。

國籍若翰小兄弟會修士立珊神父願在每主日安排一位神父去獻彌撒，補習學校的教師則由難民中自己遴選。

調景嶺公教進行站需要款項迫切，所以請香港各堂區，各修會，和公教各團體慨然相助，以濟急需。這是緊迫的請求。……[71]

---

[71] 《公教報》1950 年 7 月 16 日第 4 版；1950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

隨同曹立珊前往的有兩位同會修士。他們在到達時，中心地區已為難民及其他團體佔用，他們便在五區闢地，搭建葵棚為教堂，讓難民教友聚集參與彌撒。此外又蓋搭小木屋，以為居住。此時較偏僻的五區尚是人跡稀少，故天主教可以圈出頗大一塊土地，以為日後發展之用。

為了救濟難民，曹立珊偕同一位修士，每天兩次來回中環與調景嶺，把從公教進行社收集回來的衣物揹到筲箕灣，乘船到鯉魚門，翻兩個山頭到調景嶺，再運送上山。有人這樣憶述他：

> 曹神父在難民營草創時，他那種永遠不停的工作，剪大兵式的光頭，穿上黑大長袍，親自挖土，搬石子開山闢路，經常黑夜中翻山越嶺，到港九市區為難民奔走，好像他有無限的體魄，永遠使用不完的精力，給當時許多寄處荒山中之無依無靠之難民，予以莫大之敬佩與鼓舞及效法。天主堂的鐘聲，在初期的難民營中，曾使難民們勾起無限之回憶與儆醒。[72]

曹立珊看到難民營裡有許多兒童整天跑來跑去，浪費寶貴時光，在四位曾受大學教育的公教難民的建議和自動請纓下，便首先開放葵棚為兒童開設補習班，其後決定為他們開辦小學。經過多方奔走，得恩主教同意，派華仁書院的耶穌會科神父（又譯柯神父，Fr. Foley, S.J.）協同辦理。9 月 4 日，公教小學成立，定名調景嶺天主堂義務學校，9 月 15 日正式

---

[72]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4。

上課，當日學生集會，掛國旗唱國歌，據說掛出了在調景嶺的第一面青天白日旗。[73]學生共一百三十餘人，由一年級至六年級，共六班。教師都是難民中間富教學經驗的人。

由於得到各方面熱烈的捐助，特別是在一位隱名的善長慨捐下，學生在入學一個月後，便獲發每人一套新制服。[74]這為學校在難民中間取得良好印象。此外，正中書局答允每年免費供應來自台灣的課本。

為了使教友和學生歡度聖誕節，曹立珊在 12 月 17 日在《公教報》籲請公教兒童，每人捐出一件舊物，如玩具、衣物、鞋襪、糖果等，作為聖誕禮物送給調景嶺的難童，[75]收到極佳的反應。聖誕前夕晚舉行懇親會，公演話劇；子夜彌撒與祭者眾，令葵棚擠塌了一大塊。聖誕節的慶祝會有四、五百人參加，共發出禮物三百多份。曹立珊在 12 月 27 日再發謝函，向捐助人士致謝。[76]

曹立珊在 1951 年 4 月曾描寫教會初立時的情況：[77]

> 自去年六月廿九日由西環摩星嶺搬遷到這兒，差不多已有一年了。難民的數目，由六七千人增至兩萬人。目前

---

[73] 周維屏：〈曹公立珊神父八秩壽序〉，頁 5；〈專訪曹神父〉，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頁 179~120。

[74] 《公教報》1950 年 11 月 26 日第 3 版。

[75] 《公教報》1950 年 12 月 17 日第 4 版。

[76] 《公教報》1951 年 1 月 7 日第 2 版。

[77] 《公教報》1951 年 4 月 15 日。

調景嶺堂區傳教的工作，積極的展開，現有教友數目將達三百人，其中新教友佔全數之半。在每主日上午九時彌撒，參加的教友擠滿了聖堂，有的還得站在門外遙拜，將來倘教友不斷增加時，還需要一所更大的地方呢。每天下午六時，在聖堂內宣講道理，到聽的人都很熱烈。料想將來會找到更多的亡羊，同歸於一棧一牧。

（三）香港最大的中國天主堂

不久，比利時籍的裴效遠(A. Palmers)神父加入協助。他曾在南京教區工作頗長時間，任于斌總主教的祕書，後為南京代理主教。1951 年 7 月被驅逐到香港。他隸屬於雷鳴遠所創立的傳教區輔助會（又稱鳴遠服務團），[78]為雷鳴遠的門生。他有志從事難民工作，在南京總主教于斌和香港恩主教的同意下，加入協助調景嶺的工作。[79]

調景嶺的事工很快便獲得教廷與國際關注。1951 年 9 月 28 日，被中國驅逐出境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由戴遐齡代理主教與祕書葛理根神父等陪同，到調景嶺視察教務。[80]黎公使宣佈調景嶺教堂正式列為堂區，是為聖母升天堂(Assumption of Our Lady)。1952 年 1 月 11 日，美國紐

---

[78] 這是雷鳴遠所創立的四個團體的其中一個(兩個在比利時，兩個在中國，此乃在比利時設立的)。

[79] 裴效遠後來赴台，先後任台北古亭、木柵等地天主堂本堂神父，1991 年卒於台北。

[80] 葛理根神父早在 1951 年 7 月 8 日便已到調景嶺訪問。《公教報》1951 年 7 月 8 日。

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Card. Spellman)來營訪問。[81]同年 9 月 19 日，美國天主教福利總會戰時救濟會會長宣世道主教(Mgr. Swanstrom)來港，到調景嶺探望教友，答允盡力協助他們的生活。[82]白英奇主教(Mgr. Laurentius Bianchi)就任後不久，亦親往調景嶺巡視，主持堅振聖事。[83]

教會慕道者眾，一年間已有二百人參加聚會，葵棚不敷應用。史培爾曼樞機捐出美金二千元，這在當時是相當大數額的金錢，曹立珊將一半用作興建一間兩層高的木板大樓，上層為聖堂，下層分成四間教室。

曹立珊定時向羅馬教廷匯報難民工作情況，教廷答允每月撥出五百美元，以為調景嶺的經費。來訪的中外教友絡繹不絕，他們亦為調景嶺事工捐獻金錢。在經濟充裕的情況下，乃將學校改辦為中學，延聘教師，除供應膳食外，每人每月發給二十港元工資。學校亦向台灣正式立案。

為配合大量事工的需要，邀請適時逃難來港的山西洪洞教區的李若石神父與侯志恆神父協助教務，他們都是曹立珊在北平宣化神哲總修院唸哲學與神學時的同學，但不屬耀漢會。范景才神父[84]與沈鼎臣神父不久亦加入。教會展開大規模的傳教運動，除白天到難民中間探訪外，每天傍晚舉行教

---

[81] 《公教報》1952 年 1 月 20 日第 4 版。

[82] 《公教報》1952 年 9 月 28 日第 4 版。

[83] 《公教報》1952 年 11 月 30 日第 4 版。

[84] 范景才後來也去了台灣，在台北縣坪林鄉天主堂工作。

理研究班，有一百多人參加，分男人、婦女與兒童三班，由裴、李、范神父與耀漢會的修士主講，每晚一小時以上。難民要來聽講六個月，經考試及查問信德後，才能接受洗禮。到 1952 年 6 月，已有八次集體領洗，調景嶺天主堂的教友增至八百多人。[85]1954 年時，更有教友二千多人，每主日有四、五百人參加彌撒。這間教堂被稱為「屬於香港教區的中國最大的天主堂」。[86]

1952 年，教會開辦醫務所。是年聖誕節，共為難民派發衣物包禮物二千多份，為有史以來最高紀錄者。

早期調景嶺的居民大都渴望前赴台灣定居，曹立珊為每個成功取得入台證的教友提供港幣二十元，以作路費。因為人口流動性高，教會並無開辦善會或聖母軍等教友組織。

（四）曹立珊的離去與調景嶺事工的移交

曹立珊眼見調景嶺事工已上軌道，經濟亦穩健，乃轉而為耀漢會尋覓出路。他在筲箕灣為修會購買了一間房屋，以安置相繼來港的同會修士，又曾在那裡開辦鳴遠診療所。但是，香港教區不允讓他們在香港紮根，故轉往台灣開基乃唯一出路。1954 年 1 月 23 日，曹立珊離開香港，轉到台灣，為修會在彼邦尋覓新會址。[87]裴效遠答允照管調景嶺事工，

---

[85] 《公教報》1952 年 6 月 29 日第 4 版。

[86] 《公教報》1951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

[87] 《公教報》1954 年 1 月 31 日第 4 版。1954 年春，耀漢小

李若石亦繼續留任；仍然留下的耀漢會修士則有刁喜樂、劉文郁與張斐理等。[88]此時調景嶺的天主教事工仍在耀漢會的管理範圍內。

曹立珊不久在台北新店及台中水湳各建立聖堂，於站穩陣腳後，便召喚滯港修士陸續遷台。1958 年，耀漢會的修士已大多離去，調景嶺事工轉交香港教區，再轉由同源自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接管，負責者為雷震東神父(Octaof de Vrese)，另有胡神父(Jacques Frocheur)與華籍的李西滿神父協助；三位比籍修士參與會務，負責女生宿舍及擔任教師。聖母聖心會收留了兩位耀漢會的修士。

1960 年時，有在營教友 1,878 人，並有已領洗而離營者約千餘人。

聖母升天堂於 1996 年 7 月 7 日正式結束，建堂共四十六年。[89]

兄弟會先在台北新莊鎮開辦鳴遠幼稚園；7 月，在景美鎮興工建築聖耀漢堂，曹立珊被委為主任司鐸。《公教報》1954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88] 以上主要參諸正英：〈天主教協助難民開闢調景嶺：一九五零至五四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討會論文，1993 年 9 月 22~24 日。曹立珊神父後來將此文以單行本印行，易名為《鳴遠中學創校四十五週年紀念史記》(私人出版，1995 年)。

[89] 〈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公教報》1996 年 7 月 19 日，特輯四。

（五）耀漢會在日後的發展

這裡且簡述一下耀漢會後來的發展。修會先後在台北新店與台中建立堂區，並在台中設立總會院與初學院。至今台灣共有四個堂區，兩個在台北，兩個在台中。1984 年，耀漢會從加拿大聖衛道會手中接辦台中衛道中學，將會院轉設於此。

六十年代，耀漢會在越南開始工作。事緣雷震遠神父(Raymond de Jaegher)在美國協助于斌主教作反共宣傳，偶爾認識了吳廷淡，吳廷淡亦為天主教徒，後來吳廷淡成為南越總理，乃邀請雷震遠到西貢堤岸工作，為華僑開辦兩間中學。吳廷淡被行刺後，雷震遠不能留在南越，乃在 1963 年將兩間學校轉交耀漢會管理，名為鳴遠中學與耀漢中學。耀漢會在當地成立分會，招收修士。1975 年，共產黨接掌政權後，學校被沒收，但修會仍繼續維持，近年改革開放後，加入的修士人數甚多。因著耀漢會在越南的修士有二十多人在赤化後逃到美國，故該會於七十年代末期於洛杉磯與紐約亦設有分會，各辦有鳴遠補習學校，在紐約布碌崙的鳴遠中文學校有三千學生，當地且闢有一個堂區——中華聖母堂，專門向華人傳教。至於香港方面，修會有一人留守筲箕灣會址，專責與國內修士聯繫，至八十年代才賣掉這所房子。

曹立珊到台灣不久，便派遣兩位修士前往西班牙攻讀博士學位，培養人才以作長久之用，他們是趙雅博與宋雅青，

都在北平加入修會，後到香港，再轉赴台灣。趙雅博在完成學位後回台灣，在政治大學與師範大學等任教；宋雅青曾在成功大學任教，後調往紐約負責耀漢會在當地的工作。[90]

[90] 有關資料，皆來自曹立珊神父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1 日。

第四章

教會在調景嶺的社會救濟

第一節　社會救濟

在五十年代，天主教與基督教於調景嶺都做了大量救濟工作。

（一）天主教的救濟工作

天主教堂代天主教福利會、雲先會及其他善團，為難民分發衣服、麵粉、白米、奶粉、奶油、煉乳、藥品等，數量非常龐大，[1]對象不限於天主教徒。單在 1952 年，便進行三次大規模的放賑行動：[2]

> 一次是本年三月間該堂代天主教福利會發放賑衣三百包給全營居民萬餘人，曹神父動員了五十多人，包括修士和教友，一連八天，晝夜不停的核發抽籤證，編號，抽

---

[1] 〈專訪曹神父〉，頁 178。

[2] 耿英祺：〈調景嶺兩週年〉，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頁 256~257。該文原刊於《公教報》1952 年 6 月 29 日。

> 籤，發衣。其他兩次，一次是在今年春節代表史培爾樞機總主教，一次是最近端午節代表某慈善機關，慰勞全營兒童約一千三百多名，兩次每個兒童均各得煉奶三罐，橘子三個，那兩天約兩千餘人（包括兒童及其父母）齊集天主堂大球場，其場面的偉大，群童的歡騰，襯著對曹神父和工作人員們的忙碌和辛勞，真是蔚然大觀！

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得到教廷及其他教區的支持，來自各方面的救濟品便更多，其中大都是食品與日用品，天主教會甚至可以利用這些救濟品為鳴遠中學的學生舉辦各種比賽，以為獎品之用。[3]有記述 1960 年時天主教會在調景嶺的福利救濟工作如下：[4]

> 該會時常接受天主教福利會所分派之救濟品，發給苦難之教友及其他苦難難民，目前經常進行者，有幼稚園學童之飲奶站，中小學生每早發給麵包一個或二個，作為早餐，此均在營內由會方監督自制。
>
> 前述之分配救濟品，如舊衣服用品，米麵及其他營養品，教友與非教友，均一視同仁。但對於住居之困難者及受風災損害者，也給予現金之資助，以購材料使難民自行修建及補葺。此種現金之支持，不採用公開之方式，其給予條件，主要在於視事實上之困難與需要而定，且以不被挪作別用者為限。

---

[3] 梁中英：〈和煦春風中的品性教育〉，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頁 42。

[4]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5。

（二）基督教的救濟工作

前面提到許多基督教的國際性救援機構，於五十年代都在香港投放了大量資源，救助新來港的居民。由於它們在調景嶺都沒有設立自己的分派中心，得委託當地教會處理救濟品的派發工作，故教會實際上成了賑濟工作的總代理，既掌握所有資源，亦自行編列領濟者清單，決定待救濟的對象。凡是調景嶺有戶籍的居民，均可在教會登記，按月領取麵粉、衣物等救濟品。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最積極參與派發救濟品的是信義會與神召會。

據魏榮憶述，信義會的救濟物資全部來自信義宗世界服務處。每次當有物資到港，該處便會通知教會持單到位於今尖沙嘴東部的九龍倉提取，再以車運載到觀塘，然後雇船入調景嶺。物資包括衣服、麵粉、米、油等。教會在收到物資後，便會按名冊派發，受惠家庭達數百戶之多。至於派發的次數並不固定，大抵一至數月一次。鄭錫安格外照顧一些特別有生活困難的家庭，除了廣泛的救濟外，也按月給他們接濟，所以教會亦長期存有物資，以便自由運用。

林澤在路德會聖約翰小學供讀期間，由於年齡較長，被授予管理路德會貨倉的職責。他指出，幾乎每個在調景嶺的教會都設有貨倉，儲存待派發的救濟物資。經教會派發的物資數量非常龐大，許多人倚賴從教會獲得的供應過活。他又提到，當時最受歡迎的物資是米，但不多見，最多是麵粉、奶粉、芝士、油等。居民將麵粉帶到海邊幾個店舖，換回麵條食用。

鄭錫安亦向挪威信徒推銷認養調景嶺學童的計劃，由他們按月捐助款項，協助信義中學與小學的學生完成課程。這個認養計劃並不限於調景嶺，在市區信義會所辦的天台學校也有實施。

信義會又替教友向信義宗世界服務處申請借款建屋。居民最早期住在 A 字棚屋裡，不久紛紛改建為木屋；越數年，再改建為下半截石牆、上半截木板的房子，最後才建成全石造的房屋。故他們經歷多次的拆建房屋。他們從信義宗世界服務處獲得貸款，然後按月攤還。[5]

雖然基督教的救濟機構並未將救濟品的派發範圍局限在信徒之內，但教會顯然會優先照顧其會友。如同潘文熙(Manfred Berndt)所做有關七十年代以前全港性的教會研究指出，教會負責人一直宣稱他們僅是按居民的實際需要而派發救濟物資，信仰因素並非先決性條件，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從接受訪問的牧者的回應可知，超過八成以上的教會是將超過九成的物資分派給他們的會友或準會友的。[6]換言之，只有成為會友，方是獲得物資的最大保障。不少人為了領取教會物資，乃加入教會，成為所謂「麵粉信徒」。有以下有關的記述：

> 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的十年間，各教會的貢獻就非常大了。第一，他們按月發送救濟品，米、麵粉、奶粉、牙

---

[5] 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

[6] M.H.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STD. dissertation, Concordia Seminary, 1970), xi.

> 膏等種種食品或日用品。當然他們是給他們的教友或準教友。所謂準教友，是指每晚去聽教卻未受洗的人。大家為了生存，為了領救濟品，每人晚飯後都忙著上教堂聽道，聽完道理後，到月底或月初，他們就去領救濟品。每個教會所給的救濟品不同，每個月也不一樣。記得我們還領過長條的乳酪，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以為是肥皂，因為那時的勞工肥皂也是那樣一大條，要切開來用。大家就拿來洗衣服，可是怎樣搓，都不出泡沫，而且還很臭。[7]

戴瑞蘭憶述，信義宗世界服務處對調景嶺各教會的支援甚大，並不限於信義會教會，施同福尤其關心教會的發展。有趟她陪同約翰生到該處的辦事處見施同福，為要申請資助購買手藝工場的縫紉機；誰料施同福硬指戴瑞蘭本人亦有需要，要她為某些事項提出申請，結果她的留產所獲得該處甚多幫助。信義宗世界服務處其後又資助錫安堂在荃灣租賃房子開辦學校和教會。

信義宗世界服務處亦定期補助靈實醫院，每星期供應食物與衣物給醫院病人，藉以補助醫院部分固定支出。據一位在靈實醫院工作三十多年的職工憶述，他差不多每星期都開車到尖沙嘴海旁的政府倉庫，提取米、麵粉、奶粉等食品，數量龐大，有時一貨車都裝不下；間中他也會去九龍倉提取由挪威教會捐贈來的魚肝油。[8]

---

[7] 〈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頁 119~120。

[8] 不願透露名字的信徒訪問，2000 年 5 月 27 日。

香港政府社會局駐營辦公處的副主任朱葆森與兒童組組長（後升副主任）譚文煥都是基督徒，他們對基督教在營內的救濟與福利事業，提供很大的方便。

第二節　手藝工場

教會除派發救濟品外，還設法為人提供謀生出路，幫助難民自力更生。他們為教友外發一些手工，如糊火柴盒、繡花、做首飾盒等，讓其拿回家工作，按件計酬，每月賺取百數十元，以幫補生計。[9]

起初這樣的自力更生計劃只是以代理的形式進行。難民蝸居調景嶺，往返市區交通不便，難以覓得謀生途徑。若要避免外出工作，最簡單的出路是尋找一些外發的手工，拿回營裡去做。方是時，最普遍的輕便手工是糊火柴盒與繡花；所謂繡花，是在襯衫與手帕上用針線繡一些圖案。這些工作都不是難民營中固有的，必須找人到外面的工廠接洽，將未成品運進來分發給願意參與的人，又將完成品運送回工廠；而從事這種分發與運送的人，便賺取工錢的某個比例，以為服務報酬。有教會想到，若由教會以不牟利的方式主持這種批發工作，將可減少居民給人從中剝削的機會。[10]

---

[9] 〈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頁 130。

[10] 范約翰：〈自力更生——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十二〉，《基督教週報》第 448 期（1973 年 3 月 24 日）。

……這時才使教會人士想到，也可以與外界接洽，作不牟利的手工業，為弟兄姊妹服務，於是有教會出少許津貼，請一兩個年青力壯，忠誠可靠的弟兄，每禮拜到城區數次，背包袱回來。……外界對教會非常信任，難胞也知道這裡比較公允，所以這工作非常興旺，領回的常不夠分發。

早期這種代理服務只是為教友而設，但不多久便有人為獲得分派手工而參加教會聚會，教會無法阻止亦不曾阻止，於是逐漸變成半公開的服務。居民所住的油紙棚，地方狹窄，燈光昏暗，不便從事手工業，加上繡花是較為沉悶的作業，長時間單獨工作令人吃不消，教會乃開放地方，讓他們白天在其間集體工作，談談笑笑，甚受居民歡迎。如此便使教會發展成手工作坊。

1960 年時，錫安堂的工藝社的情況如下：[11]

該堂並附設有工藝社，該工藝社，現建有兩層石屋一間，內作為辦公室、收發室、倉庫及陳列室之用。

參加工作人數，現有男女計約八十人，雖以救濟教友為主，但貧苦之難胞亦參加工作，每日一般工作，按件計約可得工資約二元，但熟手精明者所得自然較高。

該社所出產品，係手工性質，如刺繡品及玩具等，此等物件，多富東方色彩者，其銷路方面，以瑞典為主，英、加也有部分，貨品只是用小包郵寄，每包不超過二十二

[11]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0~51。

磅，故數量有限，承購者，亦含有救濟之意，此等出產之規模雖不大，但對難民之貢獻與補助甚大，普通的難民，既不需要房租，有時也可領得若干救濟之米麵，衣著根本不須講究，若得此些微現款之收入，其益處是很大的，特別是初期之難民營，此種手工業，救活了不少苦難的人們。

繡花是精細勞作，從事者眼睛較易勞損，長時間下來，有些居民要配帶眼鏡。有鑑於此，挪威差會捐贈大桶魚肝油給他們，讓他們「補補眼睛」。

及後，更有教會直接開闢工作與銷貨渠道，特別是由傳教士向外國廠商聯絡，承接訂單，又呼籲各地教會信徒購買難民的手工產品，協助難民維生。他們把居民所繡的手帕、枱布、抽紗等產品，用郵包直接寄到海外，所得利潤自然較多層中間剝削為高。所以，多數教會陸續都辦有手藝工場。

路德會手工部(The Hong Kong Lutheran Handicrafts Society)由西門英才與包美達創立，她們提供地方給居民做手工藝品，並將產品售與遊客或寄運美國，幫助他們賺取生活費，藉此將福音傳給他們。在包美達的積極經營下，手工部由調景嶺擴展到港九新界甚至澳門等地，路德會每個堂會的教友都可透過教會領取外發手工，完成後交回。手工產品多樣化，包括串珠花、刺繡、國畫、玩偶、竹片雕刻與串珠拖鞋等。貨品委託美國各州路德會的婦女部代行推銷，不過，由於市場吸納能力有限，教會只能實施配給制度，讓每個人能賺到起碼的生活費資，希望獲發更多工作的人往往無法如願。

直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路德會手工部仍然存在，不過由於本地從事手工藝製作的人已不多，只能靠從大陸購入手工藝品，轉售給外國人，所得利潤幫助有需要的機構與個人。[12]

據 1960 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基於地理環境及其他種種條件所限，調景嶺營甚難建立直接生產的事業，能夠奠立基礎的只有教會開辦的手工業工場，所以，是項教會的福利事業也可說是調景嶺的重要經濟命脈：[13]

> 該營成立迄今十年，在難民營中，難得有一種直接生產之事業，從創立而至於壯大，多半是時興時輟，這一方面限於地理環境，在土地上不足有耕種之場；一般零星之手工業又限於銷售市場；從商行取來之手工品，更要受一層中間之剝削，而且受交通之阻礙；至於能獲得較理想之成就者只是各教會所經辦之福利機構，他們能直接向國外銷售，如錫安堂，信義會之繡花及手工產品銷至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各國，路德會之產品，銷至美國等。

還得一提的是基督教會在營裡開辦的學校、醫務機構與福利單位，都雇用了不少營中居民，他們大多是教徒。由於有固定收入，加上住房、兒女教育等方面都有基本的供應，故生活較為安定。

---

[12] 陳煜新等編：《香港路德會金禧慶典紀念特刊(1949~1999)》，頁 150。

[13]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98。

調景嶺最初的主要對外交通為通往香港西灣河的渡輪。1955 年年底，因鑑靈實醫院的需要，教會聯同村民組織共同開闢通往市區的馬路，以便通行汽車，1956 年 9 月完成，稱為寶琳路，與安達臣路及清水灣道連接，費用由基督教世界服務處全數負擔，開路工人皆從調景嶺居民中聘請。[14]自此便有私人小巴士行駛；後來當有公共汽車行駛，道路才由政府負責修建。

第三節　調景嶺學生輔助社

1957 年，英國退伍軍人戴大衛與新婚妻子信義會的那教士來港，追隨她在調景嶺工作，他先在靈實醫院任事務助理，後因言語不通，辭去醫院職務，改在基督教男青年會任助理祕書。但是，他對難民的需要深具負擔，於是又折返調景嶺，教難民讀英文。調景嶺往返市區交通不便，他索性蓋搭木屋，與居民一起作息。不久，他收容兩名無家可歸的兒童在家中，其後收容人數不斷增加，一年後增至十二人，生活非常清苦。

戴大衛決心幫助這群為數眾多的難童，向別人借了一點錢，連同母親寄給他的五英鎊，要蓋搭能容納六十個兒童的房子。及後得到一些傳教士及朋友的幫助，聯同英國基督教協進會(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的支持，得以建成房子，添置簡單家具；隨後又有包括荷蘭改革宗教會(Dutch

---

[14] Gene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172.

Reformed Churches of Netherlands)在內的兩個荷蘭宗派幫助，興建三間平房作為宿舍，九龍扶輪會也捐款興建一個飯堂。這樣，第一所兒童院舍便於 1960 年建成，名為調景嶺馬可紀念之家(Mark Memorial Hostel)，收容七歲以上的兒童，為他們提供膳宿、教育等基本需求，至十八歲為止；他們大多來自貧困及破碎家庭，如父母離異等，由社會福利署及其他志願團體轉介。[15]這所院舍於 1993 年遷至將軍澳。

為了使工作長期開展，乃組織調景嶺學生輔助社(Rennie's Mill Student Aid Project)，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服務。董事會的成員，包括英國、中國及荷蘭等國籍的基督徒。經費方面，部分來自私人捐助，部分得自本地及海外教會援助。及後，他們的工作擴展到其他地區，並易名香港學生輔助會，先後建立荷蘭宿舍(Holland Hostel)、石壁宿舍(Island Hostel)、東灣學校等。[16]

戴大衛在早期聘請一位畢業自信義會神學院的華人古天貴為該會傳道。信義會的陳國英亦每星期六下午到馬可紀念之家，為住院兒童教授主日學。

戴大衛夫婦後來遷居菲律賓，在當地同樣主持孤兒院服務。

---

[15] Nancy Hsu: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Get a Chance," ***Sunday Post-Herald*** (Sept. 29, 1968)。資料來自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70〉。

[16] 高潔：〈調景嶺學生輔助社〉，《基督教週報》第 533 期（1974 年 11 月 10 日），第 3 版。另參〈http://www.hksas.org.hk/index2.htm〉，2000 年 2 月 11 日。

第四節　基督教在調景嶺救濟事業的分析

（一）滿足基本的需求

基督教會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救濟工作，從派發食物衣服、移民補助、貸款建屋，到開辦手工藝工場，再及下面即將談到的辦學與診所等。明顯地，這些救濟都是針對居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survival-based needs)及生理需求(biological needs)而作的，即衣、食、住與最原始的非技術、勞力性的謀生方法，為他們解厄紓困。[17]推動他們從事救濟的動因，乃在於他們看到現實裡的具體需要、匱乏和不足，必須藉救濟來加以補足，而非救濟或福利工作本身便具自足意義。從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角度觀之，它們的層次並不高，沒有擺脫傳統宗教福利的慈惠工作的地步，針對的主要是個人，最多及於家庭，而與社區的關係不大；既

---

[17] 相對於生存需求的福利，乃是針對所謂安全需求(security-based needs)的福利。論者指出：「基本上，生存需求以及安全需求的概念各有不同的預設。其中生存需求的滿足係指提供像是濟貧、醫療等等生存權益的基本保障，至於，其背後預設包括有強調包括（筆者按：原文如此）個體或社區缺愛的道德解組、道德責任、以及以紓困救助為主的殘餘式的福利模式。換言之，生存需求的滿足比較是偏重在個人福音方面。至於，安全需求的維護主要是對弱勢團體權益或社會不公義的維護與批判。其背後的預設包括有強調社會解組、國家責任以及以社會群體的整合作為準則。明顯地，安全需求的維護主要是以社會改革的社會福音作為其思考的主軸，同時它也是一種積極性的社會意識。連帶地，相較於上述道德性的說詞，有關安全需求維護的訴求顯然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去道德化。」王順民：《宗教福利》（台北：亞太圖書，1999），頁 65，註 1。（筆者刪去引文所有英譯。）

上整全的人格發展（心理需求）或社區塑造(community-building，社會需求)，更與人權、公義及制度改革等社會意識沾不上邊。

這樣的情況是正常不過亦無從詬病的。在五十年代初期，無論是難民自己抑或香港政府，都沒有把調景嶺看成為長期的、待建設的社區，它僅是臨時的難民營，居民盼望的是及早移民到台灣或美國，又或者在經濟條件改善後遷到市區。難民意識籠罩著施濟者與受濟者雙方，這是為甚麼在 1952 年以前，所有教會包括財力較豐厚的宗派都僅是以葵棚蓋造，因陋就簡，而協助居民移居他國亦成為教會救濟的事工之一。福利工作的旨趣是難民救濟，而非一般意義的社會救濟，救濟的對象便必然集中在個人和家庭，而與社區建設無關了。傳教士所關心的是在調景嶺的難民，而非他們所在的社區。在五十年代，首先致力推動社區建設，欲使難民營變成安居之所的，大概便是台灣當局和救總吧；它們投放相當資源於社區的基礎建設上，協助居民成立各樣的聯誼及公益組織，又動員民眾堅決反對香港政府壓縮社區的措施，藉以把調景嶺營建成反共基地。

當時期調景嶺居民的生活處境惡劣，連基本的生存需求亦無法滿足；而與生存需求有關的需要又如斯龐大（難民問題不僅存在於調景嶺，也困擾著整個香港），光是基本生活開銷亦難以遽然充分供應。如前引的數字，在五十年代，每年僅是派發食物便得接受海外二萬多噸的糧食捐助。差會及傳

教士以其有限的資源，根本無暇無力從事更為長遠與所謂「積極性」「發展性」的福利工作。

傳教士並非社會改革者，他們沒有任何先存的社會意識，無意在難民身上將某個社會意識付諸實踐，進行政治或社會的體制規劃。傳教士卻是首先認同這群對象(target population)，立志全力服侍他們，並在理解他們的即時需要後，擬訂服侍的範圍和性質；如此，所有工作都是即時與應景的，不需規劃，亦毋須複雜的社會理念以為支持。這是所謂緊急情境(spontaneous situations)的救援。[18]可以相信，當戴瑞蘭將她個人的生活費換成藥品，帶著藥袋在難民中間施藥時，她心中並無社區健康的理念；而當顧永榮用一元美金買些木板在摩星嶺湊合出難童學校的第一個班時，他亦沒有甚麼教育理念與宏圖。所有福利與救濟工作都是不用解釋的，眼前的需要便已充分說明一切，這是名副其實由受助者主導的「表達的需要」(expressed need)，而非助人者的「診斷的需要」(diagnosis need)。

---

[18] 「『緊急情境』中的助人行為，指的是在一個單一的事件中，一個人對於另外一個陌生人立即性的救助。『非緊急情境』中的助人行為指的則是在一個較長的情境中所發生的助人行為，在其中行動者主動尋找著助人的機會，有著較多的關於行動的計畫，並且和受助者有著相當的互動，而其行為也持續的較久。」丁仁傑：《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 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99)，頁 2，註 1。

（二）傳教士的關懷與想法

當然，傳教士在最初沒有餘暇開展非緊急情境的救助，不等於日後亦不可能發展這方面的服務。我們看到，他們在調景嶺的救濟工作一直沒有突破基本需求的層次，甚至在日後當這類型的服務不再有迫切需要後，他們也不曾考慮轉變救助的方向；這便與客觀形勢不允許沒有太直接的關係，而該關聯到傳教士主觀的意願了。[19]

確實地，差會與傳教士較為保守的神學立場，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視野與事工規模。在解放前後被迫離開中國、卻又因戀棧華人福音使命而滯留香港、轉而投身於難民事工的，幾乎都是志切於狹義的傳教工作的基要派傳教士。就以調景嶺為例，在此開展事工的全是神學立場保守的差會與傳教士。宣道會、路德會與神召會的神學立場毋須贅言，即使是挪威信義差會，其神學立場亦較多數的信義宗差會為保守。開創調景嶺事工的傳教士，原來都是在中國內陸較貧困地區，而非沿海大城市工作，所從事的主要是直接傳教，而非在大型的服務機構充當專業傳教士；他們缺乏政治

---

[19] 若與六十年代以後比較，此階段教會所承辦的社會救濟與服務工作，基本上是頗為自主的，因為經費來源主要是海外，政府投放的資源不多，如此政府也不會在政策與服務形式上對教會機構作太多干預。這與六十年代以後，國際救援機構減少對香港的津助，教會的福利事業被迫仰賴政府的撥款支持，形成教會得依從政府的政策辦事，甚為不同。林澤說：「……打從六十年代後期，教會的角色，已由主動變為被動，成為政府實施社會服務的『承辦商』。」林澤：〈從九七角度看地區政治與社會服務〉，收吳水麗等編：《鏞射香港》（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1987），頁 66。

性與社會性的議程（即使民族感情濃烈的耀漢小兄弟會亦不例外），把傳福音救靈魂視為最重要與最終極的任務，而視救濟與服務為傳教的手段，或最多是支援性的事工。如此，調景嶺基督教會的救濟工作多數僅是停留在生存需求的層次。

對傳教士而言，心理需求與社會需求，並非由救濟事工本身提供，乃是藉傳教事工來加以滿足。他們之所以不願意成為全職的社會工作者，乃是在於他們不相信社會工作本身能夠滿足全人的需要。換言之，他們所從事的社會工作若有局限，正是由於他們認為社會工作的職能本身便存在局限。

除非論者自己持有與五十年代調景嶺的傳教士不同的神學與社會構想，否則當不能說傳教士的救濟視野與實踐存在任何本體上或價值上的錯誤；[20]他們既無意藉福利工作建設社區，實踐政治與社會的某些企圖，那他們最終沒有建設社區，就不能算是目標無法實現的失誤，只能說是求仁得仁。

---

[20] 事實上，任何批評基督教的社會救濟工作「治標不治本」、過於消極而不夠積極……並且將「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革」視作兩階段式進程的人，背後都賦含與被批評者不同的神學與社會理念。但是，他們卻常常有意無意地讓人有個錯覺，以為不同性質的福利本身存在著顯明的、可資比較優劣的價值系數，諸如救助窮人的價值及不上改革導致貧窮的社會制度。參如郭乃弘編：《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 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諸文。

（三）救濟工作的局限性

不過，我們卻可以較為公允地指出，基於他們的救濟事業的目標僅是集中在生存需求的層次，一旦受助者的生存需求不再成為主要困擾，那他們所提供的福利便難以繼續受重視，他們的社會角色亦相應被貶抑(trivialized)與邊緣化(marginalized)了。在五十年代初期，從事有關生存需求的救濟的傳教士，成了許多受助者的活命恩人，教會亦成了社區的核心；但在六十年代以後，問津這方面服務的便寥若晨星了。

要是傳教士欲以救濟作為傳教的手段，那救濟的被貶抑自然亦代表著傳教果效的下降。

雖然有不少專業性的基督教救援組織（如普世教會難民服務處、世界信義宗聯會、基督教世界服務處、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為救助調景嶺居民而提供大量資源，這些組織都純粹是社會福利團體，沒有傳教企圖。但是，它們都沒有派遣專業的工作人員在調景嶺提供服務，從事直接救濟的仍主要是在調景嶺工作的傳教士，他們的身分是教會社會工作者(church social workers)而非基督教社會工作者(Christian social workers)，如此造成調景嶺的基督教救濟具有強烈的教會性，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性質並不顯著。（事實上，連最需要專業資格的醫療工作，最初也是由專業性較次的護士而非醫生來主導推行，更顯示出調景嶺的福利事業非專業的性質。）

再者，由於傳教士連專職的教會社會工作者也不是，他們更同時（要非主要）為傳教者，故救濟很難不與傳教牽連一起。事實上，不少傳教士及華人牧者確實是利用救濟作為吸引人加入教會的餌，又或者將救濟資源較多分配給加入自己教會的信徒。即使我們不能說所有傳教士都立心以救濟作為傳教手段，但總的而言，救濟產生促進傳教的效果；在不少居民心中，入教亦是獲得救濟或獲得優先救濟的條件，教會於是擠滿大量吃教者。這在短時間內為傳教事業帶來好處（特別是在信徒人數的「業績」方面），卻在長時期為教會的發展種下許多禍根。

第五章
教會學校與其他教育事業

在五十年代，香港政府並無全面承擔教育的責任，除了寥寥無幾的官立學校外，教育服務乃由傳教組織、社團及個別人士主辦，政府僅對其中少數有歷史傳統的學校提供部分經費補助，這些學校稱為補助學校。由於補助金額有限，即使官立學校亦得收費。不過華人一般注重子女教育，加上政府又有十四歲以下不得工作的規定（當然非法童工一直是嚴重問題），故對教育的實際需求殷切。人口猛增，年齡結構年輕化；政府面對的首要課題，是為這些數量龐大的適齡學童提供足夠的小學學額。在六十年代以後，問題的重心轉至中學程度。[1]

政府沒有為調景嶺居民提供教育服務，不過，由於得到台灣方面及宗教團體的特殊照顧，調景嶺的教育事業至為發

---

[1]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67~168.

達。五十年代中期，在為數才兩、三萬人的社區裡，竟有各級中小學校十餘間，包括中學四間（鳴遠中學、信義中學、調景嶺營中學、逸仙中學），獨立小學四間（即不計附設在中學的；聖約翰小學、德風小學、宣道小學、觀音小學），獨立幼稚園一間（不計附設在中、小學的；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幼稚園）。此外，私立大專文化書院還曾在營內開設分校。從人口比例上說，調景嶺的學校數目應屬全港最前列。各級學校都是由社團與宗教團體開設的，其中絕大多數是基督教學校。

因著調景嶺的學校數目甚多，特別在六十年代社區人口減少以後，雖有不少學校關門，但整體學額仍是供過於求。鑑此，學校得以免費學額等福利招徠，招收營外學生，否則難以維持下去。在香港社會整體的教育資源仍是不足的當時，調景嶺卻出現資源過剩的情況，不能不說是個異數。

第一節　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的補助

在談及調景嶺的教會學校以前，我們得先介紹曾大力贊助當地教育事業的機構：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Committee to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1951 年，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成立，這是美國半官方的機構，會長為美籍前傳教士、時任美國參議員的周以

德(Walter Henry Judd)，[2]駐遠東代表為美籍前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Ashmore Fitch)。

費吳生在江蘇蘇州出生，父親為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他在 1909 年於美國大學畢業後，回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擔任幹事職，曾接濟當時爭取脫離日本統治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1937 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行動，他任南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拍了不少照片與紀錄片，對日軍的殘暴行為留下歷史見證。[3]回美以後，他到處奔走，呼籲援助中國。1946 年國際法庭在東京審訊日本戰犯時，他為檢察組證人之一。

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成立的目的，乃向從中國大陸逃至香港、無法覓得工作、生活無著落的知識分子提供援助，藉以為「自由中國」與「自由世界」保存人才。協會在香港設有辦事處，為知識分子進行登記。當時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凡曾接受兩年或以上大專教育的人。直到 1952 年 9 月，共有二萬八千名難民知識分子登記。

協會最初的計劃，是盡可能安排滯港的知識分子到台灣定居。協會在台北近郊興建新村，安置新來人士，又為他們尋找工作，及給予財政上的補助。協會又提供經費，援助在

---

[2] 周以德為醫療傳教士，於 1925 年為公理會派來中國，在福州公理會的醫院擔任醫生。1932 年曾返美進修，1934 年復來，在山西汾陽教會醫院工作。1938 年，日軍佔領山西後回國。1942 年當選眾議員。他屬於美國國會院外援華集團(China Lobby)的成員。

[3] 陳東屏匯編：《南京大屠殺——英美人士的目擊報導》(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 57。

大陸各大學肄業而未畢業的學生到台灣升學；做法是在香港報章刊登接受申請啟事，申請人經審查合格即能赴台。首批受助者於 1953 年 10 月抵達台灣，由政府安置就學或就業，共有二、三百人獲得援助，其中包括好些來自調景嶺的居民。[4] 直到計劃中止，一共有一萬三千五百名知識分子藉協會幫助移居台灣。

1956 年後，美國政府通過「難民救濟計劃」(Refugee Relief Program)，接受那些欲前往美國的中國難民申請，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設立難民救濟部負責執行是項計劃；[5]因此，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停止安排滯港難民遷居台灣，轉而協助他們申請移民美國，並提供交通經費，共有約二千三百人受惠。

協會支持文教與慈惠事業，錢穆等成立的新亞書院是其中一個受助者，有調景嶺的居民前往新亞書院就讀，入住九龍界限街的孟氏宿舍（現中山圖書館），亦獲協會補助。此外，協會又無條件給予在港的難民中，凡曾在大學肄業或任職教師者，每人每月三十元津貼。

從 1952 年起，協會為在調景嶺各學校任教而在該會登記的教職員提供每月補助，先是六十五元，後增至八十元，受助的包括在信義中學、鳴遠中學與調景嶺中學任教的教師，

---

[4] 費吳生著有回憶錄：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Privately Printed, Taipei, 1967)。

[5] 有關是項計劃的情況，參關士光：《七十年來家國：一個老香港的回顧》(Toronto：York University，1999)，頁 87~88。作者當時受雇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翻譯員，專責協助有關申請。

但不補助學校的辦公費與經常費。自此各學校才有能力為教師發薪，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除了來自台灣有關方面及辦學團體（如差會）的津貼外，早期各級學校的教師薪酬均來自協會。

1965 年，協會在美國紐約的辦事處宣告關閉，計劃結束。[6]

第二節　信義中學

信義會所辦的香港難童義務學校最初設在摩星嶺，後隨難民一同遷往調景嶺，顧永榮親自率領師生開闢荒地，將山坡夷為平台，以葵葉蓋搭教堂和校舍四座，這是調景嶺第一所學校。為了使學校能維持下去，他四出籌募經費，在教會與社會人士的捐助下，學校終於站穩陣腳。1951 年，增設中學部，並在 1952 年 9 月 1 日易名信義中學，學生增至近二百人。

1952 年 9 月 1 日，顧永榮因政治考慮，將校長職讓給張世傑，自任董事長。[7]是年學校向僑務委員會申請立案，課程完全跟隨台灣制度，課本由台灣直接運來，後來轉由集成書局（台灣正中書局分店）送來，這也是調景嶺其他學校的情況。

---

[6]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384~397.

[7] 事緣調景嶺難民親國民政府氣氛濃厚，認為學校必須掛青天白日旗，顧永榮擔心此舉會危害他在國內的信徒，故辭校長職。〈張世傑先生訪談錄〉，頁 71。另參〈本校簡史〉，《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98~99 年校刊》（香港：該校，1999），缺頁碼。

1953 年，張世傑遷台，校長轉由周繼殷接任。1956 年，顧永榮退休回國，鄭錫安接任董事長；同年周繼殷離職，鄭錫安兼任校長。由於學校已增辦高中，故再呈僑務委員會，以完全中學立案。

學校經費最初全數由挪威差會匯給，教師待遇甚低，每月僅二、三十元。「救總」透過「救委會」給予補助經費，每月三千元。

1954 年，學校由最初的葵棚改建成木屋。1957 年，在三區半山興建中學部新校舍，為七間石構教室，翌年落成，自此中、小學部分開辦理。1960 年，信義中學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共有學生 1,300 人。

顧永榮在回國後，繼續為學校籌募經費，1961 年，即國際難民年，獲挪威救濟難民協會捐贈二十萬元，作為擴建校舍之用。為紀念已故挪威王后慕德(Queen Maud)，學校於 1961 年 12 月易名為慕德中學。

為了照顧學生畢業後的出路，1960 年，學校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兩年後獲得批准，於是學校同時獲香港與台灣兩地政府承認，這也是調景嶺首間獲香港政府承認的學校。學生可參加香港中文中學會考。[8]1963 年首屆學生參加會考，及格率為百分之八十三。

---

[8] 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頁 363~364。

學校辦學成績優異，直到 1967 年為止，已有七十餘位畢業生在香港與台灣取得大專學院的學士學位，在兩地的文教、軍警及工商界任職，也有繼續在英、美、澳、日等國深造者。已有一位校友在 1965 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9]

1993 年，學校遷將軍澳，不再辦小學部。

第三節　鳴遠中學

1950 年 9 月，天主堂開辦調景嶺天主堂義務學校，由曹立珊主持，並獲華仁書院科神父協助。校舍僅有葵棚與帆布棚各一座。教師六人，在難民營中聘請，教務主任丁慕南為前吉林省立第三中學校長，其餘皆曾於政大與體專等校肄業；學生一百人，分小一至小六共六班。學生不獨完全免交一切學雜費用，而且還得到書籍、紙張與筆墨的津貼。據學校一位早期教師姜德明憶述：[10]

> 由於經費不足，曹神父在香港找到了十位施主（恩人），每人每月捐助十元港幣，共計每月募來一百元港幣，作為學校日常開支費用。在學校服務的人員，不論校長、老師或工友（當時只有一位工友），全都義務奉獻，並且自帶飯票（難民飯票）。

---

[9] 〈慕德中學簡史〉，頁 3。

[10] 姜德明：〈調景嶺上的傳奇人物——為賀曹立珊神父八秩大壽而作〉，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頁 14。

次年，已有小學第一屆畢業，增設初中。丁慕南於 1952 年在接受《中國學生周報》訪問時記述學校情況如下：[11]

> 學校是卅九年九月十五日創辦的，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辦了六班，分成三個教室上課，教職員六名，學生是一百一十名。第二學期增加了初中一班，新生廿四名（內由高小錄取十六名），分成六個教室，教職員增為十人，小學生是一百八十名。第二學年第一學期，初中增加二年級，學生四十五名，小學生二百廿二名，教室改成八個，教職員十三人。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學生增至三百名。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即本學期）增加初中三年級，學生共三百八十名，中小學課本一半由台灣教育部贈送，一半由學校購買正中書局發行的課本。

在得到史培爾曼樞機捐出美金二千元後，學校興建一間兩層高的木板大樓，上層為聖堂，下層分成四間教室，另開闢球場一個。[12]是年秋季成立校董會，易名為天主堂私立鳴遠學校。1953 年，增辦高中部，並向台灣僑務委員會申請立案。

1954 年，曹立珊赴台，校長職先由范景才神父暫代，繼由來自寧波的沈鼎臣神父接任。[13]1955 年，領到立案證書，並遵令更名為調景嶺鳴遠中學。

---

[11] 焦一夫：〈荒山學府〉，《中國學生周報》1952 年 10 月 24 日。

[12] 《公教報》1951 年 12 月 2 日第 3 版。

[13] 《公教報》1954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1956 年，沈鼎臣赴澳洲，李若石神父為校長。1959 年由雷震東神父主政。

天主教只有一所教堂及學校，在教區主教及其他教內人士的支持下，相對調景嶺其他學校而言，鳴遠中學的經費充裕，學校規模和設備較佳，課室、男女生宿舍、學生飯堂、理化實驗室、球場等相繼添置。學生均獲發給白襯衣藍長褲為校服，這也是在各校中首創的。嗣後，學生每季均獲發給制服一套。

1960 年，鳴遠中學有教職員四十九人，共開幼稚園兩班，小學十五班、中學九班，學生 1,527 人。

1965 年，石造新校舍落成，學校始得香港政府批准註冊，學生可參加香港中文中學會考。

第四節　調景嶺中學

調景嶺中學並非教會學校，但初期亦與基督教事工有若干關連，故附記於此。

1950 年 9 月，經香港政府社會局核准，開辦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兒童學校，經費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撥出，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及其他社會團體亦予贊助。校舍乃使用「救委會」所建的六間木屋，課程由幼稚園至小學，延聘營內合資

格的難民擔任教師，最初僅是義務性質。校長由社會局駐營辦公處副主任譚文煥兼任，她也是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的董事。[14]

> 社會局兒童組主任原來也是兒童福利會董事，她兼營中學校長，那是由高小辦起，社會局在大坪蓋了幾棟比較大一點的木屋作為教室，救委會為兒童捐送一些文具簿冊，台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又免費供應圖書，有一部分志願的難胞擔任義務教員，只照義務工作人員待遇，多加一餐午飯，並無薪給。

1952 年，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每月為學校提供補助費三百元，除其中部分撥作教職員零用費下，餘作辦公費。1953 年，由於高小畢業生升學困難，增設中學部，易名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中學，學生增至三百餘。天主教與信義會的學校首先得到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的津貼，在約翰生教士代為申請後，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中學亦得協會的補助，學校自始給教師薪酬。1955 年，再易名為調景嶺中學，由救總接辦，按月匯撥經費，成立董事會，向台灣教育部立案，與香港政府無涉。

1959 年，有學生超過六百人，教職員廿八人。

1966 年，學校始向香港政府辦理註冊，並依據教育署課程規劃教學，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會考，但畢業生到台灣升學者仍佔多數。1993 年，香港政府清拆調景嶺，調景嶺中學亦

---

[14] 范約翰：〈數說神的恩典——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七〉，《基督教週報》第 361 期（1971 年 7 月 25 日）。

在清拆之列，學校停辦。翌年政府批准並撥地興建景嶺書院，成為津貼中學，作為原校的延續。

第五節　聖約翰小學

1951 年 9 月 1 日，路德會開辦調景嶺協同小學，初期僅為識字班，只有一班，由華籍傳道兼教，附設在教堂內。1956 年正式開辦小學，改稱聖約翰小學。

楊植潤在 1956 年任教，他剛從聖經學院畢業，曾任訓導主任與教導主任，兩年後離職。據他憶述，當時校長為李明，[15]另有教師數人。學校共有六個班，學生約二百人。路德會完全負責學校經費，包括教師的薪資；學生免繳學費，課本由台灣免費供應，故家長僅需負責習作簿與鉛筆等支出。學生不少來自外區，有低至二、三年級者。[16]

1958 年，學校向僑務委員會申請備案。

學校為完全小學，1960 年，有學生約 210 人。

第六節　宣道小學

宣道會在二區山坡上辦有宣道小學，於 1956 年由王澤生創辦，他兼為校長；翌年王力耘受聘為教會傳道後，兼訓導主任，學生約五、六十人。由於西差會未能提供財政上的支

---

[15] 李明後來負責路德會手工部。

[16] 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

持，僅由王澤生負責籌募，故規模與設備都受限制。學校的宗旨較專注於傳教方面，教育理想不高。

學校為完全小學，有課室七間，運動場一個，1960 年有學生約 180 人。

1963 年，學校有如下的資料：[17]

本學期專任教員七位，課任及協助教師五位，小學部之一至六年級學生有二百五十人，幼稚園高低班計一百人，每日皆有朝會得向全體學生傳福音，其學費收入實況，（約為一萬二千餘元）。

是年由於經費支絀，學校停辦。

第七節　教會教育事業概述

除上述較具規模的中、小學校外，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在五十年代末期辦有一所幼稚園，學生約有八十人；路德會亦辦有橄欖山託兒所。

前面提到，宣道會開辦啟明瞽目學校，照顧教會三十多位盲人男女，課程為期四年。但四年後，台灣全盤接收調景嶺營的傷殘退伍軍人，這批學生大都應召入台，學校結束。[18]

---

[17] 《基督教香港區聯會同工退修會手冊》（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20 日），頁 37~38。

[18] 王澤生：〈本堂二十週年的回顧與前瞻〉，《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香港：該堂，1970），頁 8。

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團體，如佛教及其他宗教，亦有辦學，開設了德風小學（1950 年）與觀音小學（1959 年），但規模遠不如基督教學校。

有人這樣總括調景嶺的教育事業：[19]

> 當時調景嶺被人形容為「文化城」；因為調景嶺面積，縱橫不到三公里，全盛時期，居然辦有五間中學，九間小學和三間幼稚園，是香港任何地方也沒有的。多年來，從港九來就讀人數的總和，不會少於十五萬人；無形中替香港政府在教育上，減輕了一個很大的包袱。

這裡所說的全盛時期，該是五十年代中期。據統計，在 1958 年時，各調景嶺的教會學校共招收了三千學生之鉅。[20]不過，五十年代末期以後，汰弱留強，剩下中學三間、小學三間，即調景嶺中學、信義中學、鳴遠中學、宣道小學、聖約翰小學與觀音小學。[21]在這八所學校裡，只有調景嶺中學與較後期開辦的觀音小學並非基督教學校，可見基督教學校在芸芸眾學校中，最受坊眾所歡迎，最能維持下去。

---

[19] 〈調景嶺滄桑四十載〉，收 Norman Lau 編：《調景嶺之歲月(1950~1993)》（香港：私人出版，1993），頁 1。

[20]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172.

[21]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頁 7。但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卻仍載有廣東逸仙中學、德風小學等校，見該書頁 86~87。

調景嶺幾間中學都設有宿舍。由於各級學校讀書都不用付學費，港九新界家境較差的子弟，有不少前來寄宿就學者。[22]

林澤在 1957 年左右入讀路德會聖約翰小學，曾受教於楊植潤。他在 1949 年隨父親來香港，先在外頭充當童工，後來在親友介紹下，得知調景嶺有免費教育，並可獲得救濟品，衣食無缺，遂遷居這裡，寄住於親友家中。他的年齡較長，插班入讀五年級。他指出，若非調景嶺提供免費的教育，他將很難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據他憶述，學校當時約有一、二百個學生，頗有規模，學校管束不嚴，故學生生活甚為自由愉快。學校強制所有學生參加學道班，然後受洗。小學畢業後，李偉韜為他在路德會大坑東協同中學預備學位，他自此離開調景嶺。[23]

六十年代以後，外來寄宿生的比例逐漸增加，在數目上壓倒了調景嶺的原居民，[24]這也加深了下面提到的學校與社區

---

[22] 〈陳寶善先生訪談錄〉，頁 167；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頁 6。類似的例子參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頁 38~40，123~124。

[23] 林澤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24] 在六十年代，調景嶺學校所收的學生有三分之二是外來的。〈調景嶺居民四十餘年血淚滄桑史〉（其四），原文曾刊於《快報》1992 年 6 月 11 日，這裡參考的是調景嶺居民自編的歷史資料集，缺作者、篇名、出版日期等，蒙陳國英女士借閱。

及教會脫節的情況。據林澤說，在他唸書的五十年代末期，學生中大多是廣東人，但教師全數是外省人，以湖南人為最多，次為河南人。

調景嶺中小學課程都是按照台灣教育部的規定，為往台灣升學而作準備。當時期，到台灣升學的條件優厚，國立大學學費全免，生活費由救總供給，並發免費船票，連零用錢亦有供應，故吸引很多中學畢業生投考，每年約有三至五人成行；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餘為成功大學等。這些優惠僑生的費用大都來自美國，特別是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

五十年代末期後，難民生活略有改善，一些教會學校如鳴遠中學開始收費，以 1960 年為例，高中學費十元，初中八元，小學和幼稚園五元。[25]但調景嶺中學因有台灣救總的全力支援，自始至終都是免費的。

前面提到，在五十年代及以前，香港政府都實施貿易站的社會政策，一方面並不自覺有責任為所有居民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與社會保障設施；另方面亦沒有為這些社會建設制訂長期政策，故任由民間團體自行籌措開辦。不少教會學校（特別是中文學校）向香港政府登記立案後，只須遵守有限的教育條例，它們仍可自行向中國（1949 年以前）或台灣（1949 年後）立案，並自由採用兩地的課程課本。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為基督教在調景嶺的辦學提供廣闊的空間。五十

---

[25] 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頁 368。

年代以後，社會政策逐漸轉變，各有關政府部門相繼成立，政策與條例得以制訂，[26]教會辦學的模式亦得相應變化，包括向香港政府立案，與香港教育署的課程編排看齊等。政府的教育資源增加，加上規定較前嚴格，一些資源不足的教會學校遂失去生存空間，被迫結束，宣道會與路德會在調景嶺的小學皆面臨這樣的命運。

自始至終，調景嶺的學校維持強烈的地方特色，諸如民族主義教育濃厚、政治傾向鮮明，及採用國語授課等。三所中學採用今日所謂「一條龍」的升學制度，即學校提供從幼稚園直升到高中畢業的教育，學生毋須轉校，不用參加公開淘汰試，這不是大多數市區學校所能做到的，如此亦減少學生因參與公開試而承受的讀書壓力。（學生程度因此較遜，也是難以避免的後果。[27]）雖然六十年代以後，已有學生選擇在香港升讀大學，但每年赴台升學的人數仍是不少，包括由學校保送與自己投考的，他們仍享有各方面的補貼優惠。

傳教士最初在調景嶺開辦教育事業，純粹是出於滿足難民當前迫切的教育需要。雖說他們也關懷學校的福音事工，積極在教學之餘向學生傳福音，但卻未有整體地籌劃教會與教會學校間的相互配搭；加上所聘請的華人校長與教師，絕

---

[26] 這方面的轉變，參 Catherine Jones, ***Promoting Prosperity: The Hong Kong Way of Social Policy***, chap. 6。

[27] 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盧龍光亦因鑑調景嶺的教育程度稍遜，於完成小學一年級課程後，轉到深水埗崇真小學重讀一年級。盧龍光博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8 日。

大多數都是非信徒或信仰真誠程度有限者，故教會學校的信仰精神更形淡薄，與教會的關係亦更稀疏。一旦早期的傳教士離去，當地教會換上華人傳道以後，學校的負責同工便不很賣教會的賬。學校除接納教會傳道人開設宗教課外，校園裡的傳福音活動不多，學生信教的比例甚低，藉學校將年輕信徒轉介給教會的個案更寥寥無幾。六十年代中期後，信義會慕德中學的學生即有信主的，多數參加錫安堂而非信義會的聚會。若說教會學校開辦的其中一個目標、或教會學校的其中一個弊端，是半強制學生加入教會，[28]這樣的功能與弊端在調景嶺皆不顯著。

至若傳教與教育難以兼全，教會學校與教會脫節的情況或遲或早總會出現，則這樣的情況在調景嶺便最為明顯，也很早便出現了。

[28] 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1.

第六章
醫療及其他服務

第一節　基督教醫務所

前面提過，早自摩星嶺時期便參與難民工作的傳教士戴瑞蘭，因見難民有醫藥的需要，一開始便自資贈醫施藥。1950 年 6 月她隨難民遷入調景嶺後，社會局撥出一座葵棚，讓她為難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並提供煤油汽燈、竹椅數張，建立醫務所。戴瑞蘭是香港政府註冊的助產士，為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又為產婦接生。

當時期，有幾位難民信徒義務協助醫務所工作。原職軍醫的楊寶山，時為宣道會的慕道友，尚未受洗，在宣道會傳教士的推薦下，獲社會局准許在營裡充任義務醫生（他沒有在港行醫的執照），他曾當護士的妹妹亦加入協助。

戴瑞蘭與宣道會都沒有足夠經費維持診所服務，幸得信義會每月資助港幣 175 元。這樣從一開始，醫療服務便是由不同宗派共同支持的，這是為何診所在日後稱為調景嶺基督

教聯合醫務所(Rennie's Mill Church Clinic)。不過，當地居民依據診所位置，多稱之為大坪診所。

調景嶺較正規的難民醫護服務，乃由東華醫院承辦。該院每天派出一位西醫，乘坐電船到營贈醫施藥。當時營中並無適合場所，故醫生只能在電船裡以有限空間為難民診症。往返交通費時，每天診症的時間只有兩、三小時，難以滿足全營的需要；加上營內衛生環境惡劣，居民又營養不良，健康狀況不佳，以致對醫藥的需求很大。[1]

1950 年 7 月，即在遷入營地不久，調景嶺發生二千多人集體中毒事件，患者上吐下瀉，有些情況頗為嚴重；曾有謠傳中共派員入營下毒，戴瑞蘭則相信這僅是食物中毒。當時她手頭上並無任何醫治這種病症的藥物，只有霍亂藥；於是西門英才便為病人祈禱，而她則以霍亂藥治食物中毒症，結果奇妙地沒有人因此死亡。她高明的醫術因而廣被稱譽，許多人喚她作「戴醫生」。

在集體中毒事件發生後，政府派出西營盤醫院的黎柱樑醫生前來診症，黎柱樑自此定期到調景嶺為病人服務。不過，他每星期才來營一次，根本應付不了上萬居民的需要，故在正規醫療服務之餘，調景嶺還是得有自己的「赤腳」醫務所，

[1] 范約翰：〈來到曠野——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六〉，《基督教週報》第 348 期（1971 年 4 月 25 日）。

戴瑞蘭仍得繼續為病人提供診治，而楊寶山亦獲准在營內充當義務的無牌醫生。[2]

1950 年 12 月出刊的《營報》，曾對建營初期數月的醫護工作有如下記述，不過沒有提到戴瑞蘭這個關鍵人物的名字：[3]

> 為了保持這七千多難民的健康，醫藥問題的解決，確是最迫切的需要，所以在搬到這兒的一週後，七月三日就成立了調景嶺營醫務所，當時是由楊醫師寶山負責，大部分藥品都是由教會捐贈的。楊醫師也是本營難胞之一，他深諳醫術，善理內外各科，他本著仁者愛人的精神，自動的常為大家服務，在營中他建立了醫務所的雛型。主管當局有鑑於斯，於七月六日特派黎醫師柱樑來營主持所務，至此藥品始由他按實際之需要，報請港府按期撥發，黎醫師不但是醫術精良，經驗豐富，而且和藹可親，本營居民受其惠而獲得健康者恐已不少。若說到醫務所的組織非常簡單，除掉黎楊二醫師經常負責內外科的診斷外，僅有潘啟智、王真民、鮑長源、范萍、吳相林、汪保羅六位同志，分擔著司藥、看護及助理等工作。

---

[2]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的醫療服務奇缺，故不惟是在難民營內，即使是在市區，政府對於無牌診所的態度亦是「隻眼開、隻眼閉」。參葉錫恩：《葉錫恩自傳》，頁 113。

[3] 立生：〈醫務所的概述〉，《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0。

數月後，楊寶山獲准移居美國，義務醫師職由女難民吳學勤接替；不久黎柱樑發現吳學勤暗中向病人收費，遂公告此事，吳被迫離職。[4]日後協助醫務所的還有侯欽賢[5]與余漢民[6]，他們都曾在軍中當過軍醫，但未曾受過正規的醫學訓練。

由於缺乏堅實的財政支援，戴瑞蘭的醫護工作僅是個人即興的參與，既不穩定專注，也沒有計劃發展成具規模的事工；而她自己亦沒有意圖作全職醫護人員，總是以傳教和建立教會為念。她宣稱，讓人得著信仰較幫助人身體健康更為重要。[7]

除戴瑞蘭外，另有基督教團體在調景嶺提供醫療服務，最初僅是由一些曾受醫學訓練的傳教士(主要是護士)負責，他們拿著藥箱到各區各家為人看病，其後才參與固定的診所工作。

1951 年，曾在湖南工作的美國復初會(The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傳教士梅教士(Mary Myers)，利用戴瑞蘭的瀝青紙頂木屋，建立較具規模的診所，

---

[4] 范約翰先生筆述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21 日。

[5] 侯欽賢在 1950 年 10 月於錫安堂受洗，曾協助艾喜德開展青年事工。他在調景嶺中學教書，後轉往靈光醫務所(Bethesda Clinic)及靈實醫院工作。他的太太關叔威，曾在新亞書院唸書，其兄即電影演員關山。

[6] 余漢民為錫安堂會友，於 1951 年受洗。

[7] 戴瑞蘭教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

提供定時服務。梅教士可說是調景嶺首位全時間的醫療傳教士。但不久，她便因病退休回國。

適時蘇格蘭教會(Church of Scotland)的孫海倫教士(Helen Wilson)從大陸來港，她接受調景嶺的挑戰，重建診所。[8]其後復有來自挪威聖約教會(Mission Covenant Church)差會的傳教士葛瑞霖(Hanny Gronlund)加入協助。[9]

孫海倫為時任殖民地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W. G. H. Grantham，1947~1957)的表姊，故在政府方面有若干影響力。據楊植潤憶述，她能召喚水警輪，將重病居民載往市區的醫院，因此救活了好些人。

由於孫海倫計劃回國度假，葛瑞霖為免孤軍作戰，乃寫信邀請與她同國籍、同宗派，曾在中國工作多年的司務道(Annie Skau Berntsen)前來協助。

司務道曾這樣簡述她來調景嶺參與醫療事工的始末緣由：[10]

> 一九五〇年，一位中國醫生開始提供醫療服務。不久他開香港。美國宣教護士梅教士立即接替他的工作。葛

---

[8] 孫海倫曾在乘搭輪船時遭遇火災，為協助救人的緣故而臉部給燒傷，留有疤痕。她在 1958 年退休後回英定居並結婚。她曾在英國廣播公司 This is Your Life 的節目中介紹調景嶺的醫療事工。

[9] 葛瑞霖於 1956 年 6 月離開調景嶺，調到其他地區工作。

[10]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荒原上》(***Balm of Healing in Junk Bay***)（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頁 12。

（瑞霖）、孫（海倫）兩位教士也先後加入服務行列，幫助有需要的人。後來梅教士因病提早退休，孫教士也因長期勞累，身體很軟弱，盼能回國休息。就在這時候，我接到葛教士的信，來到調景嶺。

司務道為挪威人，原職護士。1938 年為中國內地會所派，到中國傳教，在陝南挪威聖約教會的工場服務，包括商縣、山陽、雒南、商南及龍駒寨一帶。1940 年，二次大戰期間，挪威為納粹德軍所佔，差會斷絕一切經濟接濟，她與其他傳教士仍在工場謹守崗位，沒有離去。[11]大戰後，曾短期返國，1947 年重回陝南，繼續醫療服務及傳教。1948 年，陝南解放，她仍堅持留守工場，至 1951 年 7 月才被迫離開中國，經香港返回挪威。1953 年 3 月 24 日，司教士為葛瑞蘭所邀，東來香港，遷入調景嶺，協助醫療工作，並攜帶了一批由挪威信徒捐贈給難民的魚肝油前來。

司務道抵埗後三週，孫海倫便回國，葛瑞蘭與司務道偕同幾位華人助手，繼續醫務所的工作。戴瑞蘭則專注替孕婦接生。

自 1952 年起，有位內地會醫療傳教士海富生(Dr. E.S. Harveson)[12]，每兩週一次到醫務所為病人診病。1953 年，由於營內傷寒與霍亂猖獗，病人大增，故改為每個星期三前來

---

[11]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32.

[12] 海富生當時在靈光醫務所工作，參加天文台道小群教會聚會。後來他轉到彌敦道開設畢士大診所。

一次。其餘時間，遇有一般患小毛病或慢性疾病的病人，便由葛瑞蘭與司務道自行負責。如有病人需在醫務所過夜留醫，也由她們親自照料。

1953 年，美國復初會的世界服務委員會(Commission on World Service of the E &R Church)捐出三千美元，協助醫務所由葵棚改建成木屋，另附建一個獨立的護士住宅。新建築物於 1954 年 2 月落成啟用。

1954 年，基督教醫務所有兩位歐洲護士，華人護士、助護、登記員、藥劑助理各一，另有兩位雜務員及一位半職的福利員。是年戴瑞蘭返國休息，司務道得兼理接生服務，於是在醫務所開設留產所。醫務所除為病人治病外，又免費派發奶粉、魚肝油、維他命丸給孕婦和小孩子，有時還派送一些英文的聖經故事書。有一位湖南籍的戴太太，是醫務所的長期職員。

自 1951 至 1954 年，復初會每月捐助醫務所的經費，由美金一百增至二百五十元；蘇格蘭教會每年捐助二百五十鎊，主要負責肺病病人的開支；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支持在醫務所工作的華人助手的薪津；基督教世界服務處捐贈衣物及維他命；挪威教會與信徒則送出牛奶與魚肝油。

1954 年，醫務所共為 85,295 人次提供醫療服務。經濟來源方面，總收入為港幣（下同）69,813.45 元，包括復初會的 15,257.05 元，蘇格蘭教會的 6,114.60 元，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的 9,927.00 元，挪威教會與友人的 4,657.20 元，其

他捐款 4,904.34 元。另外，加拿大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 of Canada)特別為肺病病人的膳食供應捐助 20,580.00 元。[13]

醫務所的工作一直沒有中輟，由靈實醫院派出醫護人員，每天到調景嶺主持門診服務，並設有牙科，直到 1996 年調景嶺營關閉為止。

第二節　靈實醫院與香港將軍澳醫援會

醫療工作需要較多經費，且得由受過專業訓練的傳教士負責，不易由一個差會獨力承擔，故從一開始，調景嶺的醫療服務便是跨宗派的事工。1953 年，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員會(Rennie's Mill Camp Church Clinic Committee)成立，協助處理醫務所的財務，主席為屬倫敦傳道會的那打素醫院院長晏樹庭醫生(Frank Ashton)。委員會一方面協助策劃推動調景嶺的醫務工作，另方面為事工籌募經費。

調景嶺居民因營養不良，患肺結核甚多，估計達千人以上。[14]司務道與路德會的西門英才同情病人的困苦，特別資助

---

[13] Author Unknown, ***Come Wind Come Weather*** （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醫藥所，1954）。

[14] 事實上，在整個五十年代，肺病是困擾全香港居民的問題，一直維持在每千人有 3.9 至 6.8 人患病的比率；與當時的美國只有 0.373 的比率比較，香港人患肺病的比例高二十倍。有說香港肺病的死亡率是全球最高的地區之一。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123~4;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135.

肺病病人的生活費，最初每人每月可得三十元，平均每月有一百多人獲得救濟。[15]由於肺病極易傳染給他人，1951 年，司務道等建造一間收容肺病病人的木屋，為病人供應牛奶及維他命，病人需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收容中心（當時稱為肺病休息室）僅雇有一名職員替他們作粗重工作。

海富生醫生自 1953 年每週一次來營診症後，基督教醫務所便開設肺病專科門診，每週一次。治療肺病所需費用，包括病人所住木屋與每天膳食，由蘇格蘭教會提供。

由於肺病病人人數眾多，醫療需求孔急，司務道等遂有興辦療養院的構想。

1954 年 8 月 29 日，颱風襲港，醫務所與肺病收容中心被吹毀，司務道與孫海倫、海富生，及另一位較後加入的李岱汶醫生(Vaughan Rees)，決定物色地方開辦療養院。[16]他們向政府社會局申請，各方奔走籌款，終於在離調景嶺約半英哩的元州創辦基督教靈實肺病療養院(Haven of Hope Sanatorium)，1955 年 10 月 22 日開幕。經費來自不同地區的教會與社會人士，西門英才在美國為籌款出了大力。[17]當時

---

[15]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3。

[16] 陳國英與司務道的關係非常密切。據她說，有天她邀請司務道參加她任教的信義幼稚園的旅行，走上山崗，發現這塊後來用作靈實醫院院址的土地，後來司務道向政府申請，結果獲得撥地。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17]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149.

共有醫生兩名，護士六至七名（全為調景嶺教會的女信徒），病床一百張左右。司教士自任總護士長，包美達任副總護士長，每週到院工作兩天，當時她兼理路德會手工部，並且也在醫院裡推展手工業務，讓病人參與繡花等工作。1957 年起，政府開始資助醫院部分病床的支出。

路德會對是項工作大力支持。據楊植潤說，這與該會傳教士何傳捷於 1950 年在香港染上肺病，被迫回國醫治有很大關係，何傳捷的遭遇讓路德會深刻體會肺病在香港造成的嚴重困擾，於是積極參與肺病療養院的事工。1956 年，路德會捐贈一個 X 光室給醫務所。在支持最高峰時期的六十年代初年，該會每年提供二百張病床的開支，由馬寧基金會負責。此外，又派遣教牧人員定期到醫院探望病人，藉以傳教。1961 至 1964 年，楊植潤奉派從事有關工作，每週在醫院住兩天。[18]

1956 年，社會局答允將政府在調景嶺的廚房和儲物室（在 1953 年以前為供膳處）的建築物借出，供他們開設門診診所。他們原擬向政府申請長期借用此建築物，但因政府在當時尚未確定調景嶺的未來發展路向，故拒絕所請。[19]

為了解決人手不足問題，司教士在 1955 年開設護士學校，訓練醫護人員（現稱司務道護士學校）。在五十年代，

---

[18] 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

[19]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156, D.&S. no: 1/2876〉。

調景嶺各中學未曾向香港政府立案註冊，畢業生的學歷亦不為政府承認，出路頗受限制，入讀護士學校是其中一條可行出路，不過靈實醫院所能給予的工資極低。當時靈實醫院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為調景嶺居民。

1956 年 11 月，靈實肺病療養院開設兒童學校，為院內三十名病童提供正常教育與康樂活動，有一位男教師負責教導。學校的設備、一切供應與教師薪金，全由英國紅十字會負責。

由於得到政府撥贈廿九畝荒地，乃在靈實肺病療養院旁成立靈實農場，目的一方面在美化醫院環境，保持空氣清新；另方面亦為病患者提供輕微勞動的機會，增進他們的體力；三方面也為醫院供應新鮮的菜蔬與肉食。政府農林管理處為農場提供大量樹苗、時花與菜種。[20]

自 1956 年起，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員會易名為香港將軍澳醫援會(The Junk Bay Medical Relief Council)，統籌各方面的醫療事工。1965 年，該會正式註冊為非牟利團體。[21]

1956 年，由於與司務道意見分歧，海富生另外成立迦南肺病療養院(Canaan Convalescent Home)，不復直接協助醫援

---

[20]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104。

[21] 基督教靈實協會，〈http://www.hohcs.org.hk/hohcs-chinese/whoweare.htm〉，2000 年 2 月 11 日。

會。海富生積極在療養院裡佈道，為病人祈禱。據當時期在療養院工作的同工憶述，療養院每年舉辦浸禮，都有十多人參加，其中有部分為病人家屬。[22]1959 年，因鑑香港已有足夠醫療資源，海富生轉往越南工作，將迦南療養院轉讓給醫援會，自此調景嶺的醫療服務復由單一機構統籌安排。一年後，迦南療養院易名楠森康復院(Fridtjof Nansen Tuberculosis Rehabilitation Centre)，以紀念在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從事難民救濟工作，曾在 1952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挪威人楠森(Fridtjof Nansen)。

在挪威難民理事會(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撥款資助下，司務道於 1961 年創辦了恩光護幼院(Sunnyside Children's Preventorium)，即日後恩光學校與恩光兒童院的前身。1966 年，司務道返挪威與貝德遜(Reidar Berntsen)結婚，婚後重回香港，在將軍澳坑口村創辦幼稚園。不久在觀塘接辦一所私立中學，易名為堅樂牧師紀念中學(Rev. Holm Glad Memorial College)，並在學校成立聖約教會堅樂堂。

1973 年司教士從靈實醫院退休，專責挪威聖約教會在香港的分會工作。1978 年完全退休，返回挪威。1986 年曾重訪中國西安。1992 年 11 月病逝。[23]

---

[22] 不願透露名字的信徒訪問，2000 年 5 月 27 日。

[23] 有關司務道與靈實醫院的資料，參司務道兩本傳記：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陝西羚蹤》(***Trails of Glad Tidings in Shanxi***)、司務道：《荒原上》***(Balm of Healing in Junk Bay)***（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及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另參《一粒麥子：司務道教

第三節　天主教醫務所及其他

1952 年，天主教開辦醫務所，規模不大。曹立珊先從香港的天主教醫院如寶血醫院、嘉諾撒醫院等取得免費藥品，又覓得兩位曾在國內任醫生的教友負責診治，便開始為居民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有修士張斐理加入協助，他懂得一些中醫知識。兩年後，由於兩位醫生相繼赴台，醫務所便由張斐理全權負責。有一個記述說：[24]

> 初由中國籍之張修士主持（1960 年 10 月間赴台），現有女護士一名，負責管理。備有普通常用及急救藥品。如教友中患重病者，則由會方介送本港法國醫院免費治療，是否收容，則視病情及院方床位有無空額而定。病者之運送，常由鳴遠中學年齡較大學生志願抬運至碼頭及協助上落船車。

范約翰憶述，張斐理的診治方法非常簡單，他首先請凡患感冒者站到一邊，然後每人派發兩顆藥片，如此十分鐘便可打發掉二、三十人。曹立珊亦承認，當時他們的做法是大病不治，小病給成藥，小手術也敢做。[25]

士紀念冊》（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及靈實福音佈道團，1994）；〈司務道教士與調景嶺醫務所、靈實醫院〉，《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209~214。

[24]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頁 56。

[25] 曹立珊神父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1 日。

曹立珊亦曾有一段時間在筲箕灣開設診所，聘請一位醫生為居民服務，但因市區醫療服務的需求不大，故不久便關閉。

信義會早期亦辦有醫務所，由那教士主持。據范約翰憶述，那是非常簡陋的救護站，遇有跌傷者為其塗點紅汞水，發燒者則給兩片藥片。那教士原在中國東北傳教，後與戴大衛(David Taylor)結婚，重來香港，在調景嶺事奉。戴大衛後來創立調景嶺學生輔助社。

安息日會辦有一間醫務所，一位葉姓醫生於五十年代中期每週到調景嶺一次為病人診治。

第四節　錫安堂接生所

戴瑞蘭為香港註冊助產士，很早便開始替難民接生。1957年，她計劃在錫安堂旁邊的地興建留產醫院，適時瑞典信義會在香港辦事處的同工與她聯絡，說有一筆為數三千元的款項暫無可用處，請她自行安排，她乃得以興建留產所的前座，後稱為基恩樓；兩年後，在孫約伯（孫伯義長老的兒子，1999年在美逝世）及信義宗世界服務處的資助下，留產所擴建，樓高二層，共有十至十二張床位，並陸續添置各種器材，包括從瑞士訂來的病床、從瑞典運來先進的產床等。據一位在此出生的女士憶述，留產所早期免費為產婦接生，並提供牛奶、鈣等必要營養素。過去難民的產婦要送到位於北角的國際難民營待產，留產所建立後，便不用長途跋涉了。

除戴瑞蘭外，另有華人蕭周婉淑為接生員，她曾在中國大陸接受醫護訓練。

第五節　戒煙所

1956 年，信義會開設自願戒煙所，這是全港第一個福音戒毒機構。據范約翰指出，先是信義中學校長彭壽延染有毒癮，由鄭錫安協助他以藥物戒毒，然後再將是項服務推廣。[26]

當時吸食的毒品以鴉片為主，也有吸白粉的。魏榮指出：戒毒者大都不是調景嶺的居民，而是從外頭轉介入來的。信義會在九龍城寨有傳教事工，每當接觸到吸毒者時，便勸導他們前來接受戒毒。

據好些居住在調景嶺的人透露，調景嶺的吸毒問題其實非常嚴重，毒品交易以半公開的形式進行，地點就位於政府興建、長年廢置的街市；不少青少年在黑社會的威迫利誘下吸毒販毒，一位信義中學的教師的兩個兒子便都染上毒癮，連傳道人的子女亦不能倖免。不過，吸毒者若留在本區戒毒，成功的可能性甚低，故入住戒煙所的主要仍是外來人士。戒毒者大多數為男性，也曾有幾位女性參與戒毒。

---

[26]彭壽延，河南人，父親為彭福牧師，曾任中華信義會總監督及信義宗香港協會監督。有一本關於他的傳記：白潔士(Andrew Burgess)著，鄧肇明譯：《汝南人彭福》（香港：道聲出版社，1963）。杜聖恩記述說：「一九五六年因一位傳道人之子吸毒，請求 NLM 的宣教士予以協助戒毒工作，於是乎開始了 NLM 在戒毒工作上的參與，且是香港最早的獄外福音戒毒工作。」杜聖恩：《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教會史略》，頁 46。

戒煙所採用禁閉式的管理。據魏榮與蕭克諧憶述，他們的戒毒方法較為簡單，就是把戒毒者關起來，然後為他們祈禱，向他們傳福音，亦有使用藥物以為輔助。整個療程約為半年。戒毒的成效不大理想，治癒後出外重新吸毒的比例極高。陳國英憶述，在她認識的朋友中，真正徹底脫離毒癮的只有一人。當然實際戒除毒癮的人應遠不止此數。

鄭錫安對戒毒者有很大愛心，好些人三次五次進出戒毒所，戒了又吸，連華人職員亦勸他不要接受這些人，以免浪費資源與心血，但他卻執意繼續幫助他們，並說若上帝給予他們機會，便不應該錯失。

戒煙所聘有華人職員周紫東與楊庭賢等。多數職員都是曾在此地戒毒的人，不過其中有不少仍為吸毒者。政府後來在石鼓洲設立戒毒所，信義會戒煙所部分員工乃轉職過去。無論成效如何，此處畢竟是開了戒毒工作的先河。[27]

---

[27] 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

第七章
神學院與傳道人培訓

第一節　路德會協同聖經學院

早在遷入調景嶺後不久，安息日會便已在營裡推行時兆聖經學校，這大概是全營最早的神學訓練機構。[1]不過，安息日會不在本書的處理範圍之內。

1950 年 8 月 18 日，為訓練本地傳道助手，開展教會工作，西門英才開辦協同聖經學校(Concordia Bible School)，自任院長。第一屆有十人入學，畢業生三人，即丘恩處、張石林（西拉）與朱文生，其餘學生因遷居市區或離開香港而中途退學。

西門英才欲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五百位華人傳道來，以應付將來中國大門洞開後的需要，因此學校的課程以實用速成為主，為期兩年；此外又開辦聖經函授課程。其時多數人相

---

[1] 正源：〈從摩星嶺到調景嶺〉，頁 12。

信國民黨反攻大陸不日竟功，故並未以香港為久居之地，聖經學校亦因陋就簡，學校盡可能多收學生，1951 年 5 月，便有九十五個學生入學。1952 年，連同修讀函授的人數共有二百人。

丘恩處在 1954 年起出任聖經學校教務主任。據他憶述，學校每星期上課五天，早上上課，主要查考聖經。下午無課，學校為學生分配一些工作，如建設校舍、刺繡等，讓他們賺取生活之資。晚上則有公開聚會，或是靈修，或是專題講座，注重向未信者做見證。學生都有飯票，且有居住地方，學校毋須為他們提供基本生活設施。

杜愛萊(Elmer Thode)[2]於 1953 年自美抵港，協助聖經學院的教學工作。西門英才於一年後離任回國，學院由杜愛萊主理。杜愛萊師母(Frieda L. Thode)記述：[3]

> 我們的宣教師已經開始展開工作，主要對象是難民，因為當時的難民實在太多了……香港政府對這許多的人只能給予飯票和建茅舍的地方，沒法為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於是這些人就有許多空閒的時間，可以參加各種教會的聚會。我們的聖經學校就收到許多學生，他們每天

---

[2] 杜愛萊，1902 年生於美國印地安納州，1923 年到中國，在湖北宜昌傳教。抗日戰爭期間返國，戰後重回，在漢口協同神學院任教。1952 年離開中國，他是福音道路德會最後一位離華的傳教士。杜愛萊接續在香港工作，在路德會協同聖經學院任教，並擔任總議會主席。1965 年於香港逝世。

[3] 菲達・杜愛萊著，戎子由等譯：《杜愛萊牧師傳》(***Deth in the Orient***)（香港：青年書屋，1976），頁 93。

> 有許多個鐘頭研讀聖經。那些女教士們因為有阿狄（Deth，按：指杜愛萊）這樣有經驗的宣教師來到她們中間工作都很高興，因為他馬上就知道怎樣去向難民傳福音，教他們唱詩。難民中有許多是講國語的，即使不懂國語的南方人也因為中文是統一的原故，很容易就聽懂阿狄的話。

第七屆校友楊植潤[4]指出，自杜愛萊到任後，聖經學院的教學水準大幅提升。此時學校各方面的設備有所改善，禮堂、課室、圖書館都粗具規模，圖書藏量也不少。教師方面，有杜愛萊、何傳捷與辛熹白等傳教士，早屆畢業生亦有留校任教者，除丘恩處為教務主任外，尚有洪約瑟、李偉韜、李光堯、楊道林與陳江川等。杜愛萊師母與包美達教士等女同工亦協助教授英文。但是，各教師包括日後接任院長的杜愛萊在內，每星期最多前來一兩天，長期住在學校的只有西門英才與丘恩處。

聖經學院的入學條件沒有太多限制，只要是路德會教友，筆試及格，便可入讀；但在修讀的過程中，卻有相當的篩汰，學生若是考試成績不及格，或操行有問題，都會被校方勒令停學。而即使能夠畢業的，亦不保證獲教會安排工作。

---

[4] 楊植潤牧師，河南洛陽人，1930 年生。1950 年 4 月 27 日來港，並未入住摩星嶺。因僥倖獲得飯票，得以入住調景嶺。在路德會聞道，1952 年受洗。1954 年 2 月，入讀協同聖經學院，為第七屆學生，1956 年畢業。在聖約翰小學任教兩年，旋被派往澳門聖保羅堂工作，同時在神學院補修課程，1963 年畢業後，在聖馬太堂工作三年，並於 1964 年被按立為牧師。後又在聖十架堂工作。自 1974 年起，一直在救主堂工作。曾任路德會會長職。

事實上，繼來的路德會傳教士都質疑這所聖經學校的水平，不願聘用畢業生為正式傳道；丘恩處說他在 1951 年前赴澳門工作，總會在報告裡稱他為 lay evangelist（中文仍尊稱「教士」）。不過，楊植潤那一屆的廿三個畢業生中，有五位在日後經進修而獲封立牧師。

聖經學校在頭五年共辦十屆，每年兩屆，入讀人數甚眾，但完成課程而畢業者不多；譬如第四期的入學人數有八十多人，兩年後畢業的只有十二人；[5]第七期入學人數八十八人，兩年後畢業生只有廿三人。五年內共有 117 人畢業，而肄業者超過 400 人。這些畢業生日後大多沒有留在教會任職傳道，留在路德會當傳道的人更少。協同神學院開校後，第一屆只有七位聖經學校畢業生就讀。

為了開拓台灣工場，差會遣送部分畢業生前往工作，包括朱文生，他在日後充任台灣中華福音道路德會主席多年。五十年代路德會在香港及台灣的傳道人，大都出身自調景嶺。[6]

聖經學校非常注重佈道訓練，學生平日到調景嶺各區逐家佈道，週末則分成小組，到港九新界各處街頭佈道，使用絨布畫片、幻燈片與唱歌等方法，足跡遍及九如坊、茶果嶺、牛頭角、鯉魚門、筲箕灣等地。事實上，聖經學校的學生佈道是路德會在五十年代初期擴展教會事工最主要的途徑。他

---

[5] 李光堯：〈主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主那裡來的〉，頁 90。

[6] Henry E. Simon, "The Legacy of Gertrude Simon,"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校，1982），頁 13。

們協助成立日後的路德會恩典堂、聖馬可堂、聖馬太堂、聖腓力堂及永生堂等。[7]堂會紛紛成立後，學生亦被分派到不同堂會，在傳教士監督下參與工作。李光堯憶述：[8]

> 當年的院長不斷帶我們往各街頭或鄉村去佈道，真大膽，也臉厚，不管人家是否聽得懂我們這些北方話，但是我們總是去向他們說教，於是漸漸的也能由一兩個孩童聚集到一堆人，散發單張教義，教他們唱歌是最有效的方法，一次，二次，三次，大家認識了，互有來往，約定時間，都能帶領許多人來聽福音，我們今日許多教堂就是這樣開始的。
>
> 一九五三年春，我開始到過西環、荃灣、茶果嶺及黃大仙各地區探訪，並作家庭或街頭佈道，都在禮拜六下午至禮拜一早上。遇有假日，也一定提一袋單張教義到各處派發。

學生編印《路德週刊》，又油印主日學課程。這是 1951 年路德會書報部（後稱文字部）的前身。

調景嶺的學生來源逐漸萎縮，1956 年，路德會決定停辦調景嶺的聖經學校，翌年改在九龍香江書院另辦路德會聖經學院，1957 年 2 月 25 日開課。丘恩處續為教務主任。1961

---

[7] 丘恩處：〈香港路德會三十年大事記〉，頁 7~8。

[8] 李光堯：〈主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主那裡來的〉，頁 90。

年他在協同神學院畢業後，出任聖經學院院長。由於宗派已辦有正式神學院，聖經學院以訓練平信徒為主。1964 年，聖經學院停辦。

1954 年，路德會開設神學訓練班，過去在調景嶺協同聖經學院畢業的人，必須進修神學訓練班。1956 年，路德會在這基礎上建立協同神學院，1959 年學院獲美國總會正式確認地位。

第二節　宣道聖經學院

1951 年，宣道會在調景嶺開辦短期聖經班，為期約三個月，採用趙君影的培靈課程七十二課，由丘育靈主講；另有朱建磯教授教會歷史，貝光道用英文教授約翰福音。一共辦了四期。學生每期約有五十人，但完成課程的不多，其中包括時恩證與范約翰。

因鑑營內不少信徒都有傳教心志，包忠傑乃以原武昌聖經學院部分師生為班底，在聖經班的基礎上續辦宣道聖經學院。學生有四十多人，全為宣道會會友。[9]教師方面，除前述的貝光道、白德三、包忠傑、高玉銘外，還有王守寰、白光照(Roy Birkey)、王澤生、傅珍珠(Pearl Fustey)等；此外，也聘請一些華人牧者如桑安柱、薛玉光及蘇佐揚等協助任教。

---

[9] 范約翰因為在靈糧堂受洗，故不為高玉銘批准就讀。

學院一切因陋就簡，教室設在紙棚山坡，亦無嚴謹課程，學生全為調景嶺居民，毋須為他們安排宿舍，而領有飯票者亦有政府或救總提供膳食。他們白天聚集聽課，課餘則照常作息，自謀生計。據郝次航憶述說：[10]

> 我進調景嶺後，去找一位姓魏的濟南同鄉，他原是青年軍，他一面在營裡給人補鞋，一面在唸神學院。我跟著他學補鞋。他去上課時，我就替他工作。後來他去外面唸神學院，我就獨自經營了。

宣道聖經學院的學生，包括都乾初、崔冠軍[11]、時恩證、王克章、曾式中、王力耘、伍希勇、劉摩西、魏道榮[12]等；他們在畢業後，成了宣道會在香港最早期的教牧人員。

---

[10] 〈郝次航先生訪談錄〉，頁 177。

[11] 崔冠軍牧師，北平人。1921 年出生。1938 年參軍，官至上尉，任汽車兵團排長；曾在後勤部於漢口所辦的運輸學校讀書，修讀選配專業，為時一年半，1948 年畢業。1950 年來港，翌年 7 月 15 日受洗，其後獻身傳道，畢業於宣道聖經學院。先到荃灣從事開荒工作；1955 年，創立宣道會葵涌堂。1962 年，於建道神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在橫頭磡新區天台開辦宣恩小學與宣恩堂。1970 年結婚。2000 年 5 月 16 日逝世。參〈崔冠軍牧師生平簡略〉（附於《崔冠軍牧師安息禮拜儀節》，2000 年 5 月 27 日）。

[12] 魏道榮牧師原名魏坤華，原籍廣東五華，生於 1920 年 8 月 8 日。年輕時曾在家鄉小學任教，後考入黃埔軍校第 19 期，畢業後出任十九路軍駐廣州軍團連長。1949 年，在梅州東門基督教堂受洗歸主。1951 年來港，先在渣甸山建築地盤任碎石工，並向工友傳道。1952 年，入讀調景嶺宣道聖經學院，一年後轉往建道聖經學院，1956 年畢業。建立宣道會大澳堂，及兼領錦田事工。1996 年 8 月 10 日逝世。（資料轉錄自〈魏道榮牧師安息禮拜程序單〉，蒙其女兒魏慈恩姑娘提供。）

當時不少難民從事繡花等工作，每月賺取六、七十元的收入；為彌補唸神學者的財政損失，西差會與九龍塘宣道會決定給予每位神學生每月三十元的津貼。崔冠軍說，當時在調景嶺生活，每月只要有十五元便可打發過去，如今教會願意付三十元讓人免費唸書，自然吸引許多人報名；他自己雖然已到教會聽道，卻還未曾接受水禮，在知道有這個課程後，他便懇求高玉銘讓他報讀，結果被允以旁聽生的身分參加。從他的例子看，聖經學院的收生並不嚴格。[13]

聖經學院強調傳福音的訓練。據說高玉銘曾規定所有神學生都得在聚會中邀請三位未信教的人赴會，否則便算課業成績不及格；後來隨著調景嶺人口減少，定額漸次減為二人及一人。他們又把學生組織成佈道隊，到港九新界各地工作，建立教會。

有五個學生，包括汪彬、崔冠軍等在 1952 年 7 月組成佈道隊到北角海旁附近佈道，那裡因住了不少上海人而有小上海之稱。其中有些上海人早在國內已信教，來港後並未參加教會聚會，他們與這些信徒接觸，在後者的邀請下開始建立聚會，這便是宣道會北角堂的前身。

由於經費短缺，宣道聖經學院在 1954 年停辦，併入同會主辦的建道聖經學院，前後共兩屆畢業生，共十七人。[14]未曾

---

[13] 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14]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 60；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 181~182。

修畢課程的學生轉入建道就讀，也有已畢業仍進建道增修兩年者。[15]連同轉讀建道的學員合計，至 1970 年，尚有三十四人健在，其中任職牧師傳道的有廿一位，長老和執事七位。[16]

第三節　調景嶺營出身的傳道人

（一）接受神學教育與獻身傳道

除了在營中的兩所聖經學院就讀外，調景嶺信徒前赴香港其他神學院就讀者亦為數不少，他們大多選擇信義神學院或聖經學院、伯特利聖經學院等由華中地區南遷、以國語授課的學校。信義聖經學校提供四個月一期的晚間課程，尤其受到歡迎。

必須指出，從前述兩所調景嶺的聖經學校訓練出來的畢業生，能夠長期留在教會事奉的不多，損折率非常高。崔冠軍指出，他屬於宣道聖經學院第一屆學生，該班在入學時有

---

[15] 林秀庭牧師是其中一人。據他自述：「一九五二年，清楚蒙主揀選，考入宣道聖經學院，受造三年，兢兢業業，不敢懈怠，在主腳前謙恭學習，畢業後我順服主的旨意，再進建道學院。……一九五七年受差遣作傳道，離開住了七年的香港，回到自由中國的寶島——台灣——先在本會台北市樟州街佈道所，隨後又遷到遼寧街用竹棚搭成的臨時禮拜堂傳道。由於順服聖靈的帶領，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松山設立福音堂，傳道於今，計算起來，已經是十三個年頭了。」林秀庭：〈母會成立廿週年感恩的話〉，《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頁 9。

[16] 都乾初：〈調景嶺堂的「七喜」〉，《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頁 7。

四十個正取生，基於移居台灣或其他因素，有過半學生中途轉學，能完成課程的僅十九人。他們中間有十三人一起相約到荃灣佈道植堂，一年後僅剩下七人，再過不多時便餘三個。當然，離開的人有少部分轉到別的堂會工作，但他們大多數離開教會工場，卻是無容置疑的。[17]至於離開的原因，部分是由於他們入讀聖經學校時心志不純，僅視唸神學與當傳道為糊口的職業，故當發現有更具前景的出路時，自然離職他去；但也有部分是由於教會在當時期未能為這批畢業生提供出路，以致他們找不到工場，無法一展所學。加上他們不諳廣州話，對本地社會與文化所知有限，受到某程度的「歧視」，都是造成就業困難的因素。

不過，從數字上說，出身自調景嶺的傳道人，卻還不在小數。范約翰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說：[18]

> 二十年前入營的六千八百多難胞，受洗歸主者約有三千人，在港九、台灣、澳門等地，基督教教會暨教會機構做傳道，以及教員職員等類工作者，約有三百多人。

我們無由驗證這個三百多人的數字的準確性，但是，在任職教會或機構的人當中，最少有數十人在堂會擔任傳道與牧師。由於宣道會與路德會辦有聖經學校，故兩間教會從事

---

[17] 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18] 范約翰：〈調景嶺史話——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一〉，頁 3。

傳道工作的信徒也最多。宣道會調景嶺堂有三十餘人獻身傳道，都乾初說：[19]

> 在中國教會史無前例，在一間堂會二十年的記載中，被神特選的現有十五位牧師，十八位傳道，並許多長老執事教員義工等，分別在國內外五十間以上的教會事奉神，據最保守的統計，每週有兩千以上的成人，七千以上的兒童，藉著這些人聽福音受澆灌。

范約翰所屬的錫安堂，亦佔了其中五人，包括管淵若、楊逢年、范約翰、陳和欽、張祖鷺等。惟是信義會信徒獻身傳道的人卻不多，據魏榮指出，僅有約二十位信徒修讀並完成信義聖經學院的校外課程。也許這與教會牧者是否積極鼓勵信徒獻身，又宗派所辦的聖經學院是否願意接受調景嶺信徒為學生有關。

（二）傳道人的出身與性格

五、六十年代，外省籍、部分出身自國民政府退伍軍人、在調景嶺接受基督教信仰或獻身傳道的人，佔當時期華人傳道行列一定比例。他們對時在調景嶺發展傳教工作，且曾辦聖經學院以吸納傳道生力軍的宗派，如宣道會與路德會的影響尤大。這些從調景嶺出來的傳道人多是半途出家、在青年或成年時期才信教及轉業的人；基於個人學歷與客觀歷史條件所限，他們只能接受有限的神學訓練，知識與技巧貧乏，文化素養與社會資源亦不算豐富。從行旅出身，兼且在極艱

---

[19] 都乾初：〈調景嶺堂的「七喜」〉，頁 7。

苦的環境下投身傳道，這些人若是認定傳道為他們的個人前途，沒有在早期便離去的話，多數都能心誠意堅，克苦耐勞，不離不棄地在單一的傳教工場裡奮鬥，日後在中途轉業的例子不多。

宣道會的時恩證牧師曾自謙地對筆者說，以他們當時的學歷與出身，特別是廣州話不靈光的條件，很難轉到別的教會去。[20]路德會的李光堯牧師亦這樣記述他在救恩堂三十多年的工作歷程，引文篇幅較長，卻可從其中窺知這批傳道同工的艱辛與奮鬥：[21]

> 我既然決定留在香港，就要更加安分的工作，我在路德會讀過兩年全日制的聖經學院，又接著半工半讀的，讀了七年神學院，一九六一年七月神學院結束。四年中，遲我一班畢業的同學，都封了牧師，我還是以「李教士」這個稱呼，在黃大仙附近的五個徙置區跑來跑去，這可以比較出我的低能與可憐，也有人看為不公平，要替我告洋狀，我膽小沒聽從，我安之若素。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冬，我也在總會的指引下接受了牧師職，我沒有意見，歡然接受，許多人在大教堂，光榮就職，我只甘在徙置大廈的天台小課室中，草草就任，於今近二十年矣。我在徙置大廈的天台上工作了十三年之久，每天要爬上爬下的行過八層樓梯，腰酸腿痛，最怕的是擔心那些年老的教友不敢來參加禮拜，在身心不安之餘，偶爾也會想

[20] 時恩證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8 日。

[21] 李光堯：〈主啊！如今可以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哪！〉，《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會，1983），頁 53。

到，若能把我調去那商業中心，交通孔道的大洋樓中的堂會工作，對我的前途或者會好些。但這念頭一瞬即息，因為我了解，我的條件不夠，我不奢求。這都是我所以能安然無變動的在救恩堂工作了三十年之久的成因。

我真感謝上帝，已親身領受到主恩，是出乎意想之外的。因為我在卅年前，孤獨一身，一無所有來到香港。在當時的環境，是應該餓死的，我作工嗎？無人錄用，我乞討嗎？言語不通。但是主收留我，自進入教堂後，已顯然可見一日好過一日……

對宣道會、路德會等過去在香港並無傳教事業，一切得從零開始的宗派而言，這批傳道人是宗派不可或缺的奠基者，無論是佈道抑或植堂，他們在五十年代都能發揮重大作用。如范約翰說：

嶺上原有路德會和宣道會所辦的神學院，經過幾年的時間已經造就出一部分人才，儘管其中多是北方籍，對粵語不夠流利，對地方情況也不熟習，但是他們還保有軍人那種精忠報國，不畏艱難的心志，所以也一樣被差遣出去開荒，遠的有去到澳門，近的則去到較為貧苦的木屋區和徙置區，剛好這時火災很多，徙置區大廈大量興建，教會只要申請辦一個天台學校，裝修費用不多，房租和雜費很少，天台不要房租，學校辦事處用一兩個單位和居民一樣繳費，這樣既可以安插幾個教友教學生，又可以利用天台教室傳道。住在徙置區和調景嶺環境差

不多，大家很談得來，所以難胞向他們傳道，倒沒有甚麼貧富懸殊的高不可攀之感，大家是同病相憐。[22]

（三）背景造成的事奉限制

不過，基於這批傳道人的知識、能力與語言的限制，他們大多只能在低下階層的群體，特別是新遷港人士中間工作，能打進知識分子與社會主流的甚少；而他們的社會背景與皈依契機，亦容易使他們懷有強烈的遁世與出世心態，對社會與文化持否定態度，難民心態形構出難民神學，這樣的屬靈觀對五、六十年代的傳教事工與教會模式，肯定有相當影響。調景嶺出身的教牧同工，不少都有給社會邊緣化乃至自我邊緣化的傾向。七十年代以後，隨著本土新生代的成長並在教會佔有愈來愈大的位置，這群難民背景的傳道人，有部分不能再以他們有限的知識與難民神學觀念，有效地從事牧養工作，如此造成教牧人員與信徒間的衝突、年輕信徒離去、教會發展停滯甚至式微等現象。

此外，宣道會與路德會在六十年代以後，都面對教會如何因應社會而轉型的問題。特別隨著在本地出生的新生代的興起，與來自粵語區域的新移民的人口大量增加，香港社會與文化愈來愈趨向本地化，說粵語的群體取得愈來愈明顯的優勢，即使教會亦不例外。在六十年代以後，不少原來說國語或其他方言的教會，逐漸讓說粵語的信徒佔了多數，而新聘同工大多能操流利粵語。調景嶺出身的教牧人員，倘若無

[22] 范約翰：〈福音工作的演變——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十五〉。

法適應這個大環境的轉變，他們便發現即使是在教會門牆之內，還是有給邊緣化的危機，譬如難以擠進宗派領導層的位置、在許多方面給年輕一代的傳道同工趕過等。宣道會也有類似操粵語者凌越操國語者的情況，[23]不過由於宗派組織不強，個別堂會比較獨立，加上領導層穩定且能服眾，故問題不算嚴重。但是，路德會自六十年代開始，便面對複雜的對立與分裂問題，語言與出身當構成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24]

無論如何，調景嶺出身的傳道人對香港基督教發展起了相當作用，他們是值得作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基督教在五十年代於調景嶺的參與，無論是傳教抑或慈惠工作，對調景嶺自然產生許多影響；但調景嶺事工，特別是在其中培養的傳道新力軍，倒過來亦對基督教日後的發展造成影響。

---

[23] 調景嶺宣道聖經學院的結束與併入建道聖經學院，可說是其中一例。根據崔冠軍牧師的說法，當年劉福群牧師決定停辦調景嶺宣道聖經學院時，宣道聖經學院所招到的學生比建道聖經學院還多，故他強烈的感受到是項合併是不公平的安排。此外，他們自宣道聖經學院畢業後，也感到由說粵語的傳教士所主導的西差會對他們這群說普通話的人存在若干歧視，至少他們並未受到重用。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

[24] 有關這個問題，詳參 Richard E. Mueller, ***Mission Made Impossible: Sources of the Schism in 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Hong Kong and Macao Mission*** (St. Louis, MO: Evangelical Lutherans in Mission, 1976)。

第八章
基督教在調景嶺的興衰

調景嶺的宗教活動頻仍興盛，除前章介紹的天主教與基督教各宗派外，安息日會、摩門教，佛教普賢佛學院與南普陀寺，也有各式各樣的傳教活動，茲從略。

第一節　調景嶺教會的特色

調景嶺是難民匯集的地方，在這裡建立的亦是難民教會。

（一）難民教會與差會主導

難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經濟貧困，在本地並無人脈關係與謀生資源；他們對基督教產生興趣的其中一個契機，亦是期望藉教會獲得這些亟需的關係與資源。當時期，從中國大陸撤退的外國差會，由於剛結束一個廣大工場的事工，故亦最容易把資源調撥到這個地方來；原來在國內工作的傳教士，曾在貧困落後的人群中間傳教與服務多時，故對調景嶺

的惡劣環境沒有任何不適應的地方，事實上，他們不少人在調景嶺蓋搭房子，與難民一起作息生活。對傳教士而言，生活困頓、心靈無依的難民，是對福音的回應最積極的一群，在他們中間工作的成效最大。

在五十年代，遷港的難民並不限於調景嶺居民，卻是遍佈港九新界，難民福音工作非常蓬勃；不少差會，特別是在解放前後才將事工由中國大陸撤出來的，都專注於向難民傳福音，藉救濟與各種服務建立教會。在調景嶺開展事工的幾個差會，包括信義會、宣道會、路德會、神召會等，都有鮮明的難民教會的性格；[1]與比較注重中上階層事工的本地固有宗派，形成較強烈的對照。這也可以間接解釋為何本地固有宗派甚少在這個時期發展難民福音事工，畢竟本地教會與難民教會是兩種形態截然不同的教會。

值得一提的是同時期從國內撤出來的華人奮興家與自由傳道。基於語言及社會背景所限，他們亦集中向新來港人士傳教。但是，他們的主要傳教對象卻是那群挾有資金、生活較豐裕的難民；惟有在這個階層中間工作，他們才有指望於短時間內籌得足夠款項，建立堂會與其他事工。靈糧堂曾有

---

[1] 蕭克諧曾這樣說：「為了滿足這些所謂『難民』的需要，信義宗宣教師就在他們中間開始了宣教工作。一直到六〇年代，本會主要的工作對象仍是那些難民，因此，直到今天，仍有人稱我們為『難民教會』。」他提到難民教會有兩個特徵，其一是早期主要用國語（普通話）聚會，其二是信徒大多來自低下階層。蕭克諧：〈我所認識的香港信義會〉，頁 1~2。（本文曾刊於信義會的周年特刊，但這裡參考的是電腦打印原稿，蒙蕭克諧院長直接贈閱，謹謝。）

個別牧者與信徒參與調景嶺的難民佈道，但在該地建立堂會卻從未成為教會的計劃之一；九龍塘宣道會的信徒很早便開始調景嶺工作，早期的調景嶺宣道會（稱新界佈道所）還是該會的分堂，不過，由於調景嶺事工龐大，加上該地教會在可見的長時間內都無法經濟獨立，本地信徒主理的教會難以長期承擔，只好轉交差會辦理。所以，除了在最初階段，調景嶺的教會（聚會所不算）全都是由外國差會主辦的。

（二）傳教的黃金時期

自 1950 年開營起，至約 1955 年為止，可以說是基督教在調景嶺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五年間，約有二千多人接受天主教信仰，另有約三千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兩數加起來即佔全營人口的十分之二，這個皈依的比率在整個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裡，即使不是絕後，肯定也是空前。曹立珊在 1954 年說：[2]

> 調景嶺還有一個特別現象，就是「歸主」運動的澎湃。他們深深感到大陸的沉淪，是唯物思想作下的罪孽，世局的動盪，是一群魔鬼差役馬林可夫毛澤東們在作祟。尤其聽到各位在鐵幕的同道，堅強反共，忠於天主的種種壯烈行為，更鼓舞了他們「研究真理，皈依天主」的行動。四年來，調景嶺天主堂就增加了近兩千的教胞，

[2] 曹立珊：〈調景嶺近況〉，《台灣教會生活》1954 年 9 月 5 日。

> 約佔全營居民十分之一。他們入教之後，都恨歸主太晚，他們說：如果六年以前，我國同胞有十分之一的虔誠天主教徒，大陸不會是今天的面目。

戴瑞蘭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再三斷言，就她當時的傳教經驗，完全沒有人對福音表示抗拒。林澤提到他在五十年代末年於調景嶺就讀小學，所有學生都得參加學道班，然後接受水禮，筆者問會否有家長反對子女接受基督教，他的回答是：信教與上教堂是當時的一個風氣，沒有人反對的。

（三）信教原因

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信仰基督（注意：這裡先集中討論真誠信仰者，純粹吃教者不算在內）？原因最少有三。首先，外在環境方面，楊植潤指出，困在難民營裡的人太空閒，既無工作亦無書讀，沒有甚麼家務可料理，甚至連消閒的報章雜誌亦闕如，終日無所事事。夏天氣溫炎熱，無法獃在狹小的 A 字棚帳裡，只有到處閒逛，消磨時間；教會一般地方較大，如宣道會用軍用的綠色膠帳篷搭建，四面通風，空氣較為清爽，加上有道理可聽，故吸引很多人參加。

其次，內在心靈空間方面，滯港難民因前途未卜，心情鬱悶，對宗教信仰興趣較大，傳教效果甚佳。王力耘是在摩星嶺時期便聞道信教的，據他憶述，隻身逃難來港，身無長物，走投無路，在摩星嶺面對茫茫大海，有家歸不得，不知何去何從；那時有人向他傳福音，心裡極受感動，確認與主同在就是天堂，而天堂才是他的永恆家鄉。傳教者向他派發

一本四福音小冊子，他於晚上睡不著的時候翻開來看，邊讀邊流淚。[3]這樣對福音的心理反應不是王力耘所獨有，在東華醫院時期信教的張祖鷺也有類似的故事：[4]

> 我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從大陸逃難到香港，本來我是沒有信仰的，在香港舉目無親，言語也不通，在生活、前途方面都陷入一個絕望之中。那時候我住在東華三院（按：應為東華醫院，下同），裡面住滿了難民，我就住在外邊，當時我帶著一個衣箱，箱內放著證件及少量金錢等。由於剛來到香港，身體都很疲乏，不料在睡夢中被人偷了衣箱，於是甚麼都沒有了，只剩下媽媽留給自己的一個金戒指，心裡非常失望。當時東華三院有一些基督徒，他們熱心傳福音，傳道的人叫我們信耶穌，回到上帝的面前，那麼，我們便能在祂裡面得安息安樂。以後我在舉目無親，前途一片黯淡的境況中，需要一個力量來支持我，鼓勵我，讓我能夠有勇氣繼續地掙扎奮鬥下去，所以，我在福音聚會裡，心裡有所感動，很需要一個真正的幫助，所以，我便信了耶穌。

第三，鄉黨因素對傳教工作亦有幫助，若是某教會積聚較多某省籍人士，則同鄉者自然會團聚到那裡去。張世傑憶述說：[5]

---

[3] 王力耘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7 日。

[4] 蕭麗霞、盧慧桃：〈張祖鷺牧師專訪〉，頁 14。

[5] 〈張世傑先生訪談錄〉，《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77。

> 按理講，在這種困苦環境中，又沒有生活調劑，大家情緒是很容易躁急的。這要歸功於上帝的恩德，當時有七、八個教會，大家於禮拜天上教堂作禮拜，平常參加查經班、各種團契、英文班等，把大家閒下的時間都佔了。信義會、路德會、錫安堂、宣道會、神召會、真理會、靈糧堂，及天主教都早在大陸各地傳教。如信義會原在湖北、河南一帶傳教，從那兒來的難民，也就喜歡去信義會；天主教在北方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北方來的難民高興去那兒。每個教會都坐滿了人，這樣對教友的精神有寄託，心理煩悶時得以舒發，所以很多人在這時候加入教會，教會非常興盛，直到後來大家日子好過了，年輕人也就比較不信教了，年紀大的，還是上教堂的。

就筆者的訪問裡，不少人都曾提及調景嶺各宗派與教會在早期都帶有省籍的特色，譬如信義會有較多湖北與河南人，神召會有較多安徽人參加。由於沒有具體的數字以為支持，故甚難作進一步的分析推論；但筆者有理由相信，省籍認同是吸引難民參與教會聚會的其中一個有利的因素，許多人在離開家鄉後，都自然會尋找同聲同氣的同鄉團聚，彼此支援，藉以稍解鄉愁。以省籍與語音來區分傳教對象，招聚信徒，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乃至東南亞及北美，都是相當普遍的情況。調景嶺社區的其中一個特色，正是存在大量不同的同鄉會，教會鮮能不受省籍與語音認同的人心趨向所影響。

（四）教會根基並不牢固

楊植潤指出，早期教會根本毋須出外傳教，信徒自己會找上門來。由於居民大多沒有鐘錶，教會用鐘聲召集信徒聚會，各教會有不同的鐘聲，信徒都能識別出來。教會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聚會，如主日崇拜、主日學、青年團契、少年團契、查經班、祈禱會等，但這些聚會的形式差異不大，因為都是鬧哄哄的一大群人，沒有人計較聚會是否適合自己，他們有聚會便來參加。有些人還跑好幾個教會參與不同聚會。[6]

不過，一下子來了大堆人，教會根本無法做個人栽培工作，所有活動與服務都是集體性的；熱心追求或靈命表現突出的一群，牧者便會勸導他們獻身傳道，入讀神學院，或至少報讀聖經函授課程，故較為深度的栽培都是在獻身事奉以後，也就是說局限於日後成為傳道的小撮人裡。調景嶺的人口流動性極高，牧者的工作取向是盡量把握機會傳教，每次聚會都不斷重覆簡單的福音信息，知識與靈性造就不多。凡此種種，都造成教會根基不牢固，信徒靈命基礎薄弱的後果。

事實上，若是五十年代初期傳教士與傳道人都不慣於從事外展性的佈道工作，只是被動地等候信徒臨門，那一旦新前來聚會的人數減少以後，教會便自然停滯不前。

---

[6] 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

（五）宗派關係問題

丘恩處曾提到調景嶺教會有兩個特色：其一是信徒流動性大，在五十年代，不少人伺機移居外地，或遷入市區尋找工作，對社區與教會的向心力都不大。

其二是不同教會與傳教士間的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救濟事工上，彼此的合作意願很強，將軍澳醫援會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7]西門英才隸屬於排他性極強的路德會，卻積極與別會傳教士合作，以致招來後至同宗派的傳教士非議。至若戴瑞蘭等傳教士，便更有超宗派信心傳教士的氣質，她曾提到在 1950 年時，有信義會的華人邀請她在難童學校教書，亦為信義會的傳教士所反對，因她出身自五旬節派，但不數年後信義會竟然邀請她在他們那裡開設留產醫院，可見其間態度轉變之大。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個時期的傳教工作，比附十九世紀初基督教來華的時期，不少傳教士同樣是在離開中國大陸以後，隻身留在香港這個陌生地方，所屬差會在香港並未建立支援系統，傳教士面對龐大的福音需要，必須自行發展傳教媒介，尋找友人協助；如此，傳教士間的門戶之見自然大為消減，宗派主義亦無立足處。

---

[7]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

不過，這樣的宗派合作精神僅是維持了極短的時間。徐傳宣指出，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調景嶺各教會在穩定了陣腳後，大都各自為政，甚少有聯合性的事工。這也是中國教會一個自然的發展趨向。

第二節　調景嶺教會的衰落

調景嶺曾是歷史上全球華人社區中教會增長最高速的地區，數字令人觸目；但這也是教會衰落得最快的地區，單以更正教計算，在短短數年間，各教會的聚會人數由高峰期的二千餘人滑落到二百餘人，幅度同樣令人觸目。[8]

我們先查看一些具體數字。根據兩項就 1955 至 1962 年香港基督教會的研究報告顯示，調景嶺數間教會（包括安息日會）的發展情況如下：[9]

---

[8] 香港教會增長的高峰期是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年，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便放緩下來。據統計，1960 至 1963 年，教會信徒人數年增長率是 12%，在 1964 至 1968 年間卻下降至 4%。但最少仍不像調景嶺的教會這樣提早並大規模萎縮。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53.

[9] Cressy,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11~25. Cressy,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26~29.

教會（括號為成立年份）	1955 年			1958 年		
	會友	出席	受洗	會友	出席	受洗
路德會聖約翰堂(1950)	475	——	——	1,100	——	120
宣道會調景嶺堂(1950)	1,545	100	46	1,570	——	6
信義會調景嶺禮拜堂(1955)	120	299	150	276	400	——
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1950)	350	75	50	406	——	31
神召會靈恩堂(1952)	277	60	15	307	——	11
安息日會(1950)	26	40	7	15	——	5

教會（括號為成立年份）	1962 年		
	會友	出席	受洗
路德會聖約翰堂(1950)	475	——	93
宣道會調景嶺堂(1950)	——	——	——
信義會調景嶺禮拜堂(1955)	366	——	——
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1950)	?	?	?
神召會靈恩堂(1952)	63	33	1
安息日會(1950)	40	——	——

可以看到，調景嶺幾間教會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都遭遇相當程度的衰落，信徒人數大幅減少。

在 1962 年的調查裡，除神召會靈恩堂以外，其餘各堂都沒有匯報聚會人數，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人數甚少，與過去比較落差太大，故寧願不報，以免尷尬。路德會與信義會可以為孩童施洗，小學學生成了信徒增加一個主要來源，故會友人數仍有上升。不過，路德會報稱在 1958 至 1962 年此四年間，會友增加八百多人，單在 1962 年便有九十三人受洗；證諸各條口述資料以至該堂日後發展的報導，這個數字都不能不讓人啟疑竇。即使該堂強制性要求聖約翰小學每個學生都參加學道班並接受水禮，[10]亦無法達到這樣的增幅。（1960 年全校六班學生才 210 人，換言之，每屆才有學生三十餘人。）

隨著早期居民逐漸遷離調景嶺，教會聚會人數急速下降，盛況不再。據筆者所做的各個訪問綜合整理所得的圖畫，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所有教會都面臨信徒減退的打擊，較佳者尚有近百人聚會，較差者僅餘二、三十人。而在六十年代以後，幾乎所有教會的聚會人數都減至二、三十人或以下，並且以年長人士為主，年輕人甚為罕見。

安息日會、聚會處與摩門教等先後結束他們在調景嶺的工作，而神召會、宣道會等的差會組織，亦不再以人力物力支持調景嶺這個被視為沒有發展潛力的社區，轉由個別華人牧者自理。仍然存在的教會，大都只能維持窘迫的局面，苟延殘喘。

---

[10] 林澤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第三節　傳教環境與對象的轉變

探討基督教在調景嶺衰落的現象，必須先提一些非教會所能控制的外在原因，這包括人口外移，影響社區居民與教會信徒的結構，及居民生活與心態的轉變。

（一）人口外移的影響

1952 年以後，台灣陸續接受部分移民，其中不少是在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的幫助下離去的。此時期能夠遷移的人，大都是原高級官員或知識分子，也可說是調景嶺社區及教會的菁英，他們的離去構成對社區與教會的重大損失。1956 年，美國實施「難民救濟計劃」，移居外地的知識分子便更多。以丘恩處為例，他原本計劃移居美國，後因肺部發現一個黑點，才沒有成行；他隨後亦獲准到台灣，入讀地方幹部訓練學校（中興大學前身），不巧入台證要在他赴澳門植堂後才發出，最終決定放棄離港機會。像丘恩處般獲得移居外地的知識分子為數甚多，故在 1954 年以後，調景嶺各教會的聚會人數即未立即大幅滑落，但隨著知識分子紛紛離去，信徒質素已有顯著的下降。[11]

此外，有更多居民雖未移居海外，卻陸續遷出市區，離開調景嶺。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就業機會大為增加，成年人大多轉到城市打工，一些讀書成績較佳的青少年亦選擇到市區的學校上課。調景嶺的對外交通逐漸改善，有愈來愈多居民每天

[11]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

往返市區，早出晚歸，他們留在社區的時間減少，對社區（包括教會）的活動的投入程度亦相應下降，再不能出現每晚參與聚會，逢有教會活動必然出席的情況。長期獃在社區的多是老弱婦孺之輩，他們即使願意信教，也難成為承擔教會事工的骨幹。人力資源匱乏，為事工的推展增添障礙，這是教會式微的一個內在因素。由於願意獻身的年輕信徒不多，路德會的聖經學校在招生方面漸有困難，最後決定遷出調景嶺。

（二）居民心態的轉變

有人會問：即使最早期的信徒遷離社區，要是社區仍有新來人口，便仍擁有傳教對象，教會亦必有可供發展的空間，斷不會因原有信徒離去，便導致教會末落。這個質詢是非常恰當的。教會衰頹現象的出現，不能完全歸咎於社區人口減少，缺乏傳教對象。事實上，至少在七十年代以前，調景嶺的常住人口仍維持數千的數字，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未信者，都是潛在的傳教對象。各教會仍有與居民接觸的管道，包括教會學校仍然開辦，救濟物品繼續派發，教會主辦的手藝工場仍然為若干居民提供就業的機會。[12]

衰頹的關鍵，在於傳教環境與對象的轉變。六十年代以後，整個社區的氛圍不復是供人短暫居留的難民營，而住在

---

[12] 以路德會所辦的手工廠為例，在 1965 年，仍有 128 個家庭受惠於這間工廠，70 個兒童獲得學費津貼，並有 35 人獲得借款。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77, 註 16。

此地的人的難民心態與生活模式亦改變了。無論是已滯留此地四、五年的早期居民，抑或為尋找廉價居所而剛遷入的新居民，他們都鮮會視調景嶺營為臨時棲身的客棧，卻認定其為賴以安居樂業的家園，就像他們把所住的油紙棚拆掉，換建為木屋或石屋一樣。這些不再自甘難民身分的居民，不願長期被動的等待救濟（當時不再有免費現飯供應），積極經營生活，娶妻生兒，尋找工作，每天為口奔馳，如此自然不復有太多餘暇參與聚會；而在心態上，他們的徬徨空虛感覺消退了，生命的危機感淡化，對宗教信仰的感覺需要與感應能力亦相應降低。這不是說客觀環境與主觀心態改變了，人們便必然對基督教信仰不感興趣；但教會得與時俱變，因應居民的生活與心態而調整其傳教方式與信息重點，方能維持信仰的適切性與有效性。要是教會依然故我，僅被動地舉行講道聚會，期待居民自行摸上門來參加；又其傳講的信息仍為一成不變的難民福音，未能解答人們的困惑，滿足人們的需要，那基督教信仰不復對他們產生吸引力，便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在下面會再論及這點。

有人進一步分析調景嶺居民的心態，指出在六十年代以後仍然留在調景嶺的第一代居民中間，存在著兩個相當突出的群體：第一類可以名為理想主義者，他們不少曾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對原來的政府與政治信仰堅信不移，可說活在昔日的世界裡；當然他們面對著理想與現實間的嚴重差距，因而都有強烈的不遇感，但這導致他們更迴避投入現實的社會，寧願匿居在調景嶺這個天時地利所營造的舊世界裡，繼

續他們的政治夢想。對於這群精神世界自給自足、也與現實脫節的理想主義者，教會要傳福音給他們，改變他們的信仰，實在談何容易。第二類則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倚靠政治表態來圖利，許多甚至認定既然過去曾為黨國出力，台灣政府便理應照顧他們一輩子，他們的「吃政治」與教會裡的「吃教」形異實似；對於這群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人，基督教信仰對他們的作用也不會很大。[13]我們無從估計以上兩類人在調景嶺的居民中所佔的比例，也無法評估以上的分析是否構成他們拒絕信教的主因，但六十年代以後，調景嶺老一輩居民新加入教會的極少，倒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上述種種因素，導致教會由高峰急遽滑落，聚會人數由原來數百人減至數十人。聚會人數劇降，造成蕭條零落的氣氛，士氣低迷，這倒過來又削弱其發展的動力。不少原來積極發展調景嶺營事工的差會，都將傳教資源抽調到市區其他地方，資深而又具能力的同工外調流失，換上資歷與能力較低的人，自然影響傳教效果。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好些堂會的傳道人更換頻仍，不少做上一兩年便尋求外調；有些教會更因信徒人數稀少及差會的不再支持，無法聘任全職同工，這都進一步弱化教會的傳教力量，形成惡性循環。

---

[13] 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羅菁女士於六十年代隨父母遷入調景嶺，在慕德小學與調景嶺中學讀書，後赴台灣升學，在那裡加入戴瑞蘭教士所開設的錫安堂；畢業後仍回調景嶺居住，參加錫安堂，並擔任主日學校長職。羅菁女士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語文教育中心。

第四節　衰落的內在因素

調景嶺教會的衰落，與教會某些內在因素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主要有包括吃教問題、信徒質素良莠不齊、信徒對差會過分依賴，及教會無法與時俱進等。

（一）吃教問題

調景嶺教會積極從事救濟工作，而大量的救濟工作為教會製造出大量「吃教者」，情況一如 1949 年以前的中國教會。不少信徒與教會的關係，純粹建立在救濟品的招徠和利誘上。

> 當時一個救濟包，可以賣二十元，而這二十元的價值超過現在的一千元。很多人一個月只能賺一百元，所以這二十元就很重要了。不少人捨不得吃，就有人收集起來，拿到香港去賣，你一手給救濟包，他馬上給你二十元。所以講得好聽是去聽道理，講得難聽點是為領救濟品。常見一家三口人分別去不同的教會，因為有時這家教會發得很豐盛，有時是另一家。他們不願意吊在同一棵樹上，也可平均一下收入。譬如較積極的信義會，每年都從挪威捐來許多衣服，在聖誕節前分發給教友，大衣、毛衣、牛仔褲等等，都很好，很漂亮的。此外，天主堂也會定期發放米，每家給好多斤。所以這段時間，每家只要信教，生活也還過得去。反正大家各施其法，我認得一家人，老婆是天主教，先生是路德會的，小女兒唸信義小學，就信信義會了。[14]

---

[14] 〈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頁 119~120。

許多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吃教問題是造成調景嶺教會迅速興旺又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

信義會的陳國英曾對筆者詳細談到調景嶺居民的吃教情況。她指出，由於教會有救濟品派發，吸引了大量居民入教。當時期入教成了一種時髦風氣，許多人前來學道受洗。有些人甚至在五間不同教會（分別是信義會、路德會、宣道會、錫安堂、天主教）洗禮五次之多。傳教士的態度是來者不拒，只要居民表示願意入教，便為他們施洗。天主教的情況最為嚴重，凡入教者教會均致贈二十元，這在當時是為數甚鉅的款項，故極具吸引力，陳國英丈夫的四個兄弟都因此加入天主教。陳又認為，其時教會裡的真誠信道者不多，大約只有參與者的十分之一。在六十年代以後，不少居民的生活改善了，教會的救濟工作亦逐漸減少，參與聚會的人數大幅滑落，能夠至終留在教會裡的信徒（信義會在六十年代約有三、四十人聚集），才是真實信徒。[15]

路德會的丘恩處認為，調景嶺教會最興旺的時間是在 1952 至 1954 年。1950 到 1952 年，即教會才開始的時候，參加聚會的人已非常多，他們多數是為求吃餅得飽而來的，對信仰懷有真誠興趣的人不多，他自己也不例外。但在教會聚會了一段日子，不少人都被福音道理所感化，成為真實信徒，是以 1952 到 1954 年為教會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

[15] 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信義會的魏榮也指出，教會最初以福利品吸引信徒，故一下子來了大堆人，但這些人對教會的歸屬感不強，可以同時跑兩三家；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後，生活穩定下來，信徒才較為固定地在一個教會聚會，但聚會人數亦自然較前減少了。[16]

平情而論，吃教問題雖然決定了教會的興衰，卻不等於完全沒有正面意義。對絕大多數困居調景嶺的居民而言，他們既無資本亦無社會關係，連語言亦不通，甚難靠自力開創新局面，傳教士所代表的不僅是源源不絕的金錢，也是與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區的聯繫管道，他們是居民最大（要非唯一）的盼望。丘恩處指出，即使當時教會藉救濟吸引許多吃教信徒，也不能因此便推論說這是失敗的工作。在當時，教會曾為許多難民帶來實質的幫助與心靈的盼望，挽救了許多原本要跳海或吊頸的人，這是一樁不折不扣的善舉。[17]

在接受筆者訪問的眾傳道人中，神召會的徐傳宣對調景嶺的事工持最正面的態度。他堅信調景嶺是上帝特別預備的地方，許多人若非淪為難民，不經過種種苦難，便不會謙卑下來，接受信仰。調景嶺各教會有許多真正得救的人，也有被上帝使用的人，每間教會都曾結出果子。當然教會存在不

---

[16] 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盧龍光亦指出，當時因教會有救濟品派發，加上教會搶人，故人們普遍都跑幾間教會，特別是在如聖誕節等節期，總是參加幾趟慶祝會，領取多間教會的禮物。盧龍光博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8 日。

[17]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

少吃教者，但果子也得有樹葉來襯托，吃教者便是樹葉了，有樹葉有果子，這是不能避免的事，亦無損我們對調景嶺的事工的整體評價。[18]

（二）信徒與教牧人員的質素

吃教問題除了直接影響聚會人數的升降外，也影響教會參與者的質素。

范約翰提到當時存在不少「教騙子」，為改善生活條件而入教。這些人最喜歡諂媚傳教士，希望從他們身上獲得物質或其他好處，諸如介紹工作、報讀神學，或遷居外地的機會等。由於居民人口眾多，僧多粥少，傳教士不可能發現及兼顧每個人的需要，故主動爭取者往往較不吭聲的人獲得更多資源和機會。范約翰說：傳教士的想法與華人不同，那些卑躬屈膝求取好處的人，往往被視為謙卑者，而稍有骨氣不屑趨炎附勢的，則被目為驕傲的人；如此一方面助長信徒走內線拉關係，造成資源分配不公平的情況，另方面亦使傳教士所吸收的助手，許多在人格與才幹都不是優質的人，教會有好些在財務與桃色方面發生問題的個案。[19]

派發救濟品為教會帶來相當多的負面影響。在調景嶺亦有事工的摩門教，負責人於六十年代末期接受一項調查訪問

---

[18] 徐傳宣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7 月 4 日。

[19] 范約翰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0 日。另范約翰：《瓦器藏珍》，頁 26。

時指出，他們在六十年代初期亦有參與分派救濟品的工作，從美國運來許多物資賑濟居民，但很快便決定放棄是項工作，原因是它有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影響教會的發展：其一，處理及派發物資佔用了傳道同工大量時間，減少了他們對傳福音的參與；其二，派發物資極容易因公平與否問題，引起教會內的紛爭；其三，派發物資很容易招來大量懷有錯誤動機的人入教，特別是華人傳道同工，為了要向差會及傳教士呈報業績，明知入教者動機不純亦視若無睹，甚至不擇手段地脅迫受助者入教。[20]證諸參與派發物資最力的幾個教會，上述情況都無法避免。

得公允指出，起初是教騙子不等於永遠是教騙子，有人藉教會提供的福利與工作機會而接觸信仰，最終成為堅貞信徒者。李光堯這樣憶述他在唸神學時的生活情況，他乃是懷著感激之情來接受教會的供應的：[21]

> 二十五年（按：1949 年）以前的數年中，我孤獨的過了一段躲藏的生活，茫茫的逃亡，我過深圳河時，連一枝杖都沒有，一身穿著是北方初春的服裝，到香港後已經是汗水濕透過多次的棉衣，住進難民營，糊火柴盒、花、吃難民飯，晚上無油點燈，到教堂去聽道，本是打發長夜的寂寞，因而認識人多了，就可以幫教會做點木

---

[20] 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272.

[21] 李光堯：〈主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主那裡來的〉，《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銀禧紀念特刊》（香港：該會，1978），頁 90。

工、建築木屋，又能整天的讀聖經學院，教夜學，每月十元，以七元買一張飯票，日領兩餐，餘三元可買膠鞋、牙刷、毛巾及換洗衣物，生活勉強維持，說不上改善。

但無論如何，在信教過程中摻雜了財利的因素，總是為教會長遠的發展帶來許多的危機與弊病，汰善留惡，製造爭端。

為防範造成吃教信徒，戴瑞蘭堅持教會不直接從事救濟工作。曾有一個美國機構邀請錫安堂負責分發由其捐贈的救濟品，為她所拒絕。她認為救濟品只能在教會門外派發，且不能以教會名義進行。這樣的觀點，與她個人的信心差會背景有直接的關係。戴瑞蘭自豪地宣稱：「錫安堂沒有米飯信徒。」[22]從長期效果上言，在五十年代於調景嶺建立的眾教會中，錫安堂的資源與財力是最薄弱的，並且沒有參與救濟工作；但在六十年代，當其他教會的人數迅速衰減時，錫安堂仍維持有約一百人的聚會。[23]即使在七十年代教會中衰期，仍維持四、五十人以上，財政亦一直自立。[24]與今天仍然留存的

---

[22] 戴瑞蘭教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不過，據陳國英指出，長老會曾在調景嶺船廠附近興建了一批小屋，每間約 100 呎左右，以十元廉租給居民，由錫安堂戴瑞蘭負責推薦，也有不少人是因此而加入錫安堂聚會的。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23] 蕭麗霞、盧慧桃：〈張祖鷺牧師專訪〉，頁 14。

[24] 蕭麗霞、盧慧桃：〈韋志安執事專訪〉，《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頁 16。

幾間教會相較，她是發展得最為健全的一間，信徒人數最多，他們在人力與財力上積極參與教會事工。這不能不說是教會慎選信徒，排除吃教者所締造的結果。

（三）教會對差會的依賴

教會對差會的過分依賴，亦是造成教會與社區脫節的一個原因。

教會藉救濟與福利來吸引信徒，除了造成前述的吃教問題，敗壞信徒的質素外，對傳教者也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雖然教會派發的物資，許多都不是直接來自自己的宗派和堂會，而是由大型的國際救援機構送贈，教會只扮演分發的角色；但是，由於傳教士及傳道人握有分發物資的權力，也令他們在信徒及非信徒面前，獲得了超越傳道者本身以外的世俗權力，即使未曾淪入不諂媚就不獲分配救濟品的情況，最少亦教傳道者與信徒處於相互懸殊的位置，兩者是難以平等相交的。信徒必須聽命於傳道者，仰賴他們在包括物質與靈性各方面的供應。要是我們相信權力使人腐化的規律，則傳道者藉著掌握與分配救濟物資而獲得額外的權力，自亦難免遭到腐蝕。

再者，信徒若是長期處於受助者的位置，也會養成倚賴心態，缺乏自立自主的動力。調景嶺各教會最初向身無長物亦無謀生之資的難民傳教，自然難以期望後者可以在財政上承擔教會的支出，教會在經濟上自養是天方夜譚的事。但是日後不少信徒其實都能找到工作，他們的收入再微薄，還是

有若干奉獻的能力；只是他們若慣於享受免費午餐，認定財源豐厚的差會根本用不著他們僅有的兩個小錢，便不一定有奉獻的意願。在調景嶺開基的教會，若是差會的經濟實力較強、投入的資源較多的，幾乎都難以避免讓信徒產生倚賴心理，對傳教士馬首是瞻、唯唯諾諾。一旦傳教士離去，差會斷絕金錢援助，信徒便連一份全職傳道的薪資亦承擔不來。傳教模式弱化了教會的發展生機，類似情況在其他時期、其他地區亦普遍存在。

由於沒有實力雄厚的差會不計傳教效果的繼續支持，神召會與宣道會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都無法維持全職傳道人的薪酬；願意留守下去的牧者，得設法開辦幼稚園或兼理別的教會與事工，藉以維持生計，無法全心全意在調景嶺發展；而他們之所以繼續留守或兼理教會，一方面是出於感情與道義（譬如當時已在荃灣宣道會工作至有相當成績的都乾初牧師），另方面也是部分同工怯於適應外面世界的挑戰，寧可退縮在調景嶺的小天地，維持有限的局面。

至若差會財政實力較強、願意長期承擔教會開支的，如路德會與信義會，也產生了牧者毋須向會友負責、亦缺乏進取奮鬥動力的問題。要是牧者能夠維持教會繼續存在的局面，便繼續獲得財政支持，即使不增長亦無傷大雅，那他們的進取心與隨時代轉變的決心便很難提高，此成為教會增長的一個人為障礙。

（四）教會無法與時俱進

好些在調景嶺成長與參與教會的信徒都提到，七十年代以後，調景嶺的教會要非關了門，便僅餘十來二十個人聚會，其中絕大多數是老年人。[25]較為例外的是錫安堂，此時期，不算小孩子，該堂尚有五十多人參與崇拜，年輕人還佔較多數。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錫安堂為獨立堂會，並無差會經濟支持，而創辦人戴瑞蘭又極有智慧地在六十年代初年便離去，沒有長期把持教會事務；教會若非繼續增長發展，本地信徒若不願意承擔，便得面對關門的命運，是以信徒的參與程度遠較別的堂會為高。他們從外頭聘請年輕牧者主理教會，這些牧者都非調景嶺出身的人，並且不都能說流利國語，但他們卻引進較多新的信仰觀念與事工模式，對年輕一代自然較具吸引力。有受訪者告訴筆者，八十年代初年在錫安堂活躍的年輕人，不少不是本區居民，而是從外區入讀調景嶺的中學、並寄宿於這裡的，他們幾乎全為男孩子。[26]

從錫安堂在七、八十年代仍維持有限程度的活力和增長，亦說明調景嶺絕大多數教會的問題所在。如前所說，老一代信徒的離去，無疑是造成教會人數減少的重要原因；而

---

[25] 有關這一節的討論，筆者曾訪問了好幾位三十至五十歲、在調景嶺出生與成長（多數是在教會學校讀書）、曾在某個時期參加過調景嶺教會活動、而又在如今仍然維持信仰的信徒，並在他們身上獲得寶貴的資料和觀點；不過，基於各種理由，特別是本節的部分描述較為負面，他們大都不願意具名。

[26] 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

人數減少造成資源匱乏，亦為教會的延繼帶來各樣困難，諸如無存聘任全職傳道等。但是，原有信徒離去最多只是教會衰落原因的一半，另一半原因乃在於教會無法隨時代而轉變，無法吸引新人加入，填補離去者的位置。

調景嶺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社區，五十年代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在這個時空環境下所建立的也是至為獨特的教會。早期的福音對象，都是隻身來港、身無長物的難民，他們一無所有，生活無著，前途茫茫，只要有人關心他們，給與實質的援助，他們便會有積極的回應。適時在他們中間擔任傳教工作的傳教士或華人傳道，正好能為他們這些缺乏作補足。傳教者同樣活在憂患的歲月中，且不說都得在解放前後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以難民身分來到香港這個陌生的地域，就是在更早前的抗日戰爭裡，他們也與多數中國人一同經歷戰爭、飢餓、匱乏與流徙；共同的經歷與共同的語言，使傳教者與福音對象間的距離縮至最短。他們所提供的幫助，包括物質救濟、醫療服務、關懷溫暖、聚會活動、就學就業，乃至出國機會，都能切合難民的需要。這是教會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獲得高速增長的原因。剛從中國大陸來港的傳教士毋須在香港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反正這裡不是新的環境，一切與過去無甚分別，調景嶺不過是中國大陸一個延續性的縮影。

隨著難民逐漸尋找工作，建立家庭，五十年代初期的難民處境與心態很快便淡出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不少第一代居民都因移民或其他理由離開調景嶺，社區整體人口減

少，且增添了好些外來居民。新遷入的居民許多在客觀背景與主觀心情都與第一代居民迥異，即使他們填補了第一代居民遷出後在社區的位置，他們也無法填補其在教會的位置。一方面，早期教會高速增長，居民都是不請自來的，教會沒有甚麼主動出擊的傳教活動，遑論制訂長遠進取性的佈道策略；要是新居民的生活好轉，對教會的原有事工不感興趣，不期望獲得教會的救濟或手工藝工作，他們不來教會，教會又沒有辦法到他們那裡去，那他們便甚難與教會連上任何關係。另方面，新遷入的居民大多沒有第一代傳道者與信徒的共同生活及信仰經驗，因此甚難打進原有的信徒群體，「我群」與「他群」的界線是非常清楚的；過去造成傳教工作有效開展的那個文化與心理的因素，如今竟然成為新來者加入教會的障礙。所以，早至五十年代末期，調景嶺的教會便已存在與新來居民脫節的危機。教會僅能盡辦法留住舊有信徒，吸收新信徒則非常困難。[27]

也許教育工作是最能適切新居民需要的一種教會服務，亦最能藉以吸入新信徒。在五十年代末期，不少教會如信義會、路德會和神召會等，都是靠小學和中學來發展新信徒的。有人曾對筆者說，在六十年代以後，雖然成年非信徒願意前來參與教會聚會的不多，但基於過去對教會所有的良好印象，他們大多放心讓自己的孩子參與教會活動，故兒童工作

[27] 劉民和牧師指出，即使是在六十年代，教會便已沒有做甚麼外展性的福音工作，僅是守住一群老教友，維持他們之間的關係。劉民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10 日。

還是大有可為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教育質素的要求不斷提高，除非教會能獲得資源興建校舍，改善設備，否則無法維持下去；故在六十年代以後，教會小學與幼稚園大都相繼停辦，僅餘慕德中學（連小學與幼稚園）、鳴遠中學（同樣連小學與幼稚園）等仍然繼續，故教會不一定能夠保住這條吸收新信徒的門徑。加上此時不少調景嶺的中學生都立志投考區外的中學，而區內中學的學生則有不少是從外面遷入寄宿就學者，他們在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都離校返家，難以參加調景嶺教會的活動。[28]此外，基於學校管理層與教會間存在的問題，教會學校在日後的傳教與供應新信徒的效果等方面，表現並不理想。

更大的信仰障礙來自教會的上一輩牧者與信徒和年輕一代間的文化差距。有在調景嶺成長的第二代信徒率直地說：調景嶺教會的年長牧者與年輕一代根本沒有共同語言。當然兩代之間的代溝問題存在於任何時空，非調景嶺教會所獨有，但這裡肯定較其他地區的教會更形尖銳。由於包括政治在內（如居民獲得台灣政府的經濟援助與文化供應）的種種緣故，調景嶺是一個時空凝固的地區，不少上一輩的人活在民國時代的延續世界裡，與外面社會嚴重脫節。但是，年輕一輩卻鮮能不受香港主流文化的影響，而香港文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變化可實在太大了。年輕人既然無法適應由上一輩文化所主導的社區與教會，便得努力往外發展。即使他們

[28] 劉民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10 日。

未能投考到區外程度較高的學校，得在中學階段入讀慕德與鳴遠等學校，不少亦全心全意地讀書，應付公開考試，俾使畢業後盡快搬離這個社區。年輕人不習慣教會原有的運作模式，對牧者只講溫情卻無法滿足他們的知性期望感到強烈的抗拒，故在唸小學時期隨父母或教師上教會的，很多在青少年時代便放棄信仰，或轉投區外的教會。

一位基督徒說，她曾在一段時期參與摩門教的聚會，發現那裡的氣氛還比較具時代感。教會裡有好些前來作短期宣教的年輕兄姊，他們給人的感覺是有學識，朝氣蓬勃，對人親切；他們舉辦補習班，教英語，組織學習小組，又安排如烤肉、旅行等活動，頗能吸引年輕人參加。這樣的「先進」情況，連前面提過較好的錫安堂也還是比不上，甭提其他教會了。[29]

有趣的是，筆者訪問好些較資深的牧者與信徒，他們卻大肆批評摩門教與錫安堂吸引年輕信徒的做法。陳國英便對筆者指出，摩門教等藉跳舞等活動來吸引年輕人，把他們都「帶壞」了，產生許多壞影響，家長對此非常有意見，這也是摩門教無法在調景嶺立足的其中一個原因。[30]可以看到，兩代間的不同觀點在調景嶺的社會與教會群體裡是相當嚴重的；若是上一輩的牧者與信徒拒絕新的文化，反對教會的信

---

[29] 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不過，在 1970 年，摩門教在調景嶺亦僅有 50 人聚會，並不見得特別興旺。Berndt,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271，註 8。

[30] 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

息與形式與時俱變，便無法保持對新來者的吸引力，而年輕一輩對古老的教會文化的抗拒肯定是最為嚴重的。

第五節　調景嶺教會的啟示

香港社會是由一頁又一頁的難民歷史所建構成的，香港教會（特別在 1949 年後）也基本上是難民教會。調景嶺的教會與其他地區的教會最大的不同處，乃在於特殊的政治環境造就一個特殊的難民社區，使難民社會與難民教會的某些特質，及其所促成的教會盛衰，顯得更為突出與帶戲劇性而已。調景嶺可說是香港的一個縮影。

舉例言，香港教會在五十年代有高速的增長，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卻逐漸放緩，雖然落差沒有調景嶺般嚴重，但肯定與難民社會的轉型有密切關係；以地緣與語言作為群體自我識別的鄉黨地域教會，在六十年代以後經歷較大的發展困難，未嘗不是由於信徒粘合的一個主要因素已告失效所致；老一輩的牧者（不少都是軍旅出身）與時代脫節、教會領導權力交棒出現困難，造成個別堂會乃至整個宗派衰落、年輕信徒出走的情況，在香港、台灣等地便更是屢見不鮮了。因此，研究調景嶺教會的興衰變化，對本土宣教學研究，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後話

如同九龍城寨一樣，調景嶺平房區是政治敏感性甚高的社區，亦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由於牽涉到中國大陸及台灣，亦甚易激發本地左右兩派居民的政治爭論與對立，造成社會不穩定，香港政府一直未立定主意解決這兩個問題，容讓它們分別延宕了一段甚長的時間；直到九七臨近，才採取果敢行動，將兩個具政治特殊性的社區予以清拆。

1995 年 4 月 4 日，香港政府正式宣佈清拆調景嶺平房區，作為將軍澳新市鎮發展計劃的一部分。原址拆卸後，共收回 81.6 公頃的土地，連同在調景灣進行的填海工程所另外獲得的 12.4 公頃的土地，將可興建約 12,000 個公共房屋單位、地下鐵路將軍澳支線、配水庫、道路及其他社區設施。清拆行動於 1996 年 9 月完成，受影響的平房共 1,661 間，2,179 戶，人數約 6,500 人。他們按不同資格，分別獲得分配公共房屋或現金津貼。自此，調景嶺成為香港歷史的陳蹟。

調景嶺各教會亦獲得現金補償，及分配在將軍澳新市鎮某社區服務單位，繼續發展福音工作。路德會、宣道會、神

召會、錫安堂等皆有堂會承接調景嶺近半個世紀的歷史。

名義上說，五十年代奠立的好些教會仍然存在，當日傳教士付出的勞力仍然繼續開花結果，調景嶺的一頁教會歷史並未真箇結束。不過，人事遷遞，本來已為數不多的舊信徒逐漸離世，教會所在的社區環境轉變，已遷新址的教會是否還能在實質上繼承調景嶺教會的若干傳統，它們會否至終割斷與過去的一頁歷史，對此筆者無法不持悲觀的態度。[1]無疑，教會的首要責任是實踐福音使命，得向前看而非向後看，並與時俱變，不能因循保守、自囿於歷史的桎梏中，故是否需要刻意保留與發揚傳統，尚可再議；並且公允地說，香港社會轉化極快，傳統與現實出現斷層，是每個社會組織都有的情況，絕不僅限於教會，也絕不限於出身於調景嶺的教會。但是，由於調景嶺教會的時空特殊性極高，加上過去教會賴以以某個模式存在的社會生態業已整個地消亡，故教會的後頁與前頁間的斷層，肯定較其他地區的教會更為深廣。

筆者對現存教會之能妥善保存過去的歷史與傳統並不樂觀，相信隨著當事人的相繼離世，教會裡連知道過去故事來

---

[1] 筆者曾參加錫安堂的五十周年堂慶，從旁觀察，發覺近數年在將軍澳新址信主的年輕信徒，已無法對過去在調景嶺一頁的歷史產生感情上的共鳴。當日戴瑞蘭教士專誠回港參加聚會，但由於她在六十年代初期已離去，故與她親熱交接的僅是一些老教友，而他們許多根本已遷居他處，不再為錫安堂的會友了，他們僅屬過去而非今天的錫安堂。事後，筆者有機會跟一些傳道和信徒談話，在好些教會事工的路線與做法（諸如崇拜模式）上，更體會新舊傳統間存在著相當的分歧與張力。

龍去脈的人亦將成鳳毛麟角，遑論對過去產生感情附著了。為此，我恭謹地編撰這本歷史小著，將無法在現實裡保存的過去保存在書本裡，作為對那些曾在五十年代於調景嶺奉獻出他們才幹勞力的前輩的獻禮。

歷史大概只存在於歷史裡。

徵引書目

（本書目旨在方便讀者追溯書中所曾徵引材料的出處，以為評鑑正舛與跟進研究之用，故僅以在註釋中直接徵引過的資料為限，曾參考的其他報刊文獻皆不列出。）

甲. 檔案

Hsu, Nancy: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Get a Chance," ***Sunday Post-Herald*** (Sept. 29, 1968)。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70〉。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156, D.&S. no: 1/2876〉。

Social Survey—Squatters (Rennie's Mill Village)，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22〉。

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HKRS no: 156, D.&S. no: 1/2877〉。

乙. 中文書籍、報刊、文字資料

（本書有許多資料是由不同人士直接在各教會的信徒中間作廣泛訪問，又代翻查多年的會刊、會議記錄與崇拜程序表等，然後以筆記摘錄形式送贈筆者參考的。除在鳴謝頁提及這些協助者的芳名，並因直接徵引而在註釋中提到他們的文字材料外，由於過於零碎，這裡無法一一註明。）

〈大事年表〉。《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香港：該會，1990。

〈司務道教士與調景嶺醫務所、靈實醫院〉。胡春惠主訪、李谷城等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本校簡史〉。《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98~99 年校刊》。香港：該校，1999。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百年事略〉。《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立會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867~1967)》。香港：該會，日期不詳。

〈專訪曹神父〉，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

〈崔冠軍牧師生平簡略〉，附於《崔冠軍牧師安息禮拜儀節》，2000 年 5 月 27 日。

〈路德會在華佈道五十週年(1913~1963)〉。(一)至(六)。《路德月報》第 89~103 期，1963 年 1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

〈慕德中學簡史〉。《香港慕德中學大學預科第一屆畢業紀念刊》。香港：該校，1968 年 7 月。

〈調景嶺居民四十餘年血淚滄桑史〉(其四)，原文曾刊於《快報》，1992 年 6 月 11 日，收入調景嶺居民自編的歷史資料集，缺作者、篇名、出版日期等，蒙陳國英女士借閱。

〈調景嶺滄桑四十載〉。收 Norman Lau 編。《調景嶺之歲月(1950~1993)》。香港：私人出版，1993。

〈戴教士的話〉。《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香港：該會，1990。

《一粒麥子：司務道教士紀念冊》。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及靈實福音佈道團，1994。

《九龍塘宣道會主日崇拜秩序表》，1950 年 11 月 5 日。

《九龍塘宣道會聖誕禮拜秩序表》，1950 年 12 月 25 日。

《工商日報》，1961 年 6 月 5 日。

《公教報》，1950 年至 1954 年。

《香港之社會福利事業（一九五四年）》。香港：香港政府社會局[？]，1954[？]。

《香港時報》，1961 年 6 月 4 日。

《基督教香港區聯會同工退修會手冊》，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20 日。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史略》，香港崇真會出版部，1974。

「神召聖經神學院專刊」諸文。《基督教週報》，第 95 期，1966 年 6 月 19 日。

「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公教報》，1996 年 7 月 19 日，特輯四。

丁仁傑。《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99。

方適存。〈第一次區甲保長會議施政報告〉。《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

王光霞著、中天譯。《熔爐》。香港：樂歌學生天地，1980。

王順民。《宗教福利》。台北：亞太圖書，1999。

王澤生。〈本堂二十週年的回顧與前瞻〉。《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香港：該堂，1970。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荒原上》(***Balm of Healing in Junk Bay***)。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陝西羚蹤》(***Trails of Glad Tidings in Shanxi***)。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及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

正源。〈從摩星嶺到調景嶺〉。《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

立生。〈醫務所的概述〉。《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

成器。〈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結束——兼談救總與調景嶺的情感〉。《海外學人》第 274 期。1995 年 7 月。

江順昌。〈窩美崇真堂簡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編。《香港崇真會立會一百四十周年紀念特刊(1847~1987)》。香港：該會，1987。

吳明節。《恩海浮沉錄》。香港：靈文書房，1991。

李光堯。〈主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主那裡來的〉。《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銀禧紀念特刊》。香港：該會，1978。

李光堯。〈主啊！如今可以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哪！〉。《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會，1983。

杜聖恩。《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教會史略》。台北：中國基督教信義會，1994。

周永新。《香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政策》。香港：大學出版印務，1980。

周維屏。〈曹公立珊神父八秩壽序〉。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

林秀庭。〈母會成立廿週年感恩的話〉。《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香港：該堂，1970。

林照真。〈香港最後一面國旗——調景嶺青天難再〉。《中國時報》，1994 年 3 月 7 日。

林照真。〈難民，老兵，歷史債——國共內戰下理不清的傷痕〉。《中國時報》，1994 年 3 月 7 日。

林澤。〈從九七角度看地區政治與社會服務〉。收吳水麗等編。《鏞射香港》。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1987。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收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上冊。

姜德明。〈調景嶺上的傳奇人物——為賀曹立珊神父八秩大壽而作〉。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等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97。

范約翰。〈入營以前（收容於東華醫院）——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三〉。《基督教週報》第 314 期，1970 年 8 月 30 日。

范約翰。〈入營以前（遷往摩星嶺）——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六〉。《基督教週報》第 317 期，1970 年 9 月 20 日。

范約翰。〈自力更生——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十二〉。《基督教週報》第 448 期，1973 年 3 月 24 日。

范約翰。〈災禍頻仍——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九〉。《基督教週報》第 399 期，1972 年 4 月 16 日。

范約翰。〈來到曠野——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六〉。《基督教週報》第 348 期，1971 年 4 月 25 日。

范約翰。〈集體入營——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五〉。《基督教週報》第 333 期，1971 年 1 月 10 日。

范約翰。〈義務診所——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八〉。《基督教週報》第 382 期，1971 年 12 月 19 日。

范約翰。〈福音工作的演變——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十五〉。《基督教週報》第 472 期，1973 年 9 月 9 日。

范約翰。〈數說神的恩典——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七〉。《基督教週報》第 361 期，1971 年 7 月 25 日。

范約翰。〈數說神的恩典——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五〉。《基督教週報》第 359 期，1971 年 7 月 11 日。

范約翰。〈調景嶺史話——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一〉。《基督教週報》第 306 期，1970 年 7 月 5 日。

范約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調景嶺的福音工作之二〉。《基督教週報》第 310 至 312 期，1970 年 8 月 2 日、9 日及 16 日。

范約翰。《瓦器藏珍》。香港：道聲出版社，1977。

耿英祺。〈調景嶺兩週年〉，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該文原刊於《公教報》，1952 年 6 月 29 日。

高潔。〈調景嶺學生輔助社〉。《基督教週報》第 533 期，1974 年 11 月 10 日。

張維豐。〈香港崇真會史略——香港崇真會編年史〉。《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立會一百周年紀念特刊(1867~1967)》。香港：該會，1967。

徙置事務處長莫理臣。〈香港政府覆調景嶺居民書〉(譯本)，1961年6月15日。原件影印本取自調景嶺居民自編的歷史資料集，缺編者名、書名、出版資料，蒙陳國英女士借閱。

曹立珊。〈調景嶺近況〉。《台灣教會生活》。1954年9月5日。

梁中英。〈和煦春風中的品性教育〉。收周維屏等。《春風四十年》。出版地不詳：鳴遠校友祝壽籌備會，1992。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

郭乃弘編。《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

都乾初。〈調景嶺堂的「七喜」〉。《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堂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70)》。香港：該堂，1970。

陳東屏匯編。《南京大屠殺——英美人士的目擊報導》。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1959~1960)》。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缺日期。

陳培德編。《信義宗神學院八十週年紀念特刊(1913~1993)》。香港：該院，1993。

陳煜新等編。《香港路德會金禧慶典紀念特刊(1949~1999)》。香港：該會，1999。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Activities of Hong Kong 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Relief Committee*)。香港：該會，1959。

焦一夫。〈荒山學府〉。《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10月24日。

菲達·杜愛萊著，戎子由等譯。《杜愛萊牧師傳》(*Deth in the Orient*)。香港：青年書屋，1976。

楊憶茂。《信義會簡史》。影印本由胡子浪監督提供。

葉錫恩(Elsie Tu)。《葉錫恩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

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Via Port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

裴斐(Nathaniel Peffer)、韋慕庭(Martin Wilbur)訪問，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趙世光。《蒙召三十年》。台北：龍文出版社，1994。

趙雅博編著。《雷鳴遠神父傳》。台北：文景出版社，1977。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 1985~1995〉。收劉青峰等編。《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史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編，第 3 卷。1998 年 12 月。

履平。〈營中雜寫〉。《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

諸正英。〈天主教協助難民開闢調景嶺：一九五零至五四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討會論文。1993 年 9 月 22~24 日。單行本易名為《鳴遠中學創校四十五週年紀念史記》。私人出版，1995 年。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香港：衛道出版社，1966。

蕭克諧。〈我所認識的香港信義會〉。電腦打印稿，蒙蕭克諧院長直接贈閱。

蕭克諧。〈從灄口到香港：中文神學教育轉捩點之一〉。《神學與生活》第 22 期，1999 年，頁 83~89。

蕭克諧。《認識信義宗教會》。香港：道聲出版社，1997。

蕭麗霞、盧慧桃。〈韋志安執事專訪〉。《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香港：該會，1990。

蕭麗霞、盧慧桃。〈張祖鷺牧師專訪〉。《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錫安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1990》。香港：該會，1990。

駱友梅。〈過時的瑣憶〉。《香港路德會救恩堂建堂卅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83。

嶺梅。〈港九各界首長視察調景嶺紀實〉。《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

〈魏道榮牧師安息禮拜程序單〉，蒙其女兒魏慈恩姑娘提供。

關士光。《七十年來家國：一個老香港的回顧》。Toronto：York University，1999。

丙. 英文書籍、文章

Berndt, Manfred Helmuth, "The Diakonia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STD. dissertation, 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 1970.

Come Wind Come Weather. Author unknown。香港：調景嶺基督教醫藥所，1954。

Cressy, Earl Herbert,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5~1958.*** Hong Kong: Private Printing, 1960

Cressy, Earl Herbert, ***Urban Church Growth in Hong Kong 1958~1962.*** Hong Kong: Private Printing, 1964.

Dial, Oliver Eugene,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Ph.D. dissertation,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64; Reprinted by Ann Arbor: UMI, 1975

Fitch, George A.,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Privately Printed, Taipei, 1967.

Gleason, Gene, ***Joy to My Heart.***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6.

Jones, Catherine, ***Promoting Prosperity: The Hong Kong Way of Social Poli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1990.

Kehrberg, Norma, ***Love in Action, UMCOR: 50 Years of Servic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9.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Literature, 1929; reprinted by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n.d..

Lindner, John Thomas, "The Lutheran Church in Hong Kong 1949~1980." M.Div. thesis,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ayne, Indiana, 1981.

Molumphy, Henry D., ***For Common Decency: The History of Foster Parents Plan 1937~1983.*** Warwick, RI: Foster Parents Plan International, c1984.

Mueller, Richard E., ***Mission Made Impossible: Sources of the Schism in 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Hong Kong and Macao Mission.*** St. Louis, MO: Evangelical Lutherans in Mission, 1976.

Of Such is the Kingdom: 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 Relief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62. n.d., n.p.

Schjørring, Jens Holger, et. al., eds., ***From Federation to Communion: The History of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7.

Simon, Henry E., "The Legacy of Gertrude Simon."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校，1982，頁 13。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rface, Bill &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Maryknoll in Hong Kong.***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63.

Webb, Paul R.,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編：《廿五年來之香港(1951~1976)》。香港：該院，1977。

丁. 網站

香港學生輔助會。
http://www.hksas.org.hk/index2.html, 2000 年 2 月 11 日。

基督教靈實協會。
http://www.hohcs.org.hk/hohcs-chinese/whoweare. html, 2000 年 2 月 11 日。

Church World Service.
http://www.churchworldservice.org/index.html, 2000 年 2 月 14 日。

戊. 口述資料

（僅列出願意透露名字而其受訪資料又曾直接在文中徵引過的受訪者。不少人曾接受筆者多次訪問，這裡僅註明第一次受訪日期及地點。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訪問皆由筆者負責筆錄。）

王力耘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7 日，新界上水，王牧師府上。

丘恩處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7 日，九龍尖沙嘴，紐約神學教育中心香港辦事處。

甘汝誠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14 日，新界長洲，建道神學院。

林澤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九龍尖沙嘴，基督教協進會。

范約翰先生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6 日，九龍新蒲崗，某酒樓。

范約翰先生筆述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21 日。

夏其龍神父訪問，2000 年 2 月 25 日，香港中區，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徐傳宣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7 月 4 日，加拿大溫哥華，門諾弟兄會頌主堂。

時恩證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2 月 18 日，九龍長沙灣，宣道會深水埗堂。

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九龍美孚新村，崔牧師府上。

曹立珊神父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1 日，台灣台中，耀漢弟兄會會院。

陳國英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6 日，九龍黃大仙，陳女士府上。

曾福全先生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7 日。

楊植潤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 日，九龍深水埗，路德會救主堂。

葉維新牧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18 日。

劉平齋夫人訪問記錄，由羅淑芬小姐與招鳳玲小姐代為進行，2000 年 4 月 8 日。

劉民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10 日，九龍九龍城，美門浸信會。

劉梅軒長老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8 日，香港跑馬地，劉長老府上。

蔡惠師牧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29 日。

盧龍光博士電話訪問記錄，2000 年 6 月 28 日。

蕭克諧院長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31 日，新界沙田，信義宗神學院。

錫安堂韋志安執事的見證，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五十周年感恩崇拜，2000 年 4 月 16 日下午三時至五時，翠林邨社區會堂。

戴瑞蘭教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17 日，九龍油麻地，某酒店。

謝志和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3 月 1 日，新界將軍澳，神召會欣明幼稚園。

魏榮牧師訪問記錄，2000 年 4 月 28 日，九龍黃大仙，港澳信義會總辦事處。

羅菁女士訪問記錄，2000 年 5 月 3 日，九龍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簡介

時代的需要

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於九三年二月，為要回應兩個時代的需要：

一、香港回歸中國的事實

無論九七後香港教會的情況如何，或需消極地自救自保自處，或是積極地利用時代契機將福音使命伸延至中國，香港教會及神學教育總得考慮中國的需要，添上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因素。

二、中國社會與教會的轉變

在近十餘年，中國社會冒起一大群對基督教研究有濃厚興趣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現在對基督教的理解並不是全面而正確的，但我們仍得認定與他們展開交流對話，是使基督信仰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傳遞的有效途徑。

中國教會自八十年代重開以來，已顯示出缺乏合資格的傳道同工、新舊領導接班困難的嚴重問題，這對她現在能否減低異端蔓延，及在未來茁壯成長有莫大的影響。香港教會與神學院對此危機和需要是責無旁貸的。

我們的異象

一、將「中國」因素引入香港的神學教育及神學研究中

二、將「福音信仰」因素引入中國教會及知識界

我們的事工

一、開辦與中國文化及神學有關的課程與講座

自九三月九月開始，我們在道學碩士課程內增設了「中國文化研究」主修，每年提供約五至六科與中國文化、教會及神學有關的科目，供同學選讀，並主辦相關的學術講座。除本院講師外，我們更邀請海內外知名學人主持。

二、開展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

「文化中心」積極推動本色化神學的研究。我們關懷的，不僅是在理念上基督信仰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話，從而確立傳教的話題，撤除來自文化的福音障礙；更是進而實際地關心西方的神學傳統如何在中國教會傳遞、發展、改造，俾讓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成為普世神學發展不可分割的支流。

成立迄今，我們已完成了下列研究計劃：

A.「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

B.「中國祭祖問題」

C.「華人宣道會百年史」

D.「王陽明研究」

E.「吳耀宗研究」

F.「趙紫宸研究」

G.「陳崇桂研究」

H.「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農村教會研究」

I.「建道神學院百年史」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有以下六個研究方向：

A.「二百年的華人教會釋經」

B.「五十年代中國教會的歷史與神學」

C.「香港教會史研究」

D.「歷史神學導讀系列」

E.「中國近代教會史研究書目」

F.「華人教會屬靈傳統研究」

此外，我們又資助國內基督教研究學者從事若干研究計劃，並出版下列有關研究論著與史料的叢書系列：

A.「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叢書」

B.「史料叢刊」

C.「文化集刊」

D.「文化評論」

E.「香港教會研究」

三、協助國內的神學教育與人才培訓

作為神學院的研究部門，我們將直接的中國事工局限於神學教育與人才培訓之上，包括與國內神學院開展交流活動，訂定合作計劃，及在人力及圖書設備上支援他們。我們曾往訪十多所神學院及聖經學校，與師生們懇談，並在其中九所講課及主領聚會。

此外，我們亦接待來自國內的神學院教師或教牧人員，提供短期或完整學位課程的訓練。另方面，我們也派遣學院

的同學在暑期前往國內教會實習，並組織神學院的院際活動。讓同學對國內的近況，有更直接的認識，促進中港兩地相互了解與交流。

四、與研究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對話

藉著參與學術研討會及主持講座，我們結識了一批對基督教研究有濃厚興趣的學者，我們希望透過誠懇對話，將由福音角度理解的基督信仰傳遞出來，俾讓他們對基督教不致產生偏差的看法。

成立迄今，我們曾多次往訪國內社會科學院及附設於大學的宗教或基督教研究機構。此外，我們也曾到大學作短期授課，講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關的題目。

五、增加信徒對中國及中國教會的認識

我們於九四年成立了「中國文化之友」，期望能通過不同的活動，增加信徒對中國及中國教會的認識，同造中國夢。

我們的需要

我們需要更多對中國有負擔的有識之士給予我們多方意見及支持。若您希望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工作，或成為「中國文化之友」，請與我們聯絡。

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長洲山頂道 22 號

電話：(852) 2981-0345　傳真：(852) 2981-9777

網址：http://www.abs.edu　電子郵件：cccrc@abs.edu.

調景嶺是中國基督教史上，在最短時間內最多人皈依的地區。教會在這裡辦有各種社會服務，又從事大規模的救濟工作，更曾辦有兩間聖經學院，訓練了百位以上的學員。本書致力探討基督教在調景嶺的特殊歷史時空下的發展，並檢討其傳教經驗，對該地區及香港教會的正負面影響。本研究對我們認識香港基督教史及中國基督教史，特別在探討傳教策略方面，有著重要的啟迪。

SA839